

基督依然受苦

理查·魏恩波

Richard Wurmbrand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开始	3
第二章：到西方去	82
第三章：下一步	111
第四章：冲突或妥协	138
第五章：一切手段	189
第六章：里程碑	238
第七章：前面的路	253

前言

当一个人驾车经过洛杉矶的街道，他五岁的孩子也在车上。他们经过一所教堂时，这孩子突然叫道，“爸爸停一停！让我们进入教堂看看神今天做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神今天在做什么？

如果你的孩子正在被折磨，你会如何？

在近年来，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和佛教徒正在越南经历“再教育”。许多人依然在其中。有一位专门殴打囚犯的狱卒名叫图曹(Tu Cao)。他夸口说已经鞭打了二千名囚犯，其中五百人被打死了。

约有五十名囚犯聚集在监狱空地上。其中一位名叫提泰(Tran Tien Tai)的被命令受鞭打三十下。他必需光着身子，从狱室出来，面向下躺在地上。

图曹正在玩弄自己的鞭子。他摸了摸受害者的大腿，晓得该用的力度。他不能任意杀掉这些囚犯。

众囚犯必需直视他人受刑。把脸转开便是犯法。

在受打第五鞭时，提泰不能再忍受，就呼喊道，“神啊，哀哉。”

这就干扰了鞭刑。狱长就说，“体罚时不许呼叫。头五下不算，重新算起。”

于是又从头开始。到了第二十五下时，提泰已经昏了，看来已经去世了。当三十下满了，官员吩咐提泰起身，可是提泰没有动弹。“你敢不听命令？”依然没有反应。图曹弯身看了看囚犯，就胜利的说，“这家伙自杀了。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活该。革命没有杀人，也不折磨人。我们若处罚，也只像父亲罚孩子《越南古拉格岛》。（东安丸陀 Doan van Toai 著，法国 Laffont 印刷局出版。）

基督依然受折磨。

在共产罗马尼亚，如果一个囚犯不说出地下教会的机密，长官就会对狱卒说，“把他带去见柏林沙鲁少校 Major Brinzaru 或威迭同志 Comrade Vidal。”柏林沙鲁是最技巧的酷刑手。威迭是一位女官员，专门击打男性囚犯的泽丸。

在苏联，那吩咐将是：“把他带去见提摩医生 DrTemo 或是马拉地罗 Mladionov。”

提摩医生总是微笑接待囚犯。他穿着医生的白袍，彬彬有礼。他称主教为高贵的，又称地位高的人为可敬的，然后就温柔地解释说：

“我的职责只是预备你可以坦诚的和询问员倾心而谈。”为这缘故他必需把针头插入你的指甲之下。一位医生习惯使用消毒的器具，提摩也不例外。他总是先进行针管的消毒。只是没有麻醉剂。

至于马哈地罗，他的特别任务是强暴修女和女基督徒。一次，当一位浸信会少女交给他处理时，她对他说那么体贴的话，以致他没有伤害她，反而悔改了。为了报复，共产党到他的家去把他上吊。可是他们离开太快，弟兄们赶快把他解下救醒。过后他就隐名生活了。（美国的《基督教先锋报》，哈非 H. Hartfeld 报道。）

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某些事是伤心的回忆，一触动就会流血。因此囚犯们都尝试忘记他们的孩子们，因为每逢想起就会担心。但共产党也知道这个，就强逼他们踏这地雷区。在漫长的夜晚审讯，问话官不断地提起他们孩子的名字，又播放孩子哀哭的声音。每个囚犯都肯定那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哭。

在敖德萨（Oderssa）的秘密警察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共产成员维拉（Vera Grebenniukova），她擅长割掉囚犯的耳朵，殴打他们的私处。

在一些地区，当局殴打儿童，迫使他们背叛朋友。一群十多岁的少年被打后，就被带上车，穿过街道，这样，万一他们记不起其他违法少年的名字，至少可以指出哪些孩子的住处，以便逮捕。

共产党的一种折磨，就是把正常人与疯人同关在一室。在萨瓦斯（Savastopol），十八名囚犯被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长三步，宽一步。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站立，一些人双脚完全不着地，挤在他人的肩膀上。他们因缺乏空气，窒息而死。

其他人则在冬天被脱掉衣服，赶进坑里，浇上冷水。还有一些囚犯的头骨被一根细绳围住，然后施刑者转动一根小棍，将绳子收紧，直到头盖骨掉出来。

实施这些残忍行径的人，曾是一个小丑。他放弃了叫孩童欢笑的职业，转而叫人痛哭。《俄罗斯的红色恐怖》（作者 S. Melgunov，纽约 Brandy 出版，1979）

这些事发生在列宁时期。他的继任者更是青出于蓝，强化技术，扩大范围。史达林杀了基督徒奥金(Odentiev)和文斯(Peter Vins)，他们是数百万受害者中的明星。在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勃涅夫(Brezhnev)的统治下，被杀的包括浸信会的赫马拉(Khmara)、莫伊(Moiseev)、奥斯塔(Ostapenko)、比布(Biblenko)、德内加(Deynega)、兰姆丁(Lambdin)。除了天上的使者，谁能写下所有的受害者名字？

在游击队获胜的尼加拉瓜，四位神父与共产党一起上台执政。

共党中有一名美女成员，名叫阿斯托夫人(Mrs Astorga)。她引诱前政权的维加将军(General Vega)进入她的家，埋伏着的同志们就抓起这将军。这夫人就观赏众同志殴打将军，把将军的眼睛也挖出。他们又割下将军的阳具，塞在他自己的口中。这就是神父和牧师们的战友！《岩石 The Rock》(1981年5月)

1980年1月1日，安息日会(Adventist)信徒尼娜(Nina Rujetshko)在克麦罗(Kemerovsk)监狱中被折磨致死。1980年11月11日，安息日信徒西蒙(Simeon Baholdin)在索利卡

(Solikamsk) 集中营被杀。 《苏联安息日领袖通讯》

西伯利亚集中营处死一些囚犯，因为这些犯人杀了守卫的一只狗充饥。 《走出冰层》（作者：V. Hermann）

乌克兰天主教神父戈尔 (Gorgula) 和科特 (Koty) 也被杀。共党绑了其中一位神父，将汽油浇在他身上，然后点燃。另一位神父的遗体被发现浑身是血，牙齿都被打碎，嘴里塞满面包。这是共党对圣餐的嘲弄。 《法国地下墓穴》（1981 年 5 月）

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在肆意杀戮。法国《俄罗斯报》7 月 16 日提醒读者，苏联的卡巴共和国 (Kabardino-Balkar) 领导人卡尔米 (Kalmikov) 轻易解决了所有反对派：他邀请所有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部落首领，前来进行和平谈判，然后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苏联秘密期刊《真见证》主要是为宗教，但也谈及反共消息。它刊登了一本诗集《Oxana》。其中描述立陶宛基督徒波肯 (Poshkene Birute) 的遭遇。由于她信基督，当局就剥夺她的孩子们，又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共产报章《尼亚穆 Niamunas》诽谤她，指她试图毒害自己的孩子，尽管在针对她的法院指控中，没有这一条罪。那报章还声称基督徒们裸体聚会，进行性狂欢。它又说牧师的妻子是他的第四任了。

我们的姐妹在诗中提及殉道者说：“被杀的人不能发声，但我们继续奋斗。没有什么比为真理受苦更好的生命了。监狱、集中营、警方扣留所——这些仇恨的工具多么无力。春天一到，雪就融化。冰雪挡不住阳光；邪恶也不能摧毁爱。公义必得胜。”

尽管有恐怖，苏联的立陶宛共和国 (Lithuania) 仍然充斥着秘密出版的宗教读物：《天主教会编年史》，《黎明》、《未来》、《上帝与国家》、《鲜血》和《受难的基督》等。

共党不能消灭苏联基督徒的信仰，也不能消除信徒们的希望和理性。这些奉献的信徒不因暂时的苦难而放弃永恒的奖赏。对他们来说，迫害之火是凉爽的，暴力是无力的。

共产党人可以割掉施洗者赫马拉 (Khmara) 的舌头，不让他唱诗赞美神，但他的歌声依然在人心中回旋。

基督徒囚犯的家人也难得食物。但囚犯本身呢？

在科雷马 (Kolyma) 集中营，囚犯们非常饥饿，连死了一周的马尸也吃了。这马尸已经发臭，长满蛆虫。在奥蒂尼 (Autini) 金矿区，囚犯把手推车的润滑膏也吃了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岛》)。当我在罗马尼亚共产监狱时，吃的还糟。

在索洛 (Solovetsk) 难民营 (苏联)，劳动日被冻僵的人尸就留在工场。一个人冻僵时，把头埋在两膝之间——就如以利亚祷告的姿势 (列王记上 18:42)。又有二人背对背地僵在一起《半生》 (维特科 D. Vitkovski)。在冬天，狱卒就用冷水淋赤身的囚犯。

在捷克，共产党人杀了地下教会的一位领袖，就是信徒们秘密任命的牧师普雷 (Premysl Coufal)。他曾多次被带到警察局。警方给他两个选择：或是举报信徒的活动，或是死亡。他最后一次见警方时，警察给了他一张日历，圈出最后的期限：二月 23 日。普雷每天都看这日历：他要成为犹太，或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上帝的孩子。他保持忠诚，付出最高的代价。

那日共产党人进入他的公寓，打碎了他的头骨，打断了他的鼻梁，割伤了他的手臂，然后打开煤气。党方让遗体留在现场，给信徒们看，吓唬跟随耶稣的人。但谁会被嚇住？这只证明共产主义没有真

能力，只能用暴力（德国拜耳快报 Bayer-kurier，1981年4月18日。）

如果你晓得痛苦等着，你会不会公开反对周遭的邪恶？苏联基督徒便如此。

荷兰夫妇巴伦森 (Barendsen) 是共产阿富汗的福音使者。他们在这个被苏联仇恨压制的国家为耶稣作见证。后来被共党绑在椅子上，切成碎片。在他们最后一次回荷兰休假结束后，要重返阿富汗时，有人问他们会不会害怕。他们回答说：“我们唯一的害怕，就是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

黎巴嫩福音使者贾米尔 (Jameel Safbury) 向盲人传讲人的邪恶和世界之光。为此，巴勒斯坦左翼游击队砍下了他的双臂和头颅。后来有人在桥下发现他的尸体《Idea》（德国，4月13日。）

罗马尼亚人布拉迪 (George Bratianu) 被迫自杀。共产党把他双手绑在背后，然后把活老鼠绑在他的脖子上，老鼠啃食他的皮肉。他就从窗户跳出去自杀。这些人是神特别眷顾的。希伯来书写道，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更美的家《Tara Si Exiulul》（西班牙，1981年2月。）

俄罗斯的弟兄们在监狱遭受可怕的酷刑。有人被令趴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脚上。然后共党用绳子将他们吊到天花板上，反复上下，直到他们晕倒。这时，狱卒就用一桶水淋下，使他们醒过来，继续酷刑。有医生在一旁不时检查，说：“可以继续审讯。”（克拉斯 Krasnov-Levitin,）《走向新城》。但信徒们仍然忠诚。

“基督教向共产世界”的一位同工，在中国遇到一位 82 岁的老人。他骑着一辆旧的自行车，到处传道。我们的同工给他一本新圣经，他非常感激，尽管他需要跋涉二百英里来领取。

他问我们的同工可否给他一辆新脚踏车，因为旧的已经磨损了。他在两年内骑行了数千英里，将神的话语带给渴望的人。

索忍尼辛在讲述自己在古拉格的经历时，说他一度发现自己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那时每日只得一丁点口粮，但每天还须要劳动十二小时。此外，他又患有恶性肿瘤，医生已经预测他的死亡。

有一天，他在烈日下铲沙，中途停了下来，尽管知道警卫会打他，可能会打死。但他根本无法继续了。

突然，他发现有人站在附近。转身，他看到一位老人，用拐杖在沙地上画了十字。从这一姿态，索忍尼辛就明白我们不必怕死。被钉的人子已经复活了。

我们也有这样的希望。基督徒没有理由绝望。我们无需伪装。我们有能力在上帝面前坦然生活，即使我们、或我们的教会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正直而灭亡。但我们晓得十字架的背后就是复活。

苏联基督徒佩特（Petker）、弗里森（Friesen）和彼得（Peters）在运送秘密印刷的圣经时车祸身亡。这起事故很可能是共党策划的。当佩特太太哭泣时，她三岁的孩子问：

“妈妈，爸爸在哪里？”

她回答说：“和救主同在了。”

在天使的启发下，这孩子就问：“若是这样，你为何哭？”

那些曾经遭受巨大苦难的人，就有天使和大群见证人的同在。他们的说话和传道，是别人所不能的。显然，一个愉快地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人，他说话的声音有异于那些只是从书本上获得知识的人。

听说被监禁的罗马尼亚东正教神父卡丘 (Calciu) 正在痛苦中。他体重减了一半，双目几乎全盲，双耳也聋了。他曾经坐牢十六年。读他讲章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残缺。他因为那篇道，不久前又被捕。

尽管他尝过共党的可怕手段，还敢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复活，人类将是地球上最不幸的生物，因为植物和动物不知道自己会死，我们却知道，而且天天为这个担心。尽管我还年轻，但也许今天我就会死。

“无神论者禁止任何复活的信仰。但如果没有复活，这暂短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无神论者也怕死。他们也担心自己死后就会永远消失，于是就为自己建立宏大的陵墓。这不就是人心渴求永生的一种可怜的代替品吗？

“耶稣给我们一种没有恐惧的死亡。祂给我们明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真快乐。祂保证死亡不是结束，却是永生的开始！”

卡丘不怕死。他在死亡的旋风中看到了一位天使。

乌克兰一所秘密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给红衣主教斯利（Slipyi）。信中写道：“我们日夜在圣礼前朝拜。一些年轻女孩已经立下了永久的誓言。在医院里，秘密修女是护士们的伟大见证者。因此，许多寻求者找到了通往基督的道路。”

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囚犯波雷什（Poresh）回忆说，在法庭上，从被告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外面一所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当法官宣判他的刑期时，那十架似乎沐浴在一种奇异的光中。他在监狱里写道：“许多人问，如何才能得着圣灵。牺牲自己服侍神。献出血，就得着圣灵。”

* * *

神今天怎样了？祂正在大受痛苦。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正在受苦。

你问今天基督如何了？答案是：祂如今仍然受折磨。基督徒受痛苦，就是祂正在受痛苦。我们是祂的身体。

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为受难的基督徒发声。

* * *

魏恩波 (Richard Wurmbbrand) 是谁？你可能会问。

由于没有人能够客观地谈论自己，不带任何偏见，所以在这里我便引述他人的评论，包括赞美和贬压。作为读者的你，便可以自行判断。

这里就是众人的评价：

“除了饱受诟病的魏恩波之外，当代没有人给西方更能了解共产国的真相。在魏恩波出现之前，我们几乎完全不晓得那儿的情况。”——迈克牧师 (Rev Michael Bourdeaux)，伦敦宗教与共产主义研究所所长

“魏恩波令人感到刺激，但他也睁开了我们的眼睛... 他叫世界倾听，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魏恩波正在高喊殉道者的口号。”——《瑞典向斯拉夫宣道会》秘书长 Ingemar Martinson 牧师

“魏恩波是铁幕后的保罗。他是地下教会最权威的声音。他不仅仅是一位活着的殉道者。”——《Underground Evangelism, 地下教会月刊》。

“自从登山宝训发表以来，没有人像魏恩波那样充满爱心地讲道。”——《Haratta 报》，芬兰

“魏恩波给普世教会带来了一个新视野，提醒人们纪念殉道者。”——《Church Times, 教会时报》，伦敦

“魏恩波像火球一样炸开了一些冷静人士的自满情绪。”——《Congressional Record, 国会记录》，美国

“我们遭受了一场名为《魏恩波》的飓风袭击。”——《Tablet, 石板报》新西兰

“我们已经核实过，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罗马尼亚从来没有魏恩波牧师这人。”——《芬兰共产党报》，芬兰

“魏恩波的风潮，纯属情绪化，极其幼稚...他对教会政治的判断被证明是一种可怕的狭窄...魏恩波扭曲事实，他(对苏联与同盟国)的危险在于他号召东欧的基督教会抵抗至死……”——《俄罗斯教会期刊》Gerhard Simon

“在当前的共产政权中，隐藏着人文社会的强大力量...魏恩波真的很危险。”——Van de Heuvel，时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WCC》公共关系总监

“魏恩波牧师在美国拥有一家妓院和九家夜总会。”——苏联电影《The Emissaries, 大使》

“魏恩波是魔鬼的喉舌。”——《Arbeiterzeitung 报》，瑞士

“魏恩波是今日的施洗约翰...是旷野的呼声。”——《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美国

“魏恩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神学家。”——《The Pilgrim, 朝圣者报》美国

“魏恩波是一位激烈的反共者和反苏派。他的书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仇恨。”——几家苏联党报

“魏恩波完全拒绝学术客观性 (Scholarly objectivity)。”——《Reformatörisch Dagbladet i》，荷兰

“魏恩波是一位红牧师 (共产主义牧师)。”——《Vaderland 报》，南非

“魏恩波滥用讲坛传播他的政治观点。”——《Dalademokraten 报》，瑞典信义会 Strom 主教

“魏恩波是反共最活跃的声音之一。”——《Polititicheskaie Samoabrazovanie》，莫斯科

“除了《圣经》，没有什么比魏恩波的《为主受苦》更震撼我了。这是本世纪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这是自尼禄 Nero 迫害基督徒以来最有力的殉道者行传。”——库里博士 Dr Kurt Koch（著名的德国福音派牧师和作家）

“魏恩波对神的爱和人性的理解非常仁慈。他的书中甚至没有与任何人争议。也许长期监禁的痛苦可以消除一个人自心的不平。”——《Alliance Witness, 联盟见证报》美国

“魏恩波遭受了共产党人的残酷对待，所以他思想混乱了。他不是福音派，所以不可信。他更像神秘主义者。”——荷兰的一种基督教杂志

“魏恩波是个无节制的人。”——《天主教先驱报 Catholic Herald》，伦敦

“魏恩波说话轻声细语，没有华丽用词，也没有戏剧性的夸张。他的基督教的了解是最纯正的，就如初期的教会。他不用大声宣传。魏恩波就如他所

传扬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身体虚弱，靠着不屈的灵力感召人。他从讲台上下来时精疲力尽，这叫听的人都感到羞愧。”——《Berner Tagblatt 报》，瑞士

“魏恩波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
《Christian Vanguard 基督教先锋》，美国

“魏恩波支持纳粹。”——《Verden Gang 报》，挪威

“魏恩波是一个迷人而热情（有时甚至过度）的个性，总是坚定地反对西方基督教的幼稚，西方基督教不相信共产主义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
《La Suisse 报》，瑞士

“魏恩波的书《如果那是基督，你会把你的毯子给他吗？》说服人们不仅把毯子送给受迫害的兄弟，甚至也送给迫害者，这本书充满了爱。”——
《Nuova Repubblica 新共和国报》，意大利

“魏恩波对共产阵营酷刑和野蛮行为的谴责比索忍尼辛更感人。”——《Il Citadino 报》，意大利

“魏恩波谈及共产党对基督徒的酷刑，许多人以为是夸大了。直到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证实他说的不错。”——《Daily News, 每日新闻》，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感谢上帝赐予索忍尼辛和魏恩波这样的人。这两人都写了共产国的禁书。这些书是神给我们的警告。”——《Tacoma News Tribune 塔科马新闻论坛报》，美国

“西方的一些教会领袖攻击地下教会的主要斗士魏恩波牧师，声称他提及的共产监狱暴行，都是撒谎和夸大。但我却亲自见过与魏恩波一起坐牢的基督徒。他们告诉我说，魏恩波说的不仅是真的，而且还有很多未曾说。没有人能描述那里发生的可怕酷刑。”——Anutza Moise 女士，《魏恩波的赎金》一书的作者，挪威

“魏恩波牧师的身上仍然留有共产酷刑的痕迹。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作家、讲师和传道人。”——《波士顿先驱报 Boston Herald》，美国

“索忍尼辛的著作证实了魏恩波的话。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魏恩波和他创立的‘向共产世界的宣道会’吗？”——《宗教改革 Reformatio》，瑞士

“索忍尼辛和魏恩波都是现代教会历史上的巨人。”——《Dagen, 达根报》，挪威

“魏恩波牧师对人类敌人的宽容，是错误的。他表现的爱与慷慨甚至超过了上帝。上帝没有与路西弗（撒旦）分享面包，而是用火焰剑将撒旦赶出了乐园。当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时，上帝也没有宽容他们，而是赶出他们。耶稣在圣殿也把商人鞭打出去。”——《Vatra, 罗马尼亚移民杂志》，美国

“卡特总统评击俄罗斯的践踏人权，但却忽略了中国的同样恶行。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中国缺少了抗议的声音。中国没有人像魏恩波。”——《信仰生活 Life of Faith》，英国

“就如圣保罗，犹太人魏恩波飞越全球，传达信息给每一处：帮助地下的基督徒。对我们，魏恩波牧师不仅坚固了基督教，也坚固了罗马尼亚全国的百姓。”——《Cuvaniul Romaneses 罗马尼亚移民报》，美国

“魏恩波通过他的彻底自我牺牲，给西方人看见真相。以致无数人支持受迫害的基督徒。”——《Neue Bildpost 报》，西德

“魏恩波牧师足以叫最粗野的职业足球员也自叹不如。他的声音野蛮。他的结局必然悲惨。他因为非法印刷和传播宗教宣传品、煽动信徒反对当局而入狱。他是一个中邪的牧师。”——《Nauka i Religia 期刊》，无神杂志，莫斯科

自从我抵达西方，十六年来就谣传不断。有人称我为现代圣人，有人说我是恶棍。有些过去攻击我的人，如今成了朋友；也有些曾说我好话的人，改变了主意。是什么引发了这些争议？我相信，这是因为神使用我创立了“基督向共产世界的宣道会。”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宣道会？

在写这本书时，我经常看到 1959 年我被捕后，我妻子萨宾娜 (Sabina) 在后面追赶警车的场景。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我似乎看见共产国基督徒们在我身后尾随，喊道：“大声说出来，为我们大声说话”。

他们的呼喊促使我成立这宣道会，也促使我写下这些经历。

我不信一般所谓的历史，我只信事实。在圣经里，没有“历史”这字。所有的时代，都像是一个不断展开的事实，就如一部电影。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事，每个动作都有其前因与后果。其实当那卷电影的胶卷未转动时，所有的故事都有了，它们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当电影上映时，各项事物才会看来

彼此关联。同样的，我们这宣道会的成立，成功和失败，早已经存在上帝的卷轴上了。只是我们人类只能每天发现一点新发展。

我还要补充一点：除非你从一个特定的观点出发，否则你就无法写任何历史。连圣经本身也是。圣经作者们写的，不仅仅是故事，也带有他们个人的感情。因为写书的人，总会带有主观。

例如，《历代志》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利未人，因为在他书中多次提到利未人（共有一百次）；而《列王记》中只提及利未人一次，《撒母耳记》则提了两次。这三本书写的，其实都是同一朝代，同一君王。还有，我们也可以猜出作者的太太是什么支派。《历代志》提到犹大支派 102 节，81 节提到利未支派，而其余十个支派总共只有 186 节。

人不能、也不该写纯客观的历史。圣经中有十七处提及雅各的十二子——每一处的次序都不相同，都是根据作者的个人喜好。一位没有自己个人喜好的人不是人，也不应该写作。甚至耶稣也有自己首选的门徒，父神也有一个首选的国家。圣经历史中所显示的偏好，证明它是神的启示。

我写这本书不是作为一部学术历史，而是作为一首对地下教会的爱之歌。这书除了历史事实，还有其他元素。

第一章

开始

圣经中没有零

这一切都是从共产罗马尼亚的一间牢房里开始的。那时是一九四八年。

当时我被单独监禁在地下三十英尺。当局夺去了我的教会、家庭、自由、健康，甚至连我的名字。绑架我的人不许我说出自己的姓名。于是一般的狱卒都不晓得魏恩波正在他们的狱中。共产党人尽力把我变成一个零，但他们不成功。

福音书提及耶稣用七块饼喂饱数千人。

假设门徒们没有七个饼，只有三个或一个，将会如何？群众仍然能吃饱。事实上，在另一个场合，耶稣只有五块饼。但喂饱更多人，收拾的零碎也更多（马可福音 8:19-21）。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侍奉上帝。祂的祝福并不取决于你奉献的大小或数量，而在你奉献的精神。

假设我没有面包奉献又如何？这是不可能的。圣经所用的三种语言，希伯来语、亚拉密语和希腊语，都没有“零”这词，也没有零符号。根据圣经，没有人能空手到耶稣面前。你再贫困，也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带同，就是那个自称“一无所有”的人。因为你确实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你自己和你的赤贫。

谁是地下基督徒？

一个在牢房里，被指定成为零的人，想帮助受迫害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宣道会的起源。我和许多罗马尼亚人一起在监狱里多年。当苏联军队占领我的祖国时，我就遇到苏军中的苏联地下教会。后来我又遇到来自各共产国家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故事更能帮助你理解他们。

在立陶宛，有一位刚出狱的基督徒写道：“我的外表并不吸引人。在奴隶般的劳改营中，我在地底下工作。那时一宗意外摔断了我的背骨，以致驼背

。获释后，我去拜访一个基督徒家庭。那儿有一个孩子盯着我问道：‘叔叔，你背上驼着什么？’我确信他肯定会发笑讽刺。但我依然回答说：‘是驼背。’

“‘不，’那孩子说，‘上帝就是爱。祂不会给任何人畸形。你有的不是驼背，而是肩膀以下的盒子。这盒子里有天使的翅膀。有一天，盒子会打开，你就能用这双翅膀飞向天堂。’

“我开始高兴地哭了。即使是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仍在哭泣。”

这些儿童和前囚犯便是共产国地下基督徒的特征。

我们收到一封来自罗马尼亚的信，告诉我们一位共产党员，就是前秘密警察局长，现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他听了我们的广播节目，得到光照，就完全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接下来的周日，他来到一所浸信教堂，公开祈祷并请求宽恕。会众们都知道他的过去，都和他一起哭泣。党方马上开除他的党籍、也不许他继续当董事。于是他就靠着干一份劳工挣钱养家，但他却很喜乐，因为是属于主了。

殉道教会的许多成员，都为基督放弃特权地位。

俄罗斯无神论杂志《Nauka i Religia》描述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儿童。记者称，在基斯洛城（Kislovodsk）的一场宗教崇拜后，他与一位十一岁的女孩交谈。

这女孩真诚的相信，当她祈祷时，仁慈的主会看着她微笑。她说，“上帝存在。我亲眼看到了祂。我不相信那些说祂不存在的人。”

另一个小女孩亲吻了耶稣被钉的圣像。然后她也让自己的洋娃娃亲吻那圣像。人问她原因，她说：“主耶稣很认真的看着洋娃娃。我看见祂这样看。”我也确信上帝对小女孩们玩的洋娃娃非常感兴趣。我也相信这些受无神统治的儿童和成年人，该获得帮助。

扎里亚（Zaria Vostoka）描述了在苏联的苏胡城，当局对一群成年信徒的审判。他们的罪行是在树林教导二十个儿童有关基督信仰。一位无神信仰的父亲托普（Topuria）惊讶地发现他的儿子也在这群儿童中。当这些儿童被传唤供证时，托普就大声鼓励儿子公开针对众被告。可是那男孩诺达（Nodar）却回答爸爸说：“爸爸您是我地上的父亲。我的天上的神，却是我们的永恒的天父。”成

年的信徒们被判处两到五年的监禁。他们自己的孩子们被当局夺走，不能再见。

被苏联驱逐出境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岛》第三卷中讲述了一位基督徒的故事。那位基督徒没有出版过任何讲道集，也没有上过电视台，或举行过任何群众大会。人们甚至不肯定他的名字，索忍尼辛只说：“他的名似乎是西索（Alexander Sisoiev）”。

正如信经中没有提到耶稣的讲道，只说祂“在本丢彼拉多的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埋葬。”历史也只告诉我们，古格拉岛的那人，也许叫西索，是一位传福音的人，在肯吉尔集中营（Kengir）被枪杀。他曾在监狱多年，享受与主的安静时光。

在那监狱，枪杀无辜是常事。但西索却是一个异类。看见他的人“马上知道他跟耶稣同在”，尽管他像彼得和约翰一样没有受过教育（使徒行传 4:13）。在这殴打和虐待通行的地方，当他被枪杀后，整个营地的 2500 名普通囚犯（包括杀人犯、窃贼、和小偷）和 500 名政治犯就都骚动。他们拒绝工作，又袭击警卫。他们的第一要求就是严惩那些杀死这名基督徒的共产官员。

最终，共产党使用暴力镇压，击毙约七百名政治犯和罪犯。这些囚犯用死表达他们对这基督徒的爱

和声援。我们却不晓得这基督徒，只知道他常安静在神里面。即使是在多人的普通牢房，他也有自己的安静空间。

也许对我们，成为像那个“名字可能是西索耶夫”的样式，比参加《传福音方法》的研讨会更重要。

古巴总统卡斯特罗（Castro）出席观看一名基督徒的死刑。当这基督徒双手绑在背后时，卡斯特罗命令道：“跪下求饶。”基督徒大声回应道，“我不跪向任何人。”一名神枪手就射穿他的一个膝盖，再射另一个。卡斯特罗狂喜笑道：“你看，我叫你下跪，你就必需跪下。”然后枪手慢慢把这基督徒杀死，选择枪击他身体的非要害部位，延长他的痛苦。

魔鬼本身就是通过这些反基督教的独裁者来运作。我们又听到牠的试探：“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太 4:9）。

“上帝已死，宗教是谎言，”这是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Albania）每天流传的口号，阿尔巴尼亚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该国的两百名牧师，只有十四人还活着，其中十二人在集中营。两千座清真寺和教堂被毁。首都迪拉纳（Tirana）的大教堂变成了体育馆，清真寺变成了

公共厕所。共产无神论恐怖活动的结果是什么？当局发现有一百零十六对年轻情侣在菲尔城（Fier）举行集体婚礼。阿尔巴尼亚共产媒体说，许多基督徒的手掌都纹有一个十字架，穆斯林则会纹一个月亮，于是人们从第一次握手，就清楚表明他们的信仰。

乙先生曾是罗马尼亚的党方国家检察官。后来他与党发生冲突，就被同志们投入监狱。他正好与魏恩波牧师同在一间牢房。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饥饿的监狱转移到矿井奴役营。在奴役营，囚犯们由于必须操劳，所以当局给他们比较多的食物。在抵达这奴役营时，他在营的大门遇到了一个陌生人。那人立即给了他一些食物，并在他吃面包时坐在他旁边。前检察官问那位好心人被判刑多久时，那人回答是二十年。

“为了什么缘故？”

“因为给一位逃避警方追捕的牧师一些食物。”

“是谁为这善行给了你这样的惩罚？”

“你便是当时指控我的检察官。你不认得我，但我却认得你。基督教导我们以善报恶。我只想告诉你，给饥饿的人一些食物是正当的。”

医生蒙泰（Munteanu）博士的父亲是一名东正教的一名院长。由于他为教会工作，共党就把他杀了。这医生最终与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们同牢。当那些凶手们生病时，他不单给他们医疗，还把自己的粮食也给他们。

基督徒佐特（Tsotsea）被不公正地判刑二十年。过了一段时间，审判他的法官也入狱，而且病重。那种病是令人厌恶的。在监狱条件下，他的排泄物和尿液必须不断清理。狱室没有自来水、棉花或床单。受害者佐特爱他的敌人，就照顾这前法官如同兄弟，直到法官去世。这法官在死前就与神和解了。

单独牢房的幻象

当我在监时，没有听说过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面世。这些古卷中，有一些提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我发现这也是圣经的思考方式。

自从我到了西方，多人指责我一味使用黑白描绘一切：基督徒是正义的，无神论者是偏差的；基督徒是光明的，无神论是黑暗的；共产是恶的，自由

世界是善的。我接受这个责备。耶稣从未使用过“灰色”一词；新约也没有。

事实上，黑暗之子共产党人通过恐怖和欺骗占领了罗马尼亚。数以千计的光明儿女被关进监狱，我也是其一。他们单独监禁我。的牢房里没有任何事情打扰我。我们囚徒没有圣经，也没有任何其他书籍，甚至没有一张纸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只能看着发霉的墙壁。

那时我就发现，我过去的牧师经历，都是肤浅的。我感到神的话最好是闭嘴传扬。耶稣在三十岁之前，几乎完全不提及神。就是在三十岁之后，祂也很少说话。祂何必多言？一朵花会喊叫吗？对于耶稣来说，存在本身已经是足够的辩论了。

我是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与古希腊、亚述和古埃及人不同的是，古代以色列没有留下任何绘画或雕塑。犹太人不明白，神既然已经创造了山川河流、郁金香和儿童，我们何必再费功夫制造次等的货色？犹太人对生命的理解与现代科学不同。他们并不刻意去“感受生活”，就如现代艺术家常提的。他们从周遭的人与事中看见神，发现祂是不可描绘的。

古代犹太人留下的，唯有一些敬畏神的诗歌，这也是因为神的吩咐。当你与神建立关系时，最好的

沟通就是沉默。“主在祂圣殿中；愿全地都在祂面前静默”（哈 2:20）。

所以我并没有因为缺少笔墨而苦恼。有什么文字可以形容我心中的话？满溢的沉默自然发声。

我听到了不能形容的言语，因为它既不是物件，也不是动词或形容词。它已经变成了肉身。

我已经达到了另一种状态。只要心中起意，就能唤起一个人、或一种香气、或花朵、食物、饮料、歌曲、音乐、天使、男人、女人等。无论我心中所想的是什么，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最容易唤起的是耶稣。梵语的心，hrdayam，词源是hrdy（心）与 ayam（神）。但hrdy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总是写成hrdayam，意即“神心”。少了神，就没有“心”。原来一颗没有神的心，不配称为心。

我多有幻想。我想象如果我是教皇、或是美国总统、或是一个商人、或是一个环游世界的人、或诗人、或乞丐，我将会做什么。我也梦想如果我再次年轻，我会如何生活。

圣经提及犹太王希西家年间的一件奇事：日晷上的影子竟然后退了十度。假设这事发生在晚上八时，时间将会退回到早上十时。这就能让国王重新安排当天的行动。他就可以避免那日的误行或误言。

我想，如果我也能重新成为一个男孩，再开始我的生活，或许我就得以避免许多错误和罪恶。

在上帝的计划中，梦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摩西写及一位法老，一位十足的国王。这法老不仅在清醒时是王，在睡梦中也是。他的潜意识也在思考人民的福祉。这位善良的梦者遇到了另一位“梦见他人之梦的人”（创世记 37:19）。这梦见梦者，却来自社会的另一个端：一个外籍的囚犯。这囚犯的罪名，是强奸未遂。他名叫约瑟。就因这两位梦者联合，埃及就免遭饥荒，也救活了邻国的饥民。

在我坐牢的孤独的时光，我也做梦，我非常重视梦。我梦见的，有时是噩梦，有时是轻松愉快的梦，但也有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梦。

我最心爱的梦，就是成为基督理想的新娘，爱抚祂而不是侍奉祂。

我有时间思考很多话题。孤独的岁月是漫长的。

其中一个常出现的梦，就是有一天我能到西方去，告诉自由世界有关于共产国。说黑暗之子如何压迫人。我们又能如何帮助。

这梦成了我的预知。《列王纪上》提到所罗门王建造耶路撒冷圣殿时，使用了一个特殊的希伯来字 behibanoioh，这是动词“建造”的一种形式。直接的翻译，就是指那建筑物自行建立。原来圣殿不是人造的，而是自行建立的。人类只是给它一个物质的外形。

同样的，在主耶稣的比喻中，一个被托付一大块银子（当时的货币，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二十年的薪金）的仆人告诉主人说，“你的那块银子已经变成十大块了”《路加福音 19: 16》。他并不说：“我凭着我的才能，赚了十大块。”许多事业也都是自行发展的。

同样的，我在梦中并没有看到自己或他人创建了任何机构。我只看见到一个机构自行成立了。我预见了我未来的活动。我不必决定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必思想它们。

在监狱里思考秘密传教

但显然我并没有一直在梦中，我也在思考。

我只肯定自己必定做一件事，就是不煽动人仇视共产党。我也爱共产党。

亚历山大的斐洛 (Philo of Alexandria) 描述彼拉多为腐败、侮辱、掠夺、阴谋、傲慢、屡次谋杀无辜，又野蛮。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Flavius) 也对彼拉多有同样的形容。《塔木德》(Talmud) 对耶稣时代的大祭司也有非常负面的评论。但福音书却不这样说。因为写福音的人心中没有仇恨。他们只说信心和行动的话。他们不会说令他们对手显得卑鄙的话。

爱是基督徒唯一可能的态度。一棵树不会因为樵夫砍伐它，就拒绝给这樵夫遮荫；月亮也不会一个人行恶，就拒绝给他月光。

我的职责是将上帝的话语 (真光) 带入共产国家。

我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名走私犯。出埃及记 35:3 中写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的住处生火。”但利未记 6:5 却吩咐祭司要确保坛上的火永远燃烧：“每天早上必须上面点燃柴火，”包括安息日。这两条命令是彼此对立的。走私圣经也是与不可欺哄人的命令对立。

在极度饥饿时，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系统思考。我只能偶尔思考。我当时也努力保持头脑健康，因为知道头脑太宝贵了，不能丢失。如今我才能将当时的想法系统化。

我们真的不必欺骗，不必违法吗？给无知的人永生的信息，有错吗？进行反共的战斗，是按照主的旨意。在这种战斗中，没有罪孽能伤及你；因为你是主的使者。

神命定以色列人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任何其他地方献祭都是违法。然而先知以利亚却违法献祭（王上 18:32）。神允许以利亚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特殊的行动。我们的今日也是。

我知道共党会阻碍我们的活动。他们已经渗透罗马尼亚和其他共产国家的教会。如果我们在西方建立一个宣道会，他们肯定也会监视。

我记得德雷案（Dreyfus case）。当时法国军中的一名犹太军官被判叛国罪，流放在魔鬼岛

（Devil's Island）。十年后，法国情报局才在德国大使馆的废纸中发现了一封德国武官写的小片段，证明叛国的不是德雷，而是埃斯特

（Eszterhazi）少校。德雷获得平反。在这起案件中，法国司法部受了误导。共党也会试图在我们中间制造误会。

因此，我设想的宣道会即使在西方也必须非常小心。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所谓的碎纸机。现在我们在“基督向共产世界宣道会”的办公室里就有一架。我们不会随便扔掉任何一张纸。我们也不保留任何

档案。我们把重要资讯保存在私人住宅的缩微胶卷中。在紧急情况下，一切都能在一分钟内烧毁。过去我没有想到解决方案如此简单。

我在隔离牢房中学到的沉默是有用的。我对福音的沉默与被遗漏的故事产生兴趣。福音讲述了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扫罗。我个人更想知道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如何归信耶稣，并取代另一位雅各（西庇太的兄弟）的重要地位。我也想知道被扫罗杀害的基督徒英雄的故事。但圣经作者对这些事情却沉默。它必有原因：因为提及这些事，就暴露了一些当时需要隐藏的人。因此，我们也必须谨慎，知道哪些事不可提。

我们必须向天使学习，他们的语言就是沉默。只有在赞美时，他们才发声。其实天使也只能沉默，因为他们不能对神说“不”，原因是他们太爱神了。他们也不必对神说“是”，因为顺从神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他们就不说话，只遵行神的旨意。

基督徒必须说话，但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说。

现在我意识到我许多监狱的梦想，只是幻想。那时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我不知道普世教会几乎没有传教活动。如果所有基督教传道人都放下自己的岗位，到中国去；每十万中国人，才有一名传教士。原来世界上 94% 的传道人只能说英语，于是只

能向世上 9% 的英语人口传福音。其余 91% 非英语的人口，只有寄望于六巴仙的传道人。

我原本只想建立一个向共产世界的宣道会。但如今发现，我们的活动其实广泛得多：它包括鼓励西方教会更努力传教，换句话说，就是去真正的爱耶稣和全人类。

二十亿人不知道那超乎万名的圣名，或者更糟的是，他们听到了有关祂的扭曲信息，以致他们回避祂。

任何能给人的最大礼物，就是永生，并其中的无限可能。明白了这个，一个人就不再担忧自己的有限岁月。他的年日就变得有意义，而不只在计算步向死亡的日子。

一项伟大的任务摆在我面前。

无论如何，当太阳下沉时，它并不曾失落。判处二十五年苦役也不意味魏恩波完蛋了。据说，一群毛虫正在为一位同胞吊丧。它们不晓得，当它们为那同伴安葬时，在它们头上飞舞的蝴蝶就是那位同伴。

忘记殉道者就是忘记基督

耶稣和信徒的关系是独特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因为没有适合的对比。它有些像输血：一人的血变成了另一人的血。如果接受血液的人，在受血不久就受伤流血，那么他流的不再是捐献者的血液，而是他自己的血。捐献者的血已成了他的血。在心脏移植也是如此。那颗心不再是前主人的，而是新主人的。同样，耶稣和相信之灵魂，也是如此。耶稣把祂的灵赐给我们，这灵就成了我们的灵。

但同时我们的灵也被输入耶稣里面。这是一种兑换。

路德说：“天父告诉基督，‘你成了否认主的彼得、又成了逼迫的扫罗、出卖的犹大、犯罪的抹大拉。’于是律法看耶稣罪大恶极，就判他死刑。耶稣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杀人犯、小偷、说谎者、通奸者，不是因为祂犯了这些罪，而是因为祂将这些罪行据为己有。”祂成了犯罪的我，我成了正义的祂。路德在对《加拉太书》的注释中大胆地说：“基督徒就是基督。”

他是站在圣经的立场上。基督教最伟大的导师们也都教导这一点。圣依纳（St Ignatius）写道：“基督是我们不可分割的生命。”圣托马斯（St Thomas Aquinas）说基督和基督徒是“准同一的神秘人物”（quasi one mystical person）。苏格兰

教理问答教导说：“基督并不是与祂子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曾有一位牧师试图向一位铁路工会的大领袖传福音，可是不成功。后来发生铁路工潮，工人们严重罢工，众工友面对饥饿和不断增加的债务，都拉紧腰带，坚持诉求。牧师就去见这位大领袖，说，“我有一个建议，可以让你赢得这场罢工，取得公众的同情，舆论的支持。”这领袖第一次对牧师的话感到兴趣。牧师就解释说：“为了展示工人们绝望的处境，唤起人们的同情，只要把你儿子绑在铁轨上，让机车碾过就行了。”这位领袖大怒说：“我宁愿全世界都饿死，也不愿牺牲我唯一的儿子！”牧师就说，“神爱世人就像这样。祂牺牲自己的独生子，换取各国，各族，各阶级的人得救。”

上帝本可以派一位古代圣人或天使为我们而死，但祂却赐下天上最好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意识到这牺牲的程度，我们的心就被吸引悔改。耶稣在受难日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死亡不能束缚祂。死亡是一种低级现象（就如粗略的包装纸，）它不能永远封闭那最好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战胜死亡！

上帝赐下祂最好的。在我周围的其他牢房里，有神的圣徒，他们按照利未记 6:20 的命令，奉献最好的。这些人中，有些还生存；也有许多死了。

我梦想他们不会被人遗忘。忘记他们就是忘记基督，因为受苦的基督徒就是基督。通过这些信徒，基督本人就在祂神秘的身体（教会）中，再次被捆绑，迫害。

西方人访问东欧

与此同时，国外的基督徒也准备实现同样的梦想。他们成了地下教会的同工、朋友和捐助者。这不是因为我著作和布道的功劳。其实书本和布道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具有魔力。它们只是强化了现有的人心。共产党对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多年的洗脑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人民一有机会就会起来反抗。人的生命有它的路向。它主要不是因为媒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媒体的影响。我的挑战之所以获得接受，是因为西方的一些灵魂在创世之前就受命为神的孩子。他们心中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任务。

1964年六月，我因大赦而获释。当时我才服刑十四年，还没有完成二十五年宣判的刑期。随后我就得以脱离共产世界（整个共产世界，包括没有坐牢的人民，也在一种全国型的“监狱”中），到自由的西方。

我发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世界。一种是与共产党妥协的，另一种则不。前者不单包括共产国里的许多基督徒，也包括了西方的许多主教和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经专门询问我的情况，并给我贫困的家庭实质性的帮助。但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也不热衷聆听我们面对的压迫。他们从来不问这些压迫。当他们在拜访共产国，上台讲道时，他们会仔细推敲每一个字，避免开罪接待他们的共产党人。

这原没有什么问题。在教会历史中，领袖们面对逼迫时，总有不同的态度。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当狼群又多又强时，眼巴巴的看狼群吞食所有的羊群和牧人是否明智？英勇牺牲，让整个教会都被压碎是正确的做法吗？为何不依随狼群，混在它们之中，与它们一起嚎叫，让狼相信我们也是它们的一份子，好庇护一部分的教会？”许多教会领袖就选择与敌人友好。我可以保证，罗马尼亚已故大牧首查士丁尼和已故信义会主教穆勒和阿尔盖都不是叛徒，他们的意图是最好的。许多浸信会、五旬节派和其他官方牧师也是这样。

西方教会领袖中，也有许多抱着同样的心态。神必看他们的心。如果他们的心意是纯洁的，他们就会像那些选择殉道的人一样，必得主的称赞。

我毫不怀疑，一些西方的教会领袖的眼睛明亮，晓得真情。但眼瞎的领袖也不少。他们真的上了共产党的当。他们只看到一个虚假的俄罗斯、虚假的罗马尼亚、虚假的红色中国。当你持旅游签证访问这些监狱国度时，你只能看到共产党的伪装。

这些西方领袖访问赤化的国家时，为什么不先了解共产的学说？如果他们读过 Voprosi Filosofii 著的《哲学问题》，他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在共产国家里不可能有宗教自由。这是苏联杂志上的一则报道：“在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中，拥有自由的良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否认宗教，击败宗教，把宗教在生活中全然排除。”

当时我不知道一些西方教会领袖与我们许多罗马尼亚官方神父牧师一样，都在努力舔共，为共产党效劳。那时我只意识到他们正在与黑暗之子妥协。

另一方面，也有些基督徒甘心冒险，忠于基督。但我不相信他们比妥协的人更好。我们在世上都是彼此不认识的。我必须在评判他人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立场。我曾在共产主义监狱里呆过，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阴暗面，那些未曾挨过共产监狱的人，不能明白其中的滋味。我个人是不能与共党妥协的。

好些国外的教会领袖在获得允许，到共产国传道时，竟然没有带自己的翻译员。他们讲道时小心不冒犯党方。但即使如此，党方提供的翻译员却没有如实地翻译给听众。他们任意改变西方人讲的任何内容。

来访的基督教领袖只看到了我国美好的外貌。他们没有看过我国的共产监狱，甚至也不想去参观监狱。我诧异为什么。多年后，当我在南非时，我要求探望被监禁的共产党人，也就获得允许。在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我也去探望过其中的监狱，看看其中的情形。但那些拜访共产国的西方教会领袖，却从来不去监狱看看弟兄们的情况。

我知道，这些领袖们通过妥协，可能获得共党的一点小让步。每一项小让步对受压迫的基督徒都是有价值的。但和这些教会领袖们同在一起，我就感觉不自在。他们为这些小让步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教会失去了作为真理支柱的信誉。

回想当我还在罗马尼亚时，在第二次出狱后，又有西方的牧师到我国拜访。但这次共产党却不允许他们上台讲道。那位英国牧师和一位美国牧师参加一所浸信会的礼拜。他们必须安静地坐在会众的长凳上。当局禁止他们开口说话，好像他们说的话可能含有炸药。他们试图拍下会众的照片，当局也不喜

欢，以为违法。当局允许他们送圣经给神学院的每一位学员。但在他们离开后，这些圣经就马上从各人没收了。一名学生设法将一张纸塞到那位英国牧师手中，上面写着“当你得平安时，请纪念我”（创世记 40:14）。

一天下午，我去一所德语的浸信教堂。那位英国牧师斯图尔（Stuart Harris）当时也在场，他是“欧洲基督教传教团”的主任，后来又担任“英国向共产世界宣道会”的主任。与他同行的还有莫斯利（John Moseley）弟兄，当时他正在“美国向欧洲宣道会”工作。他们听说过我。他们一直在找我，但又不敢问任何人。

礼拜完毕后，我用英语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环顾四周，我发现我们周围都是党方人员，幸好这些党员们都不懂英语。我想邀请斯图尔和莫斯利到我家。但我不能直接把地址给他们，因为告密者会看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把街名的字母一一念出来，中间有间隔。那天晚上，他们就来到我们当时居住的阁楼。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我告诉他们共产国家基督徒的遭遇。为帮助受迫害的圣徒做点什么的梦想，不再只是我个人的梦想了。

其他外国访客也跟进。一天下午，我的妻子把我从午睡中叫醒。有五位年轻人来访，包括美国人、

瑞士人和英国人。从那时起，他们就给我们带来了通过海关走私的圣经。关于迫害的消息就开始在西方传播。

1965年12月6日，我的妻子、儿子和我得以离开罗马尼亚。这一天正是东正教的圣尼古拉的节日（囚犯护卫者）。

警方收到外国给我们一家的五千英镑的赎金。挪威以色列传道会、希伯来基督教联盟和我的家人合力出这笔钱。共产国家实行奴隶贸易。他们像卖牛一样出卖公民。一位老朋友阿努查（Anutza Moise）夫人为我们的自由，与罗马尼亚当局谈妥这项交易。

第二章

到西方去

美丽的挪威

我们首先去意大利，在那里我能够与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信义会世界总会取得联系。然后我们去了巴黎几天。

从巴黎，我一家三口（包括儿子米海）就飞往挪威。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我们抵达挪威之前，已经有电报警官众教会不可让我讲道。信义总会的意图是好的：他们担心如果让我公开反对共产，就可能危及那些还在罗马尼亚的信徒，阻碍了将来买赎其他人的可能性。

但事后证明，这些措施都是杞人忧天。大家都承认，罗马尼亚基督徒并没有因为我的布道和出书而受苦，相反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允许印刷《圣经》，如今因信仰被监禁的基督徒人数非常少了

。我们也知道有些罗国基督徒因我们宣道会施加给当局的压力，而获得无罪释放。

但是，当时来自日内瓦的信义总会领袖们，却扮演摩西的角色。摩西对红海的犹太人说：“站住，看主的救恩”（出埃及记 14:13）。但上帝对摩西的话却是：“叫以色列人往前走！”祂不要摩西站着观望，而要做点什么——就如“举起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出 14:15、16）。

但禁令已出，我又如何发声？“挪威向以色列宣道会”是支付我们的大部分赎金的团体。他们将我们送到了个极其安静的疗养院。尽管他们的动机是善的，但那个度假屋的安静孤独却让我想起过去的单独监禁。我想说话和写作。我想从屋顶上大声喊出美丽的地下教会。

即使在今天，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梦见自己在监狱里。我不信我梦中的人离开我们很远——我相信现实中的人真的出现在梦中，就如真实的天使出现在约瑟梦中一样（太 1:20）。在监狱的地下世界中，有英雄，也有被击垮的人；有死在赞美神的歌声中的，也有因惧怕而成为告密者的。他们每晚都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希望我为他们开声。

在凌晨 5 点，当自由世界的人还在睡着，我和狱中的众兄弟姐妹们就被锣声吵醒——这是囚犯们必须开

始工作的信号，从中国海到波罗德海和多瑙河的数以百万计的监狱奴隶，就开始奴役了。

囚犯的梦想是美好的。一整夜你都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你吃得很奢侈；你也可以阅读圣经，上教堂。但锤子重击铁轨的尖锐声惊醒了奴隶们。这些苍白、肮脏的“骷髅”，眼睛周围有黑眼圈，而且凹陷。我们彼此都不敢看对方，因为太难看了。我们必须忍受饥饿和殴打，有时在齐膝深的积雪中劳作，有时在烈日底下。

我也是他们的一份子。

我也与被关在精神病院的信徒们同在。这些神志清醒的人，因为时常祈祷，就被共产当局当作是疯子，送往精神病院。党方把他们捆绑、堵住嘴、蹬踢、然后就是不断地电击，直到他们真的疯了。

地下圣徒的美丽在这黑暗的背景下，就格外显眼。

博鲁弟兄（Borushko）深知代价，他在法庭上挑战众神说：“苦难是基督教的神经线。教会只要受苦就能生存，因为主基督殉难了，也要求我们这样跟随祂。”另一位基督徒克拉斯（Krasnov-Levitin）弟兄在被监禁八年后写道：“我未曾在任何地方，比牢中更快乐。。。在监狱，神是如此

接近。在那些时候，我请求神说：‘我的上帝，请让这段时间尽可能的延长。这是我一生中最光明的时光。’...我不快乐中找到真价值，在最糟糕的囚禁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

我很想讲述一个基督徒孩子的故事。一个无神论者记者问她：“你喜欢图画书吗？”

她回答说：“是的，就是那些讲述我们的神如何受苦的图片。祂为我、为你、为所有人受苦。”

当记者给她一本图书时，她却拒绝了。她说：“这是不敬虔的人写的。”

“你的鞋子也是无神论的人制造的，但你却穿着。”

“那就拿去吧！我会像我的神一样赤脚行走。”

“你会受冻的。赤脚走路也很不舒服。”

孩子回答说：“也许会吧。我的神曾经受苦，祂也教导我们受苦。”

我无法保持沉默。

由于疏忽，奥斯陆的美国教会没有收到世界信义总会的警告。所以那是我去的第一个教堂。1965

年圣诞节，该教堂的麦牧师 (Rev Myrus Knutson) 听说有一个奇怪的家伙到了孩子们的主日学听课。他是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人，可能是从监狱或疯人院逃出来的。此外，当他听到老师向孩子们讲述耶稣的故事时，他就哭了。有谁听过在一所像样的教堂里，会有人为耶稣钉十字架而哭的？

麦牧师就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要我陈述我的背景。听了之后，他大感兴趣。第二天他就到以色列驻挪威的办事处，查看事实。这魏恩波果真在共产监狱里度过十四年吗？得到证实后，他要求办事处指出我的照片。办事处墙上的相片中有我，但与现今的我完全不同，我的外貌变了很多。麦牧师坚持不懈，寻找能认出我的人。他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关系，向罗马尼亚询问我的情况。罗国的答复是肯定的。

那时开始，自由世界的第一个教堂讲坛就交给我使用，我每个星期天都在那里讲道。同时我也继续在美军教堂讲道。那儿的牧师是卡修上校 (Colonel Cassius Sturdy)。

那些首次听到我信息的人，就开始意识到一些新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些过去曾有价值的事物，如今重新露面。

圣保罗到帖撒罗尼迦传道。他讲说“**基督必须受难**”（使徒行传 17:3）。他的听众正确地评论说，这信息意味“搅乱天下”（第6节）。犹太人期望弥赛亚是一位最优秀的人，一位来自天堂的使者，祂将使正义在地上获胜，创建一个理想的世界，也许就如一个理想的联合国、或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或梵蒂冈等组织，由所有信基督的人组成，逐步推行社会福音，使天下太平！

早在潘霍华（Bonhoeffer）之前，犹太人已经相信人类已经成熟了，肯定会拥抱这样一个可爱的完人，那将来的“弥赛亚。”

保罗却说：“不，爱与真理的化身必须受死。”
連所有跟随这弥赛亚的人也必受迫害。

我展示世界三分之一地区的逼迫，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受威胁。

前景是黯淡的。教会必须受苦，“**[兽]获得能力，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启 13.7）。圣徒唯一的希望是分享基督的经历，就是基督的死里复活。

我的听众常听外来的讲员。他们习惯在礼拜结束后，对讲员说，“我们很享受你的讲章，真的很动听。”但我的讲章却令他们哭泣。

谈到基督在祂神秘的身体（祂教会）中遭受的新苦难，我不得不说出令祂受苦的。我指出了一种政权。于是就有人指控我说：“魏恩波宣扬政治”。

参加美军教会的，包括许多美国大使馆的职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外交与政治。他们不希望周日也会听到有关于政治。可是我的讲章却常提政治。

从那时起，人们就争论这话题。圣经有些书卷，完全谈政治；就如《俄巴底亚书》和《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甚至一次也不提神的名号。真正的讲道涵盖生活的各层面。在讲道中避免政治是错误的。

但总的来说，众教会都给我大大的欢迎。

第一个宣道会

奥斯陆美国教会的一位成员是英国女士吉尔（Jill Holby）。她把我介绍给大学讲师维蒙（Vemund Skard）一家，又安排了一场小聚会，其中一位参与者是退休记者奥弗（Overbye）。维蒙和奥弗都是有毅力的人。他们就给特罗姆城

（Tromse）的主教、多产作家蒙拉德（Monrad Norderval）一通电话，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有来自罗马尼亚的魏恩波。挪威的众教会都不让他上台讲道。因有教牧长警告说，这人可能会颠覆世

界！”蒙拉德回答：“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于是我们就去北极圈。特罗姆（Tromsø）大教堂是第一座让我上台的挪威信义会。第二所是挪威五旬节派宏大的菲拉铁菲教堂。于是禁令打破了，多数信义教堂都开门了。“挪威向铁幕的宣道会”随即成立。这是我们在西欧首先成立的宣道会。

至于穿针引线的霍尔比姐妹，立刻就获得神的奖赏。因为直到那时，她四岁的儿子连最简单的单词也不能发音。现在他却开始说话！他甚至可以说：“理查魏恩波，哈利路亚！”在这以前，说“早安”也太难了。

媒体参与了我们的事工。这些采访引起了轰动。于是不久后，几乎没有一家报纸不刊登有关共产党的暴行。

我受邀与北约的官员们交流。北约没有任何特别政治的意图。但华沙的共产诸国却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就是要全球共产化。我只告诉北约官员们有关罗马尼亚共产党如何迫害地下教会。

在问答环节中，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问我，为何民主和共产不能和平共处。由于我站得离他很近，我就利用多年与扒手相处的经验，从容地偷走了他的钱包。然后我举起这钱包，问他说：“现在你是否愿意和我和平共处？”

“把钱包还给我！”

“那么你就有了刚才那问题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歹徒并没有伤害警察。他们只是想保留他们偷来的东西。如果警方允许他们，他们就绝不会伤害警察。当黑帮变得富有时，他们会变得非常慷慨，给服务员大笔小费，给朋友昂贵的礼物，甚至为慈善组织捐款。那时他们最乐意与警察和平共处。

共产政权就如这些“爱好和平的歹徒。”红色中国强占了西藏。“汉人常用的酷刑是强迫西藏男人赤身站着，然后用石头砸他们，或者强迫他们吃人粪。其他暴行包括活埋或利用囚犯作为打靶练习。佛教僧侣被迫像动物一样爬行，同时背诵藏经的祈祷文（西藏通讯社，1975年7月）。我们如果可以容许他们继续这种事，他们就很乐意与我们说温和的话。

红色中国觊觎整个亚洲；苏联奴役了半个欧洲半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区。目前共产党人向西方示好。当然，条件是他们不需要归还他们偷去的东西。

这些北约官员筹了一笔钱，好送我和我的妻子到美国去。我儿子米海不能在罗马尼亚完成学业，便希望能在巴黎进修信义神学院的神学博士。

但去美国的旅程还很未能立刻成行，克牧师（Knutson）就先安排我在欧洲的行程。

挪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索尔（Solheim）牧师是“罗马尼亚犹太宣道会”的总干事，他曾经对我说，“挪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当时我反对。“摩西称巴勒斯坦才是顶好的。”索尔回答说：“没错，摩西的确那样说。那是因为摩西没有见过挪威。”现在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对挪威的基督教也有很高的评价。所有德国信义主教们无一例外地都高喊“希特勒万岁”。挪威信义主教却几乎没有一人这样做。除了零星的例外，全体神职人员都勇敢地反对纳粹主义，尽管这意味着入狱。挪威信义会是第一个抗议共产迫害的大教会。挪威国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这种决议的国会。

我在挪威的教会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挪威教会在国外的传教士，与国内牧师一样多。这是世界各国未曾出现的情形。

英国问题

接下来我们去了英国。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哈里斯（Harris）一家，他们是“欧洲基督教宣道会”的

一个分支，开始到共产国家秘密传教。随着我们的活动扩展到中国和其他共产国，哈里斯牧师 (Stuart Harris) 就成立“英国向共产世界宣道会”。

最初，我们在主日晚间在一座小型浸信会教堂举行聚会。随着人数的增加，我们就使用更大的教堂和青年会 (YMCA)。最后我们使用伦敦最负盛名的皇家阿尔伯 (Royal Albert Hall) 大厅。

在英国人还没有帝国之前，就拥有了一个属灵的帝国。但随后英国却在灵里倒退。早期英国人圣威勒布 (St Willerbrord) 将基督教引入荷兰。圣安斯加 (St Ansgar) 从荷兰将福音带到瑞典。另一位英国人圣帕特里 (St Patrick) 将基督带给了爱尔兰人。圣博尼法斯 (St Boniface) 也是一位英国人，他砍倒了条顿人的神圣橡树，并在他们中间传播了福音。

英国一度几乎统治世界的三分之一，把福音带到新世界。今天，大多数非洲、亚洲或澳大利亚的基督信仰，要么是由于英国传教士，要么就是因为阅读了英国圣经公会提供的圣经。

我进监时，大英帝国还完好无损。当我获释时，英国已经为自己的帝国挖掘了坟墓——他们给殖民地独立。结果地图上出现了好些新国：坦桑尼亚、

赞比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今天，三十一个非洲国家是独裁国家，其中七个由共产党统治。印度在属于英国时肯定有不公平的现象，但独立后，数百万印度国民仅仅因为信奉回教，或信奉印度教，就被杀害。另外也有因为种族（如孟加拉人或比哈里 Bihari 人）而遭杀。在英国统治下，这样的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

英国人是一个帝国民族，没有帝国就不能满足。他们必须回到英国作为基督教堡垒的时代，这也是世界自由的堡垒。然后神的光才会再次临到不列颠群岛。据一些传说，耶稣小时候曾踏足过那里。如果英国不恢复基督教的理想，她注定会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想到这个我就不寒而栗。“英国向共产世界宣道会”给人看见真相。

英国正陷入严重危机中，但她土地上住着一个特异的种族。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英人在危机中越发勇敢。英国的水手是在沉船时才展示他们的内里的力量。英国将战胜她的疾病。

地下教会的场景

当我向英国基督徒讲述有关殉道教会时，他们就如各国基督徒一样，仔细聆听。我引用了一位无神

论讲师何利（Klibanov）的话，谈及一所地下的聚会。在会后，那牧师问何利，“你想今天有多少人参加聚会？”

何利说：“大约一百人。”

牧师回答道：“这意味你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就晓得，我们是一人。基督徒聚会时，无论是两三个、数百还是数千人，他们总是一人。你还未能看见真相。如果你能看见，你就会抛下一切与我们合一了。”

这样的形容地下教会，是最好不过了。这位无神论者的话让我想起使徒行传说，当时的信徒，都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

我告诉英国听众有关俄罗斯一个地下教会打算为一些信徒施洗。这是违法的，可能导致监禁。在慎重考虑后，信徒们决定到市郊的一个养鱼场去。他们听说该处只有一名看守人，而且这位守更人很早就睡觉了。

洗礼后的第二天早上，看守人去找当地的苏维埃村委书记：“同志，给我一份新工作。我不会再回鱼苗圃了。它晚上闹鬼。”

“什么蠢话？共产党不迷信。世界绝不会闹鬼！”

“我必须相信我的眼睛。昨晚我看到大约三十个身着白衣的神灵。他们看起来像男人和女人，但他们肯定不属于这个地球。在月光下，你可以看到他们脸异常的善良和温柔。他们唱着超凡脱俗的歌。当我们喝醉的时候，我们也在酒吧里唱歌。但我向你保证，他们的歌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他们喝了什么酒。其中一人大声说话。他是用我们的语言，但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他们逐一浸入水中。当他们从水里出来时，他们的脸都闪闪发亮。我确信他们是来自天外。我给吓坏了。”

我又告诉英国信徒一位基督徒的话，他刚刚被判处死刑：“我欢喜领受神赐下的各种体形。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非常幸福。以后，我很高兴拥有一个男童的身体；再后，我少年时也很快乐；如今，我对自己成熟男人的身体也很满意。于是当我的身体将要变成骷髅时，不也该欢喜吗？”

另一位被判死刑的基督徒，末了的话是：“死亡意味走出一扇门，进入另一扇”（意即，骷髅不是我们的最后光景。我们的灵魂进入永生才是！这就是保罗说的，这必朽坏的将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就是神创世的目的。）

英国基督徒认真聆听。我们在英国的宣教工作开始得很好。

初到美国

我乘船前往纽约。我的妻子和儿子后来也跟着去了。

美国基督徒去教堂的人数超过了欧洲基督徒：41% 的美国人口去教堂，而丹麦和西柏林仅有一巴仙，西欧其他各国为 2% 至 5%。任何人都不该嘲笑那些仅仅会上教堂，做礼拜，然后什么也不干的人。对一个胆怯的信徒，上教堂已经是基督徒的见证了。不是每个人都是外向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为基督说话；不是每个人都是战士。

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挂名的基督徒。如果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希望重新归回主，他就知道该呼求哪个名字。在土耳其，人们回归神时，由于当地没有基督教，他们就成了忠实的穆斯林。欧美传教士在土耳其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宣教，得到的信徒不足一百人。那些知道带领异教徒得救是多么困难的，就会同意即使是挂名的基督教徒，也会使真正归向神变得容易；因此不应该轻视它。

其次，美国基督徒提供了世界宣教经费的 80% 和世界宣教士的 60%。虽然美国人用于宣道的钱只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但总数却不小。

美国的财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富翁。我在罗马尼亚未曾拥有一辆单车（脚踏车）：在美国，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人也可能拥有一辆汽车，有时甚至是两辆。在美国的超市，我会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并对自己说：‘我不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不需要那个。’ 货架上的所有物品中，99 巴仙似乎都是没必要的。但人生活，不仅需要生活的必需品。贝多芬和达芬奇的作品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世上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圣亚区纳 St Thomas Aquinas 或康德 Kant 的著作，但这些人却叫我们看见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上帝也这样给美国人异常的丰富，让他们享受。

我不同意一位传道人的观点，他说他正在进行另一种斗争：就是叫信徒抵挡富裕之魔。我无法理解富裕如何成了这传教士的敌人。如果他以为富裕就是魔鬼，他便该像亚希希的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si），放弃财富。对我来说，金钱是中立的。一个人可以把钱奉献给神，也可以给魔鬼滥用。富有的博须埃（Bossuet）只能在王宫里感到自

在，神能接纳他，就如接纳一位自我刻苦的基督徒。

但美国的财富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

一项调查显示，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图森市（Tucson），这只拥有 45 万居民的小镇，每年丢弃 9,500 磅完全可以食用的食物——生牛排、咬了一口的苹果、棕壳鸡蛋（而非人们喜爱的白壳鸡蛋）等等。

在加拿大，数千磅黑线鳕（Haddock）被丢弃在船外或使用船舶的研磨机中磨成糊状，当作垃圾倒掉。有些渔船一次航行，就倒掉 100,000 磅。这是因为渔民发现自己捕捞的，已经超过了黑线鳕的国际捕捞配额。

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我看到饥饿的人们每天步行数英里去获取由义勇的瑞典传教士分发的一片面包和一杯加糖的茶。加拿大政府在设立捕鱼配额时是否考虑过这些饥民？

美国基督教教派的分歧也让我深感困惑。在我国（罗马尼亚）没有这种事。美国有六种不同的信义会、数十种浸信会和五旬节教派、联合和非联合的长老会、圣公会，改革圣公会与保守圣公会等。由于有那么多的教派可供选择，人们就寻找一种合乎自

己观点的教会。但对多数人，不太舒服的教会可能更适合打击他们个人的罪恶倾向，给他们更有益的圣洁之路，破除他们的恶习。

原教旨主义与现代主义

在西方，新教和天主教都存有保守派与现代派的分歧(fundamentalism & modernism)。

在罗马尼亚，我从未听说过“保守派”这词。我第一次听到这词是在美国的一个问答环节，当时有人问我：“你是保守派？”

我回答说：“不是。”

我当时以为，保守派就是众多新邪教之一。后来居然有人敲诈我，说要用这个录音来对付我。我告诉他，“就去干吧！”

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术语。

在我看来，西方的保守派太过肤浅。他们说自己相信整本圣经是神的默示，但多数成员都不懂圣经原文。就算一个人懂得原文，依然不足成为真正的保守派。因为希伯来文圣经是用来吟诵的。希伯来文本中的每个单词不仅有辅音和元音，还有乐符。不同的语境，就不同的乐符，从而在我们的心中产

生各种共鸣。用小调唱出的赞美诗，与大调的赞美诗，效果完全不同。

当圣经翻译小组 (Wycliffe translators) 研究墨西哥的马萨部落 (Mazatec tribe) 言语时，他们发现这语言的每个音节，用不同的音调，就改变了它的含意。‘水’如果使用另一个音调，就成为‘仙人掌’；‘裤子’可以变成‘叶子’。圣经的希伯来语也是一种音调语言，只是它的不同音调并不改变它的含义，但它改变了这事物与我们灵魂的关系。

于是不认识希伯来文音调的人，就无法全面了解圣言的含义。

当圣保罗在歌罗西书 3:16 中写道，我们当用诗歌和颂词互相劝戒时，他指的是具有特定曲调的歌曲。

音乐对人的内心有很大的影响。失眠的人需要的不是爵士乐，而是儿歌。通过聆听勃拉 (Brahms) 的《第一交响曲》或《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我们就不再恐惧。聆听威廉 (William Tell) 序曲、罗西尼 (Rossini) 或《耶稣，我灵魂的良人》可以缓解精神过敏。贝多芬的《激情 Appassionata》或

《奋起，奋起为耶稣》可以使疲惫的灵魂苏醒。医院已引入音乐疗法来治疗各种精神失常。

希伯来音调，就像音乐，是按照信息的特殊需要而决定，为给听者切要的警惕。

耶和華的名，使用不同的音符，诸如“zirka”、“segol”或“munach”（古希伯来乐符名），就对灵魂有不同的影响；就像教堂的古典赞美诗与黑人灵歌对灵魂有不同的影响一样。

在民数记 8 章 16 节中，神说：“[利未人] 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希伯来文的直译是：“利未人给了我，给了我”（neiunim, neiunim）。这“给”字出现二次，这表明利未人不单在一般的圣所事务上归神，也在最高的赎罪上献给神。

基督教如果要想保持纯正，就必须更犹太化、加上原来的音调才行。

圣经有大量不同文本的事实，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任何原子科学家都会说，物质都是不固定的。它们只是无法确定的概率。我们遇到的每个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带有任何可能。因为《圣经》是现实最完美的表达，所以它必须带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许多希伯来文都是多义词。例如，在利未记 5:19 中，希伯来语 asham hu asham asham la

Yehwah 可以被翻译为：“他在主面前实在是有了罪了，”或，“他已经向主作出了完全的赎罪。”神给我们不同的可能性，好刺激我们的思想。

但这些只是关于原教旨的解释。基督教的原教旨派（就是所谓的归正派，或更正教）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笃信圣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生活在圣言之中。他们与哭泣的人同哭。当他们听说有人为基督被捆绑时，他们就感到自己受捆绑。他们最乐意帮助我们。

另一方面，《现代派》对我来说也不够现代。

自从“圣经批评”兴起以来，神学思维就忽视了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识。

说谎者不会编造一个与他的意图相反的故事。犹太人声称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土地。即使现在他们仍然如此坚持。若果如此，为什么他们会说，他们目前的这块土地，是借着击杀外族而获得的？

骗子们会试图证明自己出身高贵。可是犹太圣经的作者们却相反。他们直言自己的王室曾是卑贱人的后代，包括一个职业妓女喇合、一个放荡的女人塔玛，和一个被蔑视的外族女子，摩押人路得。纳粹党人不会说，他们的英雄希特勒的远祖是犹太人

，名叫亚伯拉罕和莎拉。相反的，他们会说德意志民族乃是起源于齐格和帕西（Siegfrieds and Parsifals。）但犹太人却坦言他们曾当奴隶四百年。

一个新宗教的宣传者，不会那么愚蠢地说，他们敬仰的救世主是由一个未婚的女子所生，祂的种族是一种被欺压的卑族。他们也不会说这救世主的亲属也认为祂有精神病！他们也不会说，这救主的门徒跟了祂三年，还是不了解祂。结果祂是死在罪犯中，甚至自己的门徒们也怀疑祂的复活。圣经这样说，是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稍有常识的人，马上晓得这圣经不是撒谎。现代主义者却以为圣经只是一个捏造的故事。

但神学不是我目前真正关心的。我想帮助那些在共产国家受迫害的人。所有现代主义者都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该协进会支持的不是被共产苦害的基督徒，而是共产游击队。我不能附和他們。

我见过美国主要的反共战士，也赞赏他们为揭露共产党伎俩的出色工作。但神并没有呼召我成为一个激进的反共分子。我觉得这场战斗最需要的不是自由战士，而是圣人。

西方的自由

我很高兴可以生活在一个说话自由、写作自由，行动也自由的西方世界。

但我知道，西方这种脆弱的自由还能持续多久？我们从罗马尼亚逃到美国；但如果共产党也接管美国，我们还有何处可逃？

美国有自由，但没有真正的民主。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除了挪威瑞典，英国和瑞士），情况都是这样。

例如，97% 的美国人不会积极参与政治。有投票权的人，一半没有去投票。他们不为任何政党做出任何贡献——他们既不出钱，也不参与投票站工作，也不参加选区会议，也不代表任何候选人提供志愿服务。他们袖手旁观，让其他人完成工作。于是政府的管理权就掌握在 3% 人口的手中。此外，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57% 的美国人无法说出他们的国会议员的名字，81% 的人无法列举那位议员做过的任何事。美国人对演艺人员和足球运动员的了解远多于他们拣选的国会代表。

遗憾的是，这种冷漠和无知，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中似乎也普遍，尽管他们的祖先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主要建设者。最近一个财政年度对芝加哥投票习惯的调查显示，只有 17% 的新教牧师愿意去投票，而酒店老板 99% 都去投票。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美国过去的政府架构？那时的美国，人口只有三百万，是一个农业国。那时没有共产党的核子威胁。我宁愿支持一个只向热爱自由的人授予自由权的政府。林肯在内战期间毫不犹豫地暂停了个人的人身保护令，因为当时的叛徒行为若不立刻中止，就要亡国。

今天西方的叛徒比林肯时代还多。美国应该颁布一项法律，把鼓吹共产主义的人，定为叛国。我们应该给予共产党人的唯一自由，就是让他们可以自由移民到任何共产国去。这也该适用于所种族主义者（就如回教极端派）。

共产主义本身

我们再说《耶稣向共产世界的宣道会》如何在美国成立。

我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到拥挤的信义派教会讲道。我会见了一位信义派主席，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向我讲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的努力，给共产国家带来的宗教自由。他连一个问题都没问我。然后就轮到另一个访客了。

另一位信义派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人，他的谦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他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尽管实行它却是错误。这就像说，宣扬酗酒和娼妓没问题，只要不开办酒馆或妓院就行了。他也相信基督教会与共产主义之间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他在访问东欧时看到了宗教自由的“证据”，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误导。他对我非常友善，为我提供了他教会传福音事工的一个次要职位。然而，他的教会却没有真正的传福音（该部门不久后就解散了。如果我当时接受，很快就会失业。）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谢这人，他在听一位朋友提及我的情况后，就亲自帮助我离开罗马尼亚。

至于共产主义本身如何，在柬埔寨就可以看见。当共产接管后，至少有一百万人被杀，其中包括所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包括十二岁的学童和所有活跃的佛教徒和基督徒。党方杀人并不用花费子弹，只用棍棒和铲子砸碎了人头。

在越南住了十五年的耶稣会牧师 F. Gomey 报道说，河内的一位共产党高官告诉他，“我们不承认多元化的异端，因为这意味着分裂和软弱。我们只关心人民... ‘人民’就是指那些拥有正确思想的人。但那些思想顽固，如孙主教（当时在监狱里），永远不会成为人民... 除非一个人归心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走出集中营。不归顺者将会消失。”

当神父询问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时，这位官员回答说，“自由是为了给你能自发自动的遵守党的规则。”这位耶稣会士对这位官员的坦率感到震惊，他说：“我是一个可以离开柬埔寨的外国人。如果我在自由世界告诉人们这些事，肯定是对你们共产党不利。”但这位党员回答说，“尽管去讲。没有人会相信你。”

在共产主义埃塞俄比亚，数千人在没有出庭的情况下被处死。家人可以领回亲人的尸体，但他们必须支付子弹的费用：一名官员会计算伤口的数目，计算费用。

这就是共产主义本身。捷克共产党人杜布（Dubcek）所宣称的具有人性的共产主义要么是他的个人幻想，要么就是刻意的宣传。“欧洲共产主义”或“民主共产”只是一个口号，其目的是欺骗。

我们不指望共产党人有一张人性的面孔。在东南亚和非洲，只要他们腐败，我们就贿赂他们。有时，仅仅两百美元的礼物就能救一名囚犯免于死亡。

我是如何出名的

在美国各地的演讲中，我一再坚持教会该有专门的预算，支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还有，教会该在铁幕后传福音。其中一个教派领袖告诉我有关他的结论，随即中止我们的书信来往。他的结论就是：我的理智迟钝，头脑混乱。

当然他的诊断十分正确。没有一个经历了多年纳粹和共产监狱的人，能依然完全清醒正常。有一项对奥斯维（Auschwitz）集中营受害者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但我的理性模糊并不能免除那些理性完好的人，不上去救助他们受迫害的弟兄。但这些人却用我的疯狂为借口，逃避他们的责任。

尽管如此，神依然是神。如果开启宣道会是祂的旨意，那么祂就会自己开路。

当时我正在费城拜访一些对我的信息感兴趣的人。当时美国正值反越战的风潮，全城海报都在宣布

反战集会。我很好奇。由于我的英语很差，我便站在讲台的近旁，以便听清楚讲员的每一个字。有一位戴着牧师领子的男人正在发表针对 LBJ 的激烈演讲。我不晓得这个 LBJ 就是指约翰逊（Johnson）总统，所以我不感兴趣。然后他呼吁世界和平，这个我同意。但当他最后赞扬共产主义时，我就耐不住了。我冲上讲台，轻易地推开他，因为他个子比我小得多。我抓起麦克风，对大众说：“你对共产主义了解多少？我获得共产主义的博士学位。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文凭。”我就把上衣脱去，露出身上的伤疤。

“这些都是共产党酷刑的痕迹。”

那牧师问我为什么遭受酷刑。

“假设我是一个杀人犯，”我说。“杀人犯奥斯瓦（Oswald）或鲁比（Ruby）有没有被虐待？杀人犯该受酷刑吗？”观众们喊道：“不，当然不。”我继续说，“我从未被指控谋杀。但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受折磨。我和他同样是牧师。但他却是一个犹大。他没有赞扬基督和殉道者，却赞扬凶手！”当时许多人就向那牧师发出嘘声，有些人大喊“犹大”。然后有人剪断了麦克风的电线，大会就解散了。

警察包围了我，押上警车，离开会场。我犯下了两项违法行为：在公共场合脱衣、又扰乱了合法的集会。但当我们转过街角，脱离了众人视线后，警察们就与我握手，放我下车，说再会。

第二天，我的照片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上。其中一张照片显示我被警察包围，并附有标题：“如果肯尼迪也得到这样的护驾，就不会被人暗杀了。”

这费城发生的事，传到华盛顿。美国参议院小组邀请我向他们的委员会作证。我以为我将会见到几位人士，可能包括参议员。令我惊讶的是，房间里挤满了无数的电视摄像机、广播公司、世界各地新闻机构的代表、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等。我一夜之间就闻名于世。布道和演讲的邀请纷至沓来。我的证词记录成为政府印刷局的畅销书之一，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这事件引起的公众关注。于是我得以成立向共产世界的宣道会，实现了我在监狱里的梦想。

第三章

下一步

美国宗教中的商业主义

但在这梦想实现之前，还需要一个插曲。我必须熟悉美国人的生意头脑，这种想法在西欧相对少见，在铁幕后更是未曾听闻。在那里传教的报酬就是坐牢或死亡。但美国却恰恰相反。

当我第一次收一所大学讲道的邀请时，对方问我要求多少酬金。我回答说：“我只要传福音，无需酬金。”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酬金。在我的家乡，讲述基督故事的报酬是二十五年的监禁。如果你在监狱里为主作见证，报酬是棍打二十五下。于是那所大学取消邀请。他们肯定我疯了。

一个星期天，我要去密歇根州讲道。我是一个家庭的客人，他们的女儿正在中学。当这个女孩邀请朋友上去听我的演讲会时，那朋友回答说：“什么？那个白痴？你邀请他到你的家？他在我们的教堂讲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愚蠢的人。”那女儿向她的母亲重复了这句话，于是她母亲非常尴尬，不知道如何接待我，因为以为我真的是白痴。

接下来的星期一早上，我在一个商人早餐会上做了演讲。会议开始前，主席就陪同一位男士向我走来。“请不要感到冒犯，”他说。“这位男士说他的名字叫理查·魏恩波，他在共产主义监狱里度过了十四年。这是我们教会开出的一张支票，上面写着魏恩波的名字。请表明你们的身份。我们希望找出谁是真正的理查·魏恩波。”

我出示了护照，但对方没有身份证或其他文件。在进一步追问下，他终于承认自己的名字不是魏恩波。当我问他为什么在支票上签上我的名字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签了你的名字？”

“但它就在这里，”我说。“你签下了“理查·魏恩波。”

那男人平静地回答。“您肯定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查·魏恩波。我可能是为另一位同名的人代签呀。”

我很佩服他的回答，但我继续说道：“你是说，有另一位理查·魏恩波授权你签下他的名字？”

那男人的回答又沉稳又平静。“是不是有另一位理查·魏恩波，授权你调查我吗？”

警方将他拘留，但当天就释放了他。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让我们谈判。美国是一个大国。你不可能到每一处去讲述你的生活故事。我和你一样了解这一点。我听了你的演讲录音，你可以告诉我更多细节。我们可以用两个理查·魏恩波来划分州区，覆盖更多的领土。这种安排自然对我们双方都有利，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当我不接受如此有利可图的建议时，那个人感到惊讶。

我对这些利用宗教的人感叹。他们是宗教商业化的受害者。其中一位与我发生冲突的人告诉我他的过去。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孩子们是父母彼此交流的传媒，也是父母彼此撒谎的中间传话人。他是在一个教会里长大的，那里有很多“哈利路亚”的赞美，但真教导却少。在这种氛围中，人们介绍宗教，就如介绍一种商品。这人从小就观察到牧师们争夺金钱，毫不掩饰的不诚实行为。他的宗教导师完全不像一个圣人，不能叫他敬畏。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知道在共产国家里的基督教工作必须使用地下的手段。不幸的是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的活动。但他发现，如果他发明了400个不存在的传教士，并要求金钱来支持他们，他就会得到。美国人简直好像喜欢被愚弄一样。我记得他有一次告诉我，“谎言越大，人们就越容易相

信。”事实也常如此。于是在善意中，他就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我对他没有怨恨。

十五年

当我们自己开始传教工作时，它首先是作为《欧洲基督教传教团的美国分会》。后来称为《耶稣向共产世界宣道会 Jesus to the Communist World》。

1980年12月6日，是我们来到西方的十五周年；1982年5月3日，则是美国《耶稣向共产世界宣道会》成立的十五周年。

日历中记录了我西方的十五年。同样的，日历也记录了我祖国的十四年监禁。但时间具有多种品质。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他活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二战期间的五分钟交火。当时他正在生死搏斗中。那一天就成了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时光。虽然那日只是日历上的一天。

没有人知道时间的真相。时钟和日历只能测量时间的数量。它们不能估计它的质量。时间是实质，但它是什么东西的实质？

自由世界的十年并不等同于沙皇时代的十年牢狱。当时囚犯必需花费一年多，才能徒步穿越西伯利亚的数千英里。而美国的宇航员只消四十秒就能完成同样的距离。

据说有一天托斯卡（Toscanini）问爱因斯坦，“请解释时间的相对论？”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们且在晚餐时才谈那问题。在那之前，请给我解释一首莫扎特交响曲。”

“你必须亲自听它。”托斯卡说。

“嗯，”爱因斯坦回答道，“时间也是。你必须经历它。”

《耶稣向共产世界》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宣教会。它扩大到包括五十个国家。第一年的收入为50,000 英镑。现在已经超过三百万了。

这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是我家庭的支持。我妻子一直和我同工。她的讲道，常叫听的人感动流泪。

创世记 22:6 中写道：亚伯拉罕和以撒“二人同行。”我和儿子米海也是。尽管人人都说米海是一个糟糕的副驾驶，但在业务管理，他却异常出色。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休假。他包揽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他帮助在各大洲建立支部。他到西方十五

年，就获得了三个学位——神学、心理学和法律。神又赐给他一位贤内助，一位以色列基督徒朱迪（Judith）。她就如《塔木德》（Talmud）故事：一位拉比说，“神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第七天就休息了。”另一位问：“那么第七天神做什么？”答案是：“匹配情侣。”我儿子的婚姻正是神的匹配。这媳妇就成了道地的传教士太太，绝无埋怨。

第二个恩典，神给我的书安排了一个好编辑。我写的英语，其实不是我思考时使用的语言。艾伦（Ellen Oblander）温柔地纠正了我粗糙的英语。

第三个恩典是得到一位忠诚的出版商爱德华（Edward England）。我的书《为主受苦》得以用56种语言发行了数百万册。其他书籍也连续推出。

使命扩大

在津巴布韦，一位母亲向她九岁的儿子朗读了《为主受苦》的部分内容。那男孩就写信给我，要求我也在津巴布韦成了一个宣道会。他说他自愿作该支会的大将军。我给这男孩写了一封冗长的回信，

不久之后他的母亲沃德女士 (Sister Ward) 就成为了我们津巴布韦的主任。

不久后，我就到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布拉瓦 (Bulawayo) 传道。这是一次大型会议，白人和黑人都参加了。该市的市长是一位犹太人。他戴着金链来欢迎我，这是在英国统治时期的传统。大会的赞美诗，便是“你们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你们是得赎的百姓”。那里的基督徒，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认为自己是以色列族，尽管市长一直表示只有犹太人才是以色列人。于是我必须在讲道中解释。

在英国的一次聚会中，我遇见了一位南非弟兄帕特 (Pat Henegan)，他对东欧的基督教事工甚感兴趣。他邀请我去他的国家。于是我们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一次宣道会，到会者达十五万人。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我多次回到南非。帕特弟兄就成为我们在该国宣道支部的主任。我们的宣道会通讯使用非洲的二十三种语言出版，我的书《为主受苦》也译成斯瓦语 (Swahili) 和绍纳语 (Shona)。

南非宣道会起初只关注俄罗斯和红色中国。但很快共产主义就来到了南非边境。于是南非印刷大量基督教读物，私运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广播电台抗议说恩科河 (river Enkomati) 被基督

教“反革命”的读物污染了。因为我们把读物密封在胶袋，利用河流传送。

当荷兰被纳粹占领时，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安置了一名成员渗透到盖世太保之中。他赢得纳粹的信任，就得以通知荷兰人防备纳粹的许多决定，因此救了许多性命。当盟军解放荷兰时，他们监禁了所有纳粹的走狗，连这义士也一并囚禁。这义士受了数月的虐待后，才成功证明自己的身份，获得平反和勋章，过后又成了一名牧师。但他无辜的痛苦在他的灵魂中却留下深深的印记。

他读了《为主受苦》后，立刻寄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婿，请求他为俄罗斯的受难者做点什么。那女婿就与一些人在加拿大创建了我们的支会。我经常在加拿大的天主教会，圣公会，自由教会和大学讲道。领导我们加拿大支部的，是内莉姐妹（Nellie Brobell）和克拉斯弟兄（Klaas Brobell）。

这名荷兰爱国者并没有在荷兰带领我们的荷兰支会，因为已经有马里（Maris）弟兄带领了。马里曾把我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听证会的供词，翻译成荷兰语。后来他也翻译了我其余的书。他的妻子如今已经去世。她曾给我们大力的协助。

当我妻子的一位狱友科莱（Coletta Grossu）姐妹得以与丈夫塞尔（Sergiu，我的前狱友）一起离

开罗马尼亚后，她就成为我们的法国支会主任。另一位帮助这项工作的朋友是爱丽丝(Alice Panaidor)，她曾在我们被监禁期间照顾我的儿子，后来她自己也入狱了五年。科莱和爱丽丝一起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组织了大型布道会。我们分发了大量的书籍，为铁幕后面的基督徒提供了很多帮助。科莱还写了一本出色的书，《监狱真正有福，Blessed Be Thou, Prison》。

有人建议我不要到法国传教。他们说，法国只有天主教徒和共产党，没有人会支持新教的宣道。事实证明，这警告并不正确。

法国的新教徒果然很少。巴黎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法国人能说出四福音之一；每二十四人中，才有一人曾经翻阅过一本圣经。只有二巴仙的法国人自称与新教有联系。自称为福音派的，仅占总人口的 0.4 %。但我们并不是为了辩论四百年前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分歧。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受害的基督徒——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我们也没有忘记共产党本身——我们也向他们表达爱。今天，我们法国的宣道会正在蓬勃发展。

奥斯特(Ostermoor)弟兄是一位在巴西的德国传教士，他从亲戚那里收到了一本《为主受苦》。他今年七十八岁，却依然能领导我们在巴西的宣道

团。当《为主受苦》译成葡萄牙语后，巴西全国电视就加以报道。

牛顿和乌莫鲁（Newton and Umoru）兄弟在尼日利亚组织了我们的支会。扎伊尔、上沃尔特、贝宁、赞比亚等地也有了支会。

在德国，一群修女在日常灵修中读过《为主受苦》后，就安排给我一次讲道，可是随后她们就取消了。因为她们读到我第二本书《神的地下教会》，就感到震惊和恐惧。在这书中，我讲述了我如何在监狱里揭露了一位共产奸细的面具。这奸细暗中向狱方举报，导致其他患有肺结核的囚犯被迫在隆冬，赤身站在冰冷潮湿的混凝土上。我就不纵容他。又有一次，我展示有时爱必需先于真理。我谈及我如何愚弄审讯者以拯救一些弟兄免于被捕。这肯定让修女们感到困惑。因为她们写了一封愤怒的信给我，并向邀请我演讲的其他人发出警告（也许她们以为，耶稣说爱敌人，就是协助敌人苦害我们的弟兄？）

尽管如此，我依然得以在德国传道。有重要的人物到会，其中一些人决定建立德国的支会。当我们返回美国时，我们得知德国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支会没人接收邮件，信件都堆积在邮局；捐款的人也没有得到收据。我们无法解释，我妻子就回到

德国，找那位新成立的支会主席。那人不在家，但他的妻子告诉萨宾娜，“共产党随时可能接管西德，我不希望我的丈夫被绞死。我已经禁止他参与这些宣道事务了。”大多数德国基督徒在过去都不反抗希特勒的命令，如今他们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敢违背。德国支会的其他成员也全都放弃了自己的承诺。

我们必须做些事情。上帝就从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们帮助。

德国有一小群信徒，为首的是一位名叫弗里茨（Fritz Braun）的传教士。他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他以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他也像路德，不接受哥白尼的理论。他相信天堂就在我们的正上方，地狱在我们的正下方。他还宣扬欧洲各国就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没有多少人听他，但他的行动表明他的心是在正确的位置。

弗里茨一家依然实行普鲁士的古老秩序：儿子们即使已经四十岁了，也必需服从父亲。弗里茨只须命令他的一个儿子，一位工厂主人，放下一切，接管宣教任务，事情就这样成就。我们的德国宣道会就成了欧洲最兴旺的支会，并扩展到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西非。它成了我们东欧工作的行动中心。

上帝和魔鬼都以特殊的方式利用瑞士。俄罗斯共产党是列宁在瑞士创建的。列宁在瑞士会晤俄罗斯的异议人士，一起策划了推翻沙皇的革命。他们在苏俄建立共产独裁后，就扩大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犹太复国运动也始于瑞士。以色列因此得以重返神赐之本土。

在巴塞尔（Basel）的同一个大厅里，犹太复国的创始人赫茨（Theodor Herzl）发表了他的演讲。我也在这里为瑞士支会发言。我们的兄弟汉斯（Hans Zurcher）是其创始人之一。这支会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瑞士的三种语言）出版读物。

朱塞（Giuseppe Laiso）曾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同情者。在阅读了我的书并了解真相后，他开始我们在意大利的支会，他创建了属于我们众支会的广播电台。恐怖分子摧毁了它。

葡萄牙一度几乎被共产党接管了。在最困难的时期，当捍卫基督，反共意味有生命危险时，我们的葡萄牙主任特兰科（Trancoso）弟兄在该国最亲共的城镇巴雷拉（Barera）坚持传教。他毫不畏惧在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出版我们的读物。

我在葡萄牙的一个礼堂里讲道，礼堂里人群过于拥挤，以至当共产党要上来殴打我时，无法抵达讲

台。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必须先听完我的演讲。当他们听完后，就不再向我动手了。

哈迪纳塔(Hadinata)姐妹在穆斯林国家印尼组织了我们的宣教活动，并出版了我们印尼语的书。

我去了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警告所有愿意倾听的人，有关非洲面对共产主义的危险。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德斯(Addis Ababa)，我得到美国大使和他的妻子的接待，他们向我保证，埃塞俄比亚人非常钦佩美国。这位大使显然活在梦中：不过一年，埃塞俄比亚就被共产党统治了。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并没有在安乐椅上作白日梦。他们为拿下这国作了具体的努力。

我去埃塞俄比亚时还访问了厄立特(Eritrea)首都阿斯马拉(Asmara)，并在那里举办了大型学生聚会。学生的每个问题都显然倾左。当他们问我有关南非时，我告诉他们，只要白人统治，南非的黑人就安全，因为白人不会灭绝黑人。但如果由黑人掌权，南非就有危险，因为黑人内部有激烈的冲突。一年后，厄国开始大规模杀戮。一个周日早上，埃塞俄比亚共产党军队伏击厄国村庄沃基德(Voki-Deva)，射杀了聚集在教堂的所有人。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参加我在阿斯马演说会的学生。他还记得我当时的警告。

纳拉詹（Narajan Nair）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读了我的书《为主受苦》。回到斐济群岛后，他在那里开始传教，贫穷的当地人现在为共产国家受迫害的信徒们捐款。

澳大利亚的雷斯（Res Werry）和梅尔夫（Merv Knight）弟兄受到同一本书的激发，开始了我们在该大陆的支会。

在印度，约伯（Dr Job）弟兄受到我们读物的极大启发。尽管当时印度是一个独裁国家，他却组织了一次有多达八万人参加的布道大会。约伯现在领导我们的印度支会，印刷二十多种语言的新闻信与书本。

这是神的奇迹。我们的印度支会迅速成为印度第二大基督教印刷局，称为《萨宾（Sabena）出版社》，它不仅为印度提供读物，也供应读物给尼泊尔、不丹、西藏、斯里兰卡，并其他亚洲国。由于印度的印刷成本比任何地方都便宜，《萨宾出版社》也印制新闻信和基督教书本给尼日利亚、赞比亚、扎伊尔、上沃尔特和其他非洲国。这笔巨额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贫穷的印度基督徒支付的，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才一百英镑。我们的印度支会，“行动的爱”是各国《基督向共产世界宣道会》中最大的一个支会。约伯弟兄有一位了不起的妻子——

“基督教的特蕾莎修女”的支持。她是一名医生，可是却放弃了国外医院高薪职位，到贫民窟做无薪的医生。

在斯里兰卡，佩雷拉(Pereira)弟兄放弃了英国圣公会大教堂令人羡慕的职位，前往该国贫民窟为我们的宣道会工作。

西方人几乎都不知道，直到 1981 年，印度联邦有三邦是共产党统治的：喀拉拉(Kerala)邦、特里普拉(Tripura)邦和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邦。喀拉拉邦的共产政府在 1981 年底倒台，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在该邦的宣道给人了解共产的真像。

当时我在喀拉拉的阿尔皮(Alcpi)讲道，这个小镇被称为“印度的莫斯科”，因为它是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

大约三万人聚集在空地上。气氛很紧张。我们预料会有很多人发出质问，共产党也有可能发动暴力。我们没有呼吁警方的保护。

会议刚开始，就下起大雨。我们开会的附近都下雨了。但在我们聚会的地点却没有雨。人们都惊讶。当基督徒赞美主时，众敌人只能目瞪口呆。

在马来西亚，江牧师(Ronney Kon)担任销售基督教书籍。由于他没有时间阅读所有他出售的书，

他将我的书《为主受苦》分发了好几年，才有人告诉他说，这书非常好，于是他也读。结果他就成立了我们在新马的支会。

江弟兄在吉隆坡、新加坡和其他东方城市为我安排了大型聚会。到处我都必须适应听者的文化和宗教。在佛教国家我有时是这样开始：

“我对非常敬佩佛陀，也有幸晓得他的一些生平。当我小时，读到他讲的一则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善良的王子，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受苦。有一天，他在树林里发现一只饥饿的母虎，幼崽就在她身边，它们也注定要饿死了，因为母虎已经没有奶汁了。王子不能忍受。老虎虽然凶残，但毕竟还是一个生物。他就割断自己的血管，躺在老虎旁边，等待被吞噬。母老虎果然吃了他。于是获得生存，也得以给虎子喂奶。王子死了，但这些野兽却得救了。

“小时我很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童话故事。我知道许多人是野蛮和残忍的，像那王子这样有爱心的人，我却未曾见过。我很欣赏佛陀的故事，但遗憾的是，这种善人只存在于文学中。

“多年后，有人给了我一本圣经。在其中我发现了另一个故事；一位和平之君降生于世。这位王子对那些像老虎一样残忍的人说，他们正在死亡的边缘，“吃我的身体，喝我的血，你就会活下去。”

这些人杀了他。从那时起，教会就以祂的肉祂的血为粮和水，得享永生。那位天国的太子死了，为了拯救全世界。

“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没有忘记那位伟大的东方佛陀。佛陀在天国太子降世的六个世纪之前，已经预知救世主的来临。”

当我在印度演讲时，我引用了印度教的经典，并其丰富的神话。当我遇到共产党时，我就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这种方法让许多人接受了我的信息。

好些人称我们的宣道会为“魏恩波宣道会”。这令我不安。这就如保罗和提摩太合写的《腓利门书》。这书信虽是二人合著，但它的标题完全忽略了提摩太。《耶稣向共产世界之宣道会》不是我一人的成果。它是众同工的。其中包括数十名委员、撰稿人、广播员，信使、印刷员，和祈祷者。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写下数千名贡献者的名字。

我们开始地下工作

我们开始让全世界晓得**地下教会**的存在。我们用五十种语言传达有关像苏联上尉加利罗

(Gavrilov) 那样的基督教英雄。这名上尉因为组

织秘密基督徒军官团契，并出版团契的刊物而被处决。两名中尉也与他一起被捕。在自由世界中，基督徒军官们轻忽这样的团契，以为可无可有。他们不晓得这种自由，是共产国家信徒必付出性命代价的。英国的基督徒军官联盟给我请帖，让我在军事学院里自由讲道。

随着多国的支助不断地涌来，我们得以救济地下教会。

来自古巴的基督教教师安东尼（Antonio Borro）曾因信仰而入狱，他向美国观众讲述了古巴囚犯的待遇。他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就像一个笼子，只够他坐着。共党带他去审讯的方式是，躺在地上，用绳子拖着脚去。

当局把硫酸淋在囚犯身上。狱卒们用热铁在他们的皮肤印上锤镰标志，又把他们的头关在装满蜜蜂的盒子里。在入狱期间，安东尼看到一些照片，是医学生正在把活人当作活体解剖。狱方威胁说，除非他承认自己曾做过不道德的行为、又曾为美国中情局效劳、又激烈反共，否则也会被活体解剖。当安东尼终于挨不住酷刑时，他就承认了一切。他忏悔中的唯一真实的部分，就如：反共！这正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义务。

很少古巴囚犯能有幸逃脱。一位名叫拉梅（Rameiro）的浸信会传教士因拒绝认罪，就死在古巴监狱中。另一位被共产党枪杀的少年博伊（Boitel），最后的话是：“基督万岁！”

现在，通过我们的宣道会，这些烈士的家人就得到帮助。我们利用洋流把基督教小册子漂流到古巴、中国、韩国、阿尔巴尼亚或俄罗斯的海岸。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潮流，知道主能保证它们的功效。我们将福音书或圣经的一部分装在一个真空密封的小塑料袋中，并在其中插入塑料吸管，确保能漂浮。我们又加了一块糖果或口香糖，在透明的塑料袋，这糖果就能引起儿童和成人的兴趣。这方法来自我儿子，效果很不错。

红色中国已经被普世教会遗忘了，但神一定非常爱中国人民。证据就是祂把他们创造了那么多。在毛泽东统治下，红色中国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一百万名基督徒被杀，西方教会甚至懒得在祈祷中提及这些殉道者——诸如文渊、孔、刘令秋、周经泽、董胡恩、方爱石、周福青等名字。还有陈马可（Marcus Cheng）和其他数千人。

我们从佛教最高权威达赖喇嘛得到的信息，提醒普世教会有关我们在中国遭受苦难的弟兄，并描述了他们受到的待遇。在内蒙古，共产党人割掉了佛

教僧侣喇嘛呼鲁 (Huh-Lu) 的舌头。他们砍掉了一名教师萨兰楚 (Saranchulu) 双手的手指，并活活烧死了一位妇人诺米 (Nominerdene) 的孩子。另一位老师蒙克比 (Munkbish) 的生殖器和脸部被烙铁烫伤，以致他疯了。共党绑着丹巴 (Damba)、丹拜 (Dambaii) 和丹巴拉 (Dambalah) 的拇指，就把他们整个人吊在树上，又用沸水浇他们的头。

当佛教徒受到这样的对待时，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终于得以协助这些殉道者的家人并传达他们的声音，给生活写意的自由世界。

遇见冷漠

我走遍了各大洲，在无数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露面，接受采访，布道，并写了十二本书，这些书获得广泛的翻译和发行。

我常提醒美国的听众，温思 (John Winthrop) 在 1630 年乘坐阿拉贝号 (Arabella) 横渡大西洋前往马萨州 (Massachusetts) 时，在甲板上宣告：“我们将成为山顶之城，”他说，“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我们。如果我们在行为上欺骗神，以致祂收回祂目前的帮助，我们将成为世界的笑话。”

我对德国听众提起“祖国”一词。这词对他们已经成为禁忌，因为希特勒滥用了它。战后，德国人民几乎从他们的词汇中删掉了这词。现在我问他们，“如果一个基督徒连本国人也不爱，如何能爱敌人？”我是指东德人，他们被柏林围墙与西德隔开了。

我到处都得到了上帝儿女的热情支持。但我也遇到了那个称为“冷漠”的老魔鬼。它确实是一个古老的魔鬼，它曾与众人一起坐在各各他山上说：“且等着，看。。。”

对苦难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是人类的本性，并不是现代人独有的。我们有时会想，为什么现代人听到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没有反应。为什么听到共产国家基督徒的苦难，也无动于衷。但在耶稣被钉的山上，很多人都来观看。当钉子钉入三人的手脚时，观众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喊，也知道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最好的人。有谁会在自己大受痛苦时，还为折磨他的人祈祷？还留意引领一个强盗见神？如今这耶稣绝望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人们互相点头说：“且等着看。”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减轻他的痛苦。没有人给他送水，也没有人对

他说一句同情的话。他们倒说：“且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今天的世人越是冷漠。我们正接近主所说的午夜。那时会有另一个声音说：“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祂”（太 25:6）。那时就是连等待祂的童贞灵魂也会沉睡。少数依然警醒的人，是那些宣布祂到来的人。

午夜是地球的一部分距离太阳最远的地方。属灵的午夜也是人与神距离最远的时候。我们正在接近午夜并其中惊恐。但午夜对神的孩子却是一个好消息。在午夜，埃及长子们都死了，选民却得自由。

主说：“夜晚一到，就无人能作工了”（约翰福音 9:4）；但我们知道，当圣经宣布某事不可能时，并不包括信徒。因为耶稣宣称：“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 9:23）。上帝的子民常在午夜完成他们最大的工。参孙在午夜拆毁加沙城门（士师记 16:3）。路得在午夜获得波阿斯的应许说：“你所求的，我都为你成就”（路得记 3:11）。在午夜，保罗和西拉赢得了腓立比的狱卒（使徒行传 16:25）。诗篇作者说，“半夜我要起来称谢你”（诗篇 119:62）。

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唤醒那些只因是夜晚而入睡的人，以及那些被共产党哄睡的人。西方世界的沉

睡，原来有许多是被敌人诱导入睡的。毛泽东写道：“为了胜利，我们尽力封住敌人的耳目；使他又瞎又聋。”

正如我们有时必须狠狠地戳某人的肋骨，才能唤醒他。我们也必须戳整个国家的肋骨。俄罗斯著名基督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i)说，当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就是能复兴和救赎万民的真理时，“她就立刻变成一种自私的民族，不再是伟大的国家了。”

西方人如果真的相信自己拥有真理，就必须活出来！

尼克孙在 1964 年 2 月号的《读者文摘》中写道：“美国的目标是给共产世界带来自由。。。这是我们国际谈判的第一目标。”但当他当选总统后，却忘了这一切。

维多利亚女王表示，英国的力量源于对圣经的忠诚。只要英国人信圣经，他们就有一个帝国。当英人放弃圣经后，也必丢失帝国。不久之后，他们甚至连大不列颠也会丢了。

我们的使命，是叫西方人重归基督，并给他们晓得自己的生死信息；同时也为被奴役的弟兄们争取自由。

神圣的例子

没有什么比神圣的榜样更能叫人成圣了。在我们的讲座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了地下基督徒和他们孩子的英勇行为。

俄罗斯共产杂志《Nauka i Religia》报道，在布尔尼村，一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上帝不存在”，并要求孩子们读。一个女孩举起手，站起来，大声说：“上帝存在。”那杂志说，孩子们给这位老师讲了浪子的比喻。过后那位女教师抱怨说，她的学生们都是信徒的孩子——经过六十年的共产主义恐怖，所有学生依然是基督徒！尽管他们的父母遭到监禁和杀害。这位无神信仰的老师曾经举办了一个无神的庆祝节日，但没有一个孩子来。那位记者抱怨说，这些孩子们每天祷告的时间，长达两三小时。

即使是西方的信徒也会以为这种祷告“太长了”。但西方孩子用多少时间看电视？

乌克兰的《真理报》称，该报驻基辅地区的记者拜访了一位名叫尼古拉（Nikolaie Riaboi）的浸信会牧师的家。这位牧师的太太拒绝在集体农场工作。她说：“我和我的家都侍奉主。”她接着告诉

记者说，基督是她丈夫的头，她丈夫是她的主。她认为不顺从丈夫是一种大罪，所以她拒绝在农场工作，因为丈夫没有吩咐她干那种事。那农场属于无神的共产党。

同村的年轻信徒告诉记者：“我们生活在希望中，希望幸福的时刻到来，那时我们将脱离肉体，穿上了新的天体，不再有任何诱惑或罪恶。那时我们就进入天堂。”因此他们避免与村里不信的人交往，也拒绝与非信徒结婚。

同一篇文章描述了在克里村（Krivaia）教堂举行的浸信会聚会。在聚会开始之前，一位无神论煽动者已经在教堂里谈论世俗生活的吸引力。他发表了关于基辅新表演场所和剧院，内容涉及电视、冰上舞蹈以及其他当地信徒认为可恶的娱乐活动。对信徒来说，这就像毒药。

在克里村的边缘，有一座房子，窗户都挂着黑色的窗帘，看不到里面。在一个小房间里，男人和女人跪在地板上，举起双手，闭上眼睛，祈祷和哭泣。这是五旬节派的聚会。该教派属于当局打压的非法组织。这些弟兄们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在彼此的家里祈祷。

地下教会、它的迫害、它的坚定信仰现在已广为人知。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在西方谈及地下教会，多人都以为我撒谎。

我心灵的痛苦

在《为主受苦》，我提及我在西方的苦难，超过共产的监狱。让我解释。在我获释后，最初几年我对新环境感到震惊。有好长的一段时期，我不能控制自己。我的手总会颤抖，又有强烈的不宽容，这给我巨大的担忧，因为我似乎无法控制它们。多年的监狱生活不仅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记，也在我的灵魂和思想上留下了印记。

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些教会领袖不能理解我的心态。他们似乎完全不晓得，由于我所遭受的洗脑和精神折磨，我不可能拥有完全清醒的头脑。

我已经经历了十四年的巴甫洛夫（Pavlovian treatment）折磨。如果你让一只狗在受到轻微电击时就给它食物，在它有了这个习惯后，却突然不再给它食物；那狗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压力。以后如果再没有食物，它就崩溃了。我这些年所承受的就是这种折磨。我们等待每三天的一块面包。第三天到了，却没有面包。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我们

轻轻地敲门，几乎不敢提醒监狱长今天是吃面包的日子。他却咒骂说，“你不配吃，”然后反而会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能不崩溃呢？

每只动物的神经系统，在长期紧张（例如焦急中等待）中都会崩溃。我们一直在等待盟军来释放我们，正如他们在无线电中的多次承诺。我们也一直期待大赦，期待监狱制度的放宽。我们也徒然等待死亡来结束我们的痛苦。经历过这种折磨的我，怎能成为一位西方人期待的心情愉快，可以轻松交流的魏恩波？

任何临床心理学家都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引起狗的思维混乱：首先，他让狗习惯于看到圆形图案，就有食物；看到椭圆形，就被殴打。然后实验员给狗看见椭圆形，但这椭圆却逐渐变成圆形。当压力越发加大时，狗就无法再区分。

我知道基督教是好的，共产主义是坏的。当我来到西方，发现基督教牧师与共产党交好，把共党当作朋友，同时共党正在我的祖国迫害教会时，我就无法平静。我知道自己正如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被欺骗后的反应。

那只狗最终会发疯。它不再能分辨敌友。它甚至会以敌为友，以友为敌。当我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反

应时，我恳求周围的人的宽容；我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耶稣的治疗。

我意识到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于是就不依赖大脑。罗马尼亚语中的“头脑”一词也指“骗子”。于是我依从耶稣的指导，放弃已经混乱了的理性。

西方的新诱惑

如今我在西方，面临一种全新的诱惑。在希伯来书 11:37 中，把“受试探”与被刀杀，锯死，被石头打死等，一同排列。这似乎不对称。试探或诱惑，是指金钱或美色。对于一个本性邪恶的人，诱惑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神的孩子，这些诱惑却像刀割。

在监狱里的十四年里我没有钱。现在，我作为牧师的最低工资，虽然比美国扫街工人的工资还低，但对我却是巨大的。过去我连自行车也买不起，如今却能开着自己的汽车到处走。于是金钱成了我一大诱惑。

在监狱的十四年，我几乎没见过女人。现在，妇女和少女们围绕着我，许多都对我充满了爱和钦佩。我曾经是一个囚犯，任何人都可以掴我的耳光，

向我吐痰。现在却有文章声称我是“最引人注目的传道人，”又说我是“自从耶稣以来，未曾有人在讲道中流露出那么丰富的爱”。我知道这是过分的赞扬，就像过去在监狱里的过度蔑视一样。但这种称赞却叫我感到满足，陷入诱惑。这是在监狱中的我绝对无法想象的。

民数记 5 章 12 节说：“若有人的妻子离去，得罪他。”由于“离开”的希伯来语单词是 *listeh*（疯癫），因此这话也可以译为“如果有人的妻子发疯了”。除非一个人发疯，否则他就不会犯罪。疯子是人类法庭上总是无罪释放。神岂不也这样吗？在歌罗西书 2 章 13 节的希腊原文，我们读到：“他宽恕我们的过犯（原文：祂宽恕我们的发癫）。”

尽管这些年来我在很多方面犯了罪，但我相信基督的宽恕，也相信那些我伤害之人的宽恕。

我正在与一个狡猾而无耻的敌人（撒旦）作战，我不断受到诱惑。撒旦试图引诱我模仿它的卑劣手段。当我们用卑劣的言语回击敌人时，我们已经成了魔鬼的形象。我发现自己很难重新适应正常家庭的生活。我的妻子已经习惯了独立，而我因为在狱中长期必须服从命令，没有丝毫的喘息，因此强烈渴求主权。米海已经有自己的独立性格，不能接受

我这一套。他是他母亲的宠儿，我只是他脑海中的一个模糊记忆。他从我那里得到了信仰，但也因继承我的名字而受苦。他的心情肯定很矛盾。可能他开始想：爸爸为什么不逃离本国，好避免连累了自己的儿子？现在我的名字越为世人所知，人们就越发称他为“魏恩波之子”。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希望能成为自己。他很快获得了三个学位，同时为我们的宣道会努力。他也写了一本书，又有非凡的管理能力。他不想成为我的翻版。

过去我在狱中，经常与身边的人激烈争论。如今我身旁的，都是兄弟。这也令我难以适应。我的尖锐性格，也叫身边人难以忍受。我的家人、哈里斯一家和其他密友是首当其冲的。但他们也是给我最多帮助的人。在此我向他们深深道歉。

事实证明，成名也是一种痛苦。我觉得自己就如盗贼。我谈及或写及人类最美丽的典范、信仰的英雄；并监狱里的圣徒，但观众却把其中的美德都投射在我身上。他们把我当成圣人！

“不可偷盗”（利 19:11）也意味不可偷他人的荣耀。各人只该得到自己真功夫，而不是他人的（如押沙龙盗取父王的荣耀。）

但宣传我的名字却符合我们宣道会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的宗教组织最常用的广告，就是它

们的领袖。没有广告就意味着没有捐款，没有捐款钱就意味着基督殉道者和家人没有食物。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它。看到我的照片出现在报章电视上，对我是一种痛苦。因为我晓得给我的正确形容，只是“一个可怜的罪人，纯是靠恩得救。”

有没有地下教会？

在教会里，我遇到反对。当《为主受苦》在德国出版时，福音派信义联会的外国事务主任写信给众牧者，指这书纯属虚构。他们公布，共产诸国没有人因信仰下狱。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赞同的声音。有的教会领袖声称自己曾拜访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地，完全没有发现地下教会。

如果这些教会领袖在二千年前前往巴勒斯坦，他们也难见到上帝之子。就算他们正式访问了祭司长，也难见到耶稣。因为耶稣从来不参加众祭师举行的大宴会。可能他们很偶然的，会看到一些囚犯被带过圣殿的院子，但这没有什么出奇。来访者在回国后，就会说神子出现在巴勒斯坦的报道，纯是虚构。

如果这些主教们在主升天后不久访问巴勒斯坦，并与使徒或圣母玛利亚交谈，问他们“耶路撒冷有

基督教会吗？”他们得到的答案必然是“没有。”因为当时使徒们也不晓得自己就是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圣徒”、“上帝的孩子”、“耶稣的门徒”、“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等等。起先的基督徒并不称自己为基督徒。

今天共产国家的信徒也不知道他们正是国外所谓的地下教会。他们只知道自己正在履行基督徒的职责。他们聚集在家里和森林里，尽管这是被禁止的，他们有秘密印刷店，秘密主日学校，他们的领导人躲藏起来。他们就是地下教会。但他们本身却不晓得这名称。

西方主教们由于语义的问题，竟不信世界三分之一地区有受压迫的教会。自从索尔仁（Solzhenitsyn）的《古拉岛》出版后，人们才晓得真的有地下教会。但在那之前，我们却必需艰苦的辩护。

我们不得不像萨沃（Savonarola）对基督说的：‘你是我的上司，我的牧师，我的主教，我的教皇。’他完全不理睬持有怀疑态度的教会领袖。

世界大会上的冲突

我们与德国支会的布劳恩（Braun）和诺伊德（Neureder）兄弟一起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浸信会世界大会。出席开幕的代表有一万名，其中美国人八千人。第二次会议时，大厅几乎空无一人。原来代表们都被当时在大阪的国际展览给吸引去了。新闻界几乎没有人关注这场基督徒大会。开幕词说，“我们主张浸式洗礼。”这种信息如何能吸引无神论者、神道教徒和佛教徒？

这场大会以各国国旗游行开始。虽然当时有以色列教会的代表，但却不得展示以色列国旗，因为苏联人不喜欢。所以，尽管救恩来自犹太人，以色列国旗却被排除在外。捷克的国旗也不能出现。原因是不久前苏联才入侵了捷克。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这也会让苏联人尴尬。当时最得敬重的旗帜，便是苏联国旗。但这却是沾满了无数殉道者鲜血的旗帜。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抗议，结果我被打，赶出了会场。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这次殴打远没有纳粹和共产党的殴打严重。那位殴打我的日本牧师很快就得到访问莫斯科的邀请，所有费用都出自苏联国库。

我在日本逗留的结果是，一位名叫八九和的弟兄就带领成立一个坚定的《日本向共产世界宣道会》。虽然该国的基督徒人数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

像东京浸信会大会的事件，并没有使我们丧胆。我们知道大多数浸信会成员全心站在我们一边；与我们冲突的，只是个别的领导人。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遇到大敌时，多数领袖都与当局妥协，只有少数坚持信仰。

我儿子米海和妻子朱迪也有类似的经验。当他们参加在德克萨斯州（Texas）达拉斯城（Dallas）举行的世界五旬节大会时，发现也来了苏联的代表团！并且广受尊敬！然而，就连苏联报章也称五旬节是一门邪教，苏俄会立刻逮捕任何这种败类，送去精神病院。那么苏共怎么会派遣这种败类前来？

索忍尼辛称这些宗教领袖为“黑暗王子的教会大使”。

我儿子就抗议主办当局接受这些共产走狗。主办人立刻粗暴把米海和太太赶出五旬节大会，而共产党间谍却得以继续与会。

第四章

冲突或妥协

一些西方教会领袖妥协

在共产国的天主教会，有些神父与共产当局妥协。他们就是所谓的“和平神父。”这名字取自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所谓的“地球和平。”捷克共产报章《Svobodne Slovo》报道说，这种神父的宗旨与捷克共产相符。捷克实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教导是必须废除所有的宗教和道德。

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捷克的神父们都被迫与共党妥协。我很了解，当一个人被劫匪用枪指着时，只能交出钱包。但奇怪的是，西方神父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却也妥协了。有谁威胁罗马教皇？但这教皇却派遣外交使节卡萨主教（Mgr Casaroli）前往捷克，任命一位名叫弗拉纳

（Vrana）的神父为主教。这位神父就是《和平神父运动》的领导人。他曾多次作法院的检方证人，指控忠实的基督徒。共产党当局希望这神父成为主教，梵蒂冈就屈服了。梵蒂冈忘了教会自古以来的规定：任何国家干预的任命都是无效的。

天主教阵营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奉承对共产党。尼波城（Naples）的报章 Il Mauino 发布了一份来自耶稣会领导层的文件，其中称赞波兰共党在经济上发展良好。这些耶稣会的教士们却不提两位劳

动人士，旦泽（Danzig）与斯特丁（Stettin）被杀的消息。这两人曾说，一个家庭月息四十美元是活不下去的。波兰第一个被枪杀的女工死时喊着“耶稣！玛利亚！”但这也没有感动任何西方耶稣会的领袖。我记得曾在罗马尼亚监狱里遇到另一种耶稣会士，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酷刑，并为他们的信仰而死。

让这些‘和平神父’们继续给上帝糟糠的祭饼：上帝的真孩子们站在我们这一边，给主耶稣最好的服侍，就像神在耶稣受难日，为我们作的一样。

匈牙利主教们决议称，该国名为社会主义，是因为实践公平。他们怎样形容在狱中的天主教同胞？（共党们都吃得肥胖，囚犯们却是皮包骨。）

吉利（Guilio Girardi）神父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专家之一。当时虽然有 600 名主教的要求谴责共产主义，吉利却不许通过。后来他因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被免职。他曾是神学院的教授。

这头披羊皮的狼终于被人发现了，但为时已晚。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同时也信从马克思主义，正如一个撒旦教徒不可能同时也是基督的门徒。

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的信徒。在我的《马克思是撒旦教徒吗？》一书中，我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证明了这个。

如今在众多神父和牧师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如野火蔓延。西贡（越南）助理大主教邗文顺（Franz Xaver Nguyen Van Thuan）和几位新教领袖遭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神父、修女和牧师们的谴责，并且入狱。因信仰基督而坐牢并不令人沮丧；令人沮丧的是那些谴责你的人竟是你的弟兄，曾经与你一起领受圣餐。这些“弟兄们”后来为了取悦撒旦而自吹为“进步派”。

所有共产国的真教会都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梵蒂冈、世界浸信会联盟等发出警告，说由共产当局任命的教会领袖，不该被信任。基督徒们要求公开抗议迫害他们的人。但这要求却被掩盖了。

普世教会的许多领袖依然不知道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在共产党大规模的屠杀共睹于世之后，法国基督教牧师莫利亚（Richard Moliard）还写道：“我敢希望，由于当今世界社会和政治的演变，法国共产党将会尊重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这就像希望魔鬼会回归神，或者希望鳄鱼会有一天进化成不吃人一样。

一些神职人员在西方背叛了基督教，另一些则在共产国里背叛了基督。许多基督教（新教）领袖与天主教徒一样，同样幻想。

我曾经和一位新教主教交谈过，他对捷克神学教授赫罗马 Hromadka 印象深刻。那位教授在西方巡回演说时，赞扬共产的自由。后来这位主教亲自访问捷克，亲眼目睹了这些“自由”。当杜布克 (Dubcek) 推翻诺沃 (Novotny) 的独裁统治时，捷克曾短暂地尝试引入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当时的共产报章一度获得一些自由。布拉迪 (Bratislava) 杂志《文化生活》1968 年 5 月 31 日，报道说，“信义会的活动被当局大大削弱，几乎已经完全丧失自主权。只有国家任命的人，才能处理教会事务。自 1950 年以来，整个教会都被囚禁。”所以，这位美国主教参观时，教会还在困锁中，可是这主教依然看不出捷克教会的困境。西方无数的教会领袖也是这样盲目。

其他自由世界教会领袖干脆背叛了教会。法国新教联合会发表文告，同情共产革命。他们写道：“福音的真理... 唯有革命斗争，才能胜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他们其实不晓得什么是共产革命。他们还没有亲眼见过。

俄罗斯基督徒却经历过共产革命，晓得它的可怕。

美国俄罗斯东正教会知道皮门(Pimen)当选苏联东正教长是一场闹剧。他是共产党提名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过去。当皮门担任列宁格勒主教时，当局关闭了他教区的一半教堂，他毫不抗议。后来，作为科雷马城(Kolyma)的主教，他暂停了两位英勇神父的职务，因为他们反对莫斯科教区屈服于无神论政府。这二人就是神父埃什利曼(Eshlima)和亚库宁(Yakunin)。当史达林的女儿斯维特兰

(Svetlana Stalina)叛逃时，他称她为“加略人犹大”。他又在1967年7月2日的《消息报Izvestia》上报道说，苏联从来没有迫害宗教。

自由世界的东正教和其他西方教会也随着皮门一同演戏。美国东正教甚至向这个虚假的苏联东正教会请求圣旨。

当这新上任的皮门教长在他的加冕典礼上，谎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徒自愿与东正教联合时，代表教皇的红衣主教科尼格(Konig)保持沉默。其实科尼格早就在梵蒂冈见过了乌克兰枢机主教斯利(Slipji)，也知道斯利曾因为反对这种强行的合并，被抓去西伯利亚奴役十八年。这种强行的合并已经害死了许多主教、神父和数千名平信徒。

皮门的理由很简单：当内夫城(Neftogorsk)的信徒建堂的计划被当局干扰时，信徒们要求皮门协助。皮门回答说：“如果当局不同意开设教堂，意即神不同意。”一个教会的大领袖说这种没骨气的话，是可耻的。

一些教会领袖，口是心非；就如卡列(Alexander Karev)。这人曾经因为信仰在共产监狱里度过了多年，后来却成为苏联官方浸信教会的总秘书。但真正的浸信会已经与他断绝关系。

有些人认为，对已经去世的人，我们不能说任何负面的话。真的吗？那么使徒们在犹大上吊后，提及他的背叛，也是冒犯吧？还有，我们也不该在使徒信经里，每周背诵彼拉多的错误。彼拉多不是已经过世多年了吗？怎么可以再提他的罪？

但一个人的错误，可能在他死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大有影响。不指正它，就可能叫多人受害。

这卡列(Karev)曾是一名忠实的教会领袖，但在他的后半生，却不再善良。当他去世时，他正在为《Braiskii Vestnik》（浸信会共产官方机关报，是共产党的傀儡）写文章。他曾写道，列宁是一位“人道的社会学家”。他又赞扬列宁的书。尽管这些书充满了对宗教的仇恨。教会的领袖应该热爱善良，不是舔共。

俄罗斯共产党人罗伊（Roy Medvedev）所著的《让历史来评判》（Alfred Knopf, 纽约, 1971）一书描述了苏联列宁主义监狱中对囚犯施加的一些酷刑。这个消息来源是无可质疑的，他详细描述了列宁党徒强迫无辜者认罪的方法。他们在母亲面前杀儿子，迫使母亲承认荒谬的罪。共党又把一位拒绝举报别人的囚犯，带到一个陌生人面前，然后对囚犯说，如果他依然拒绝合作，他们就把那陌生人枪杀了。那囚犯以为这只是口头的威胁，于是不听。党方就杀了那人。几天后，他们又这样杀一人。于是为了挽救第三人，这囚犯就向党方投降，举报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们也就被捕，也被杀害。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

对于许多教会领袖来说，萨沃（Savonarola）说的不错：“我们当代的主教牧师，除了极少数，都只会破坏教会，不会造就基督徒的灵命。”

萨沃还说：“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呼喊！’喊什么呢？‘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神职人员！因为你，才会有风暴。哦，神职人员，你们是罪恶的主因。我必须对你说，滚蛋！你们这该诅咒的教会领袖！你们已经成了无耻的妓女。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罪孽。你们成了魔鬼，成了野兽，怪物。经过这么多年的可耻行为，你们必到永远的幽禁中去。”

我们不应该忘记，萨沃本人也曾是一名神父。

萨沃的话既不礼貌也不圆滑，我的也是。我们没有受命必需对每个人微笑。我们的责任是忠于主。人们会听我们吗？我们不在乎。基督为我们献出生命时，没有得到我们的保证说，我们会回报他的爱。出于爱，我们也必须呼喊道：“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神职人员！”

发出这样的呼喊对我又一个巨大的痛苦。

遭受客观性的束缚

有些人热爱受迫害的教会，有些人则反对她。还有一类的人，则是那些犯了“客观”之罪的人。

一名名叫齐雷（Tsirckidze）的罪犯被关押在苏联的迪比利（Tbilisi）监狱。在他的请愿书中，他描述了共产党警察利用酷刑和挑衅的方式从其他囚犯那里获取虚假的自控书、证明他的罪。他承认自己曾亲自殴打其他囚犯致死，又奉命鸡奸其他犯人。他和其他受警察雇佣的罪犯就能获得烈酒、毒品和嫖妓。

为了赢得狱友们的信任，他们冒充反对当局的分
子，不惜自行割腕，最后一刻才获救。他们又故意

犯法，被关在惩罚牢房里，挨饿，睡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上，并借着与未来的受害者一起受苦，获得他们的友谊。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折磨他们。当你被那些你认为是朋友的人折磨时，那种痛苦可以令你发狂。

这种恶行在共产党监狱中很常见。我自己在罗马尼亚监狱里经历过。

齐雷的供词中最有趣的特点之一，是对人使用“物件，猎物，或对象（object）”一词。

被指派去受酷刑。例如：“特工 Agdgomelashvili 血腥地殴打了猎物 Iskanderashvili ... 特工 Uspulian 殴打了猎物 Kuhianidze。”。所有牢房里都传来殴打声，监狱里充满了猎物的尖叫声和哭声。

“对象”——这就是共产警察对囚犯的称呼，这正应验了列宁的思想：“要煎鸡蛋，就不免打破蛋壳；要锯木，也难免木屑飞扬。为了革命，杀人是免不了的。”列宁不晓得人与其他物件的不同。对他来说，除了他本身，其余人都是可无可有的物件，也就是他所谓的“对象”。

共产党把人降级为研究与实验的对象。他们也这样处理国家、种族、党派、并教会。

一些出现在德国电视连续剧中的前苏联囚犯，估计目前被囚的苏联政治犯，人数达 120 万人。其他人则声称苏联监狱里只有一百名基督徒。哪个数字正确？两者都不正确。受苦的人不是一个数据，他们就是我。

主耶稣问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使徒行传 9:4）。大数的扫罗可以如实回答：“我没有逼迫你；我只是迫害你的门徒。”但耶稣并不分别自己和门徒。祂的每一位弟子就是祂。祂受苦的兄弟姐妹不是祂思想的对象——他们就是祂。他们永远是主体（祂自己），不是客体（一个对象）。

如果被监禁的基督徒只是一个对象，那么无论是几十万人还是几个人，都无差别。但我们受苦的弟兄却不是对象，乃是我们本身。基督徒“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得后书 1:4）。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歌罗西书 1:18）。即使只有一个兄弟坐牢受苦，就是基督受苦。祂就是我，因为“现在活着的不是我，而是基督”（加拉太书 2:20）。基督是我的真我。我始终是主体，不是客体。

“魏恩波完全否定客观的理论”，荷兰刊物 *Reformatisch Dag Bladet* 用大标题这样写道。它说得对。

把人当作对象是错的。我们必须站在真理和爱的一边，不听敌人的攻击与讥笑。基督教会是对的。压迫它的人是错的。叛徒并那些向暴君妥协的人也是错的。是非之间没有中间地带。神亲自说：“我要使女人的后裔（救主）与蛇的后裔彼此为敌”（创 3:15）。这是敌对——不是和平共处，也不是妥协，也不是任何冗长的高谈阔论。

这客观论调，正是当今共产党打压基督徒的思想方式。我们只说，正义必须胜利。

我们的宣道会履行了每个基督徒反共的基本任务。加州基督教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宣称：“我不希望给人们留下一个不良的形象，仿佛我们就是反苏联、反俄罗斯、或反共产主义。”这话错哉！任何不反共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就像任何不反撒旦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一样。马克思主义是邪恶的，正如我在我的书《马克思是撒旦门徒吗？》中所表明的。共产主义本质就是邪恶，它不能成为善良。这就如魔鬼不能领受福音一样。我们的使命是拒绝在一切论及包容共产主义的言论。我们也建议您，在执行正义时，也拒绝这种妥协。

有些基督徒因信仰而入狱。无论是两人还是两百万人，对我们来说都没差别，除非是为了给与物质

的帮助。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因为他们与我们原是一体。

如今共产党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枪毙基督徒。他们把基督徒当作奴隶为他们劳作。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在集中营里写道：“我企图强迫自己殉难。我试探了上帝，但在他深不可测的计划中阻止了我。在这奴役营没有殉道者，至少没有像我们过去听说的古代圣徒一般的殉道。这里只有共产式的劳作。每个人就像蜡烛一样逐渐被消耗。过去圣徒殉道后，马上就进天国。如今的这种奴役，却是为撒旦效劳。这是最可怕的试探。请为我祈祷，给我脱离心中的绝望。”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苏联基督徒的绝望。但它却也正在折磨我们的心，企图摇动我们的信心。我们完全厌恶这种制度（共产）。我们不能回避而不提它。我们的宣道会没有时间去谈论教会过去的历史细节。当下的紧要工作是给受压迫的基督徒提供圣经、基督教读物、广播、并给囚犯家属的救济。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使俄罗斯和所有其他共产国家摆脱撒旦的统治。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客观的谈论”，而是击败敌人，所以我们的宣道，必须激起这场斗争的热情。这原则适用于所有基督教的工作和战争，也适用于所有参与正义事业的人。

各种痛苦

我的另一种痛苦是，许多人以为我反共，其实不然。我虽然讨厌共产，但并不是一个反共份子。

基督的诫命“爱你的仇敌，”其实是对我们软弱的让步。因为基督徒不该有敌人。基督徒对共党其实没有敌意。基督徒憎恶的是共产党的思路，并非憎恶共产党。基督徒了解共产党。爱是凡事相信（哥林多前书 13:17）。我们明白，生活在某些环境下，一个人只能成为共产党。

在爱共党的同时，一个基督徒也必须与共产党的思路斗争。这种斗争多方面的。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战区负责。

我也只能专注于基督教与共产斗争的一个领域。这可能使我不能看见人类面对的其余难题。我惊讶地发现，除了针对共产主义，我对人类其他的许多苦难都漠不关心。我们的责任是与所有善意的人团结一致。各人在生活的各部门，都在尽最大努力促进天国的发展。

共产党人看不到我爱他们，就像法利赛人看不出耶稣爱他们一样。共党的公开反击，与暗中的反驳，是很正常的。他们的攻击常是异常锐利的。

苏联媒体发表了大量文章，评击我的反革命、法西斯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任何反共者都是法西斯分子），声称我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妓院和九家夜总会。阿尔巴尼亚共产媒体也攻击我们。当我们从船上投放的福音书漂浮到他们的海岸时，地拉那 Tirana 广播电台感到很不安。西方左翼媒体也加入进来，甚至一些基督教刊物也发表了反对宣教和反对我的文章。

墙上的字

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从那里我看到那些挑剔我的人，就如向天吐痰的人一样。他们的痰既不会弄脏天堂，也不会弄脏那些坐在天上的人——而是会掉回来，落在自己的脸上。

作为神的孩子，人们无法伤我。他们给我的痛苦，都会转回落在自己的头上。我们蒙（神）眷爱，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却单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只渴望一件事：基督征服共产世界。克尔凯 Kierkegaard 写道：“当我们专心渴望一件事时，就是清洁的良心了。”（Purity of heart consists in willing one thing.）虽然这不是一

个详尽的定义，但我们正是专心渴望一件事，于是“得以见神。”

有了这保证，我就不怕给反对我的教会领袖们，一个最后的评论。

有一次，当巴比伦国王伯沙撒与他的大臣并贵妃们狂欢时，墙壁上出现了亚拉密 Aramic 的文字。国王立即召集他的顾问来读出这异常的事件。但没有一人能。伯沙撒就传召但以理，向他抱怨说：“我的智慧人和占星家都不能看懂这些文字。”（但 5:15）。

那文字是用亚拉密语 Aramaic 写的，这是犹太人的语言。犹太人是巴比伦帝国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为这个国家出任总理和其他政要。但巴比伦的智者中没有一个人费心去学习这民族的语言或宗教。

巴比伦的强敌玛代和波斯的军队已经围困该城。那天晚上，伯沙撒国王被杀，这座大城就落入敌人手中。巴比伦的智者没有智慧。他们不知道危险迫在眉睫，也无法警告国王。

那些智慧人的无知今天重演。普世教会的重要领袖们有足够的聪明，晓得如何为自己争取到领袖的地位与利益，但却不晓得自己该带领到基督跟前的

羊群，也不晓得基督教面对的共产危机。他们不晓得共产世界发生的事，也不知道自由世界正在发酵着什么。

对伯沙撒王的警告是一根指头写在墙上。对西方的警告却是用血写的，但我们的智慧人还是看不懂。

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被莫斯科训练的李哈维 Lee Harvey Oswald 杀了。罗伯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 被瑟罕 Sirhan Sirhan 所杀。瑟罕在笔记本上这样写：“共产主义就是最好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地主要大学的骚乱都是由一小部分热衷于暴力的职业左翼激进分子挑起的。他们到处发动恐怖袭击。共产党煽动的罢工能摧毁全国经济。但西方教会的智慧人却难以看见。问你教会的领袖，有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哲学。问他们神学院或圣经学校有没有提供这门课程。你会发现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就像巴比伦的智者不懂得亚拉密语一样。

我无意自夸，但是当 60,000 左翼分子于 1967 年 10 月 21 日在五角大楼游行时，我是唯一在场向他们谈论基督的牧师。我利用一台樱桃采摘机，在游行上方三十英尺高的地方，向六万名被共产

党引入歧途的灵魂宣讲。华盛顿的智慧人并不在那里。

我曾在圣费尔南多谷 San Fernando Valley 学院，与左派威尔金 Wilkinson 教授辩论。过后二十多名激进的学生公开宣称接受基督。其中一个人说，“昨天我还在吸食毒品 LSD。以后我不再使用那种毒品。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粮！”

当我访问菲律宾首都奎松市 Quezon 时，我发现大多数学生都是天主教徒，少数是福音派人士，共产党仅占最少。但主导群众的却是共党学生。墙上贴满了列宁和毛泽东的照片和语录。到处都看不见耶稣的肖像或圣经经文。会议结束时，我撕下了列宁的大幅海报，就如基甸推翻假神巴力的形象。当一些共产党威胁要殴打我时，基督教学生为我辩护。后来有人告诉我，自从我破坏了列宁海报后，基督徒就得到新的勇气。

当局可以批评共产主义的青年，可以逮捕，也可以枪决他们；但我们也可以为基督赢得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许多爱我们的人

在创世记 35:22 中，我们读到流便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房，原文写道：“以色列也听到”。译文却写为“以色列也听到了它”。在希伯来文，古抄写家 Massorates 指出“这节经文中间有停顿”。在每个会堂的律法书中，这一句话当中都会留着一个空白，以表明邪恶的事不必完全说出。当某些事物令人厌恶时，圣经常会突然中止不言。

为什么我要举报所有针对我们的恶行？我们有敌人，这一事实已经是我们的荣誉。苏联人拍摄了一部针对我们的电影。他们的媒体也谩骂我们，证明我们的工作有效。美国的一个浸信会宣教部门写了一封批评我的信，结尾说“魏恩波的圣经渗透了铁幕。”

另一方面，我们从全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里得到的称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安慰了。

以色列人普遍不喜欢希伯来裔基督徒，但《耶路撒冷邮报》社论却给我称许。天主教的主要刊物，梵蒂冈出版的《罗曼诺教堂 Osservatore Romano》期刊，给我的著作《神的地下教会》大字称赞。他们都知道我是新教徒（天主教极少接纳新教徒的文章。）

但现在我也该提及许多热爱我们宣道会的兄弟姐妹。

有一次，在洛杉矶机场，我在报刊亭看见一位水手，就问他是否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你在问什么！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六个星期了！你呢？”

“你没看到我的衣领吗？”我回答道。“我是牧师。”

那水手却不理会。“我没有问你如何谋生。我问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

我说我信主将近四十年了。

他继续问。“你是怎样的基督徒？”

“路德会。”

“我不在乎那个。我想知道您是否是一名基督徒，是否帮助在共产监狱中受苦受难的弟兄。”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那水手激动起来。“你最好读一本书。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了，一个复杂的名字——但标题是《为主受苦》。读了这书，你会哭泣、祈祷、提供帮助。耶稣说：‘我在监狱里，你来看望我。’如果你忘记了你在监狱里的弟兄，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认识写这本书的人，”我说，“他的妻子和儿子目前正在机场。”

水手要求我介绍，并且很高兴见到“那作者”的家人，以至于他完全忘了我。他对我太太说：“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愿意捐一百元给你们的工作。”他只是海军的一名厨师。然后，出乎意料的，我儿子称呼我为父亲。那人转向我，“那么你就是那作者了！”他拥抱了我，大声说道。“多么高兴啊！我再支持你四十块钱。”

信徒们有时不远千里去听他们在俄罗斯、中国或罗马尼亚的弟兄们的遭遇。当我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Helsinki 传道时，有听者来自最北端的拉普兰区 Lapland。当我在美国的威斯康州 Wisconsin 传道时，一位报纸老板来自阿拉斯加。他第一次从一位爱斯基摩人那里听到有关于我们。那爱斯基摩人又给他一本我的书，就激起他对地下教会的浓厚兴趣。

一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到达南非的一家基督教旅店。我们的车出了点问题。夜班服务员带我们去了房间，并补充道：“隔壁的房间是免费的，你们不妨随意使用。”当我推开隔壁的门时，一面镜子就掉在地上。一位穿着睡衣的女士惊恐地从床上跳下

来，说道：“先生你是谁，在这个时刻你来我房间干吗？”

“我是魏恩波，”我说，“旅店职员说这房间是空的。”她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太棒了！我已经读了关于你的一切。很高兴见到你！”

她完全忘记了我们见面时的尴尬场面，第二天早上她就捐了好大的一笔钱给我们的宣道会。

瑞典《五旬节日报》报道称：“魏恩波大声疾呼，虽然他所说的，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在客厅里讨论，但我们原谅他，因为几年之内他就教导我们该做的事，就是关注那些不适合所有基督徒圈子中谈论的可怕事。”

另一份瑞典报纸 *Norra Skane* 评论道：“在共产监狱中遭受酷刑的魏恩波在他的《魏恩波书信》一书中表明，被崇拜为神的共产制度是一种怪物。这怪物在这几十年来一直被殉道者的鲜血所束缚。。。魏恩波的书应该成为学校的必读。”

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使命为地下教会赢得了数百万朋友。世界上有四十亿人口，基督徒占了四分之一。

我们不欺骗自己。大多数基督徒、教会领袖和平信徒对我们的需求反应冷漠。即使索忍尼琴

Solzhenitsyn 的呼声，他们也听不见。耶稣也不受自己本国百姓的欢迎。

冷漠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防御机制，抵御干扰他的事物。每当我们收到坏消息时，第一反应是，‘哦，不，这不可能！’数亿无辜者正在遭受暴行，而共产党政权可能征服自由世界，这种想法太可怕了。原罪在使我们不愿意聆听过去耶稣钉十字架、也不要听今日共产国信徒的苦难。

我们这边是神的儿女，他们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的信息。我们将继续努力，叫耶稣成为所有人的王。但这将如何发生，谁也不知道。

每一位农夫都在自己的田地上操劳。我们如今得到的是一块石头地。我们必须向自由世界传播主的信息，虽然其中的人心，似乎已经忘了自己受苦的同胞。

第五章

使用一切手段

真假地下教会

我们到处都遇到自称是全球性的宣教机构。可是一查，就发现共产世界并不在他们的领域中。

我们的使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

我们现在以八十八种语言出版每月通讯。十五年来我出版了十二本书。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各写了一本书。这些书大部分已经译成多国语言。我的媳妇最近也出版了一本书——事实上，我们家里唯一还没有写过书的就是我九岁的孙女。

我们与多国地下教会进行了接触。这总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很高的技巧，因为地下教会有真假之分。共产党也伪造一种地下教会。苏联当局已经安排人冒充政治异见者、反共的作家和秘密的宗教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尽可能激发社会动荡，群众喧哗。共党的目标是麻木西方，他们希望自由世界感到：“无需担心苏联的威胁——苏联人自己也动荡不安。当局甚至无法镇压自家的反抗，如何能攻击我们？”

假地下运动也用于内部目的。克拉夫 Kravchenko 是一位著名的苏联叛逃者，他写了一本书，《我选择了自由》。提到他在克麦罗

Kemerovo 见过一台秘密印刷机，印制煽动叛乱和反斯大林的传单。但这其实是秘密警察的杰作。他们安排即将被处决，或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进行印刷，确保真相不会被揭穿。他们在晚上印刷，有共党官员监督。印成的传单就作为指控无辜者的罪证。

西方一些善意的组织渴望帮助共产国受迫害的基督徒。但如果有人未曾学医，就开始行医，并自我辩护说“我这样做是出于善心”，你会怎么说？

地下工作也是一门科学，需要多年的实践学习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赋。

进入共产世界的基督徒宣教士，常会遇到非常热心的当地基督徒。这些信徒会很兴奋的接受走私进来的圣经或书本。他们聪明地谈论圣经，他们知道如何祈祷，或是用东正教的方式、或是用天主教、浸信会或五旬节派的方式。有的甚至能证明自己曾经为主受过苦。当这些宣教士回国，很高兴自己见到了共产国的地下教会；但实际上他们遇到的是秘密警察人员。这些假信徒要么是曾经研究过神学的共党，要么就是在酷刑下投降的基督徒。这种失败的基督徒如今听从党的指示，作双面人。

迪沃姆 Divomlikov 在《叛徒 The Traitor》一书中提及一位苏联东正教主教。他曾是一名秘密警

察特工，在二战期间杀害了不少神父。后来党方决定，他必须成为一名神父，而且是一个特别神圣，人人都信任的神父。还有，必须是会友们乐意向他承认他们不会告诉别人的事。当他在神学院时，他非常严格地祈祷、禁食，并纯洁地生活。当共产党闯入神学院，试图充公一些有价值的圣像时，他是唯一捍卫的人。党员们殴打他，把他的牙齿也踢掉了。当他成为一名牧师后，他组织秘密主日学，并敢于宣讲别人不敢讲的道。就连一些共产党的高官也相信他，于是就向他承认自己是信徒。这些人过后就党方逮捕，有些被枪毙。

在东正教教堂里，已婚牧师不能成为主教，所以他的同志们就协助他，为他的妻子制造一场致命车祸。那妻子是一个真基督徒，对丈夫没有丝毫怀疑。然后他果然被任命为主教。当诗班唱道：“你们众殉道者啊，请为这位新上任的主教祈祷，使他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主教”时，他自娱自乐地想象过去那些为主殉道的烈士们会如何为他祈祷。他帮助他们成了烈士。

然而，最终，他多年来花费在祷告与读经的功夫（为了达到破坏教会的目的），却出人意料地使他真的信了主。

我并不认识那书的作者，但我收到一封认罪的信，来自一位俄罗斯东正教领袖。他被苏联委派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此外，又有一位罗马尼亚东正教神父，也在被党方指派道乌萨拉 Upsala 参与一场基督教会议时，透露他的双重角色。他也导致我的被捕和定罪。在他临终前，他承认所有的罪，又要求我的原谅。

在加勒休 Gallehue 的《耶稣会士 The Jesuit》一书中，提到了皮尤十二世 Pius XII 担任教皇时，梵蒂冈在俄罗斯组织秘密天主教会。其中一名成员是共产警察的特工，于是数百名天主教徒因此被捕或被杀。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无法透露姓名或讲述所有情况，但我们有一个共产国家官方东正教教会领导人之一的书面供词，他受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梵蒂冈的高度赞赏。他写道：“我们正是流氓和出卖者，我们出卖兄弟和父母，我们是没有良心的人。如果你能，请原谅我们。我们也要生存……我们真的找不到其他的途径：存活而又不玷污自己。我们若不要死亡，唯有作一个坏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也许比囚犯还要多……他们将带着殉道者的冠冕回去天家。我们却将永远低头。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干卑鄙的事，我们必须承受这种耻辱，直到有人原谅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协调我们的生活

欲望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保持纯净。我们没有勇气说“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纯洁”。诚实的代价对我们是太高了。我们选择出卖他人的自由，好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现在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生活，而是有道德地生活。”

这些人虽然遭受自己的良心的责备，但在西方却被视为教会的真领袖。人们都不晓得他们真的需要，是悔改！

乌克兰主教维茨 Bishop Welychkowsky 被捕前一个月，一名苏联特工冒充法国游客，代表西方教会高层，向主教索要有关教会在乌克兰秘密活动的信息，以便带回欧洲。该代理人出示了伪造的证件，主教向他提供了文字的信息。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西方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从共产国回来后说：‘我们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地下教会的消息。共产国教会已经学会了不向外国人透露自己的秘密。

共产党是欺骗大师。俄罗斯波斯威党 Bolshevik (就是共产党的前身) 的创始人之一布隆奇 Bronch-Buievich, 在书中提到共产党如何在创党时就渗入教会，甚至在沙皇时代已经这样做了。

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穆古先生 (Mr Murgu) 要求一位世界著名的欧洲牧师公开攻击我，以换取能以罗马尼亚传道。大使馆答应为他提供攻击我的材

料。共产党当然能伪造一切文件。这牧师拒绝了。后来这位牧师访问罗马尼亚，当局就打发警察逮捕他，再要求他渗透我们的组织。当他再次拒绝时，共党就逮捕了当地与他友好的弟兄，以勒索他。

渗透者的身体言语 kinesics

我们毫不怀疑共产党会派遣渗透者进入我们中间，找出我们的秘密。我们礼貌地接待他们，但不给他们晓得我们知道他们的使命。通常我们反而会得知他们的秘密。

发现这种间谍的原理简单。人受造不是成为一个叛徒，也不是成为一名罪犯。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的良心总是责备他，以致露出马脚。这就是犯罪分子常在犯罪现场留下指纹或个人物品的原因。世上没有不留痕迹的罪犯。

每一个叛徒和渗透者，其实都在大声宣称自己是叛徒。只是他们不是用口，而是用肢体的语言（这是一种新兴的心理学，称为 kinesics）。我们必须了解这种语言。

福音书多次提及主耶稣的动作；伸手，举目，触摸。身体会说话。手语是人类最古老的交流方式，

文字只是补充。肢体语言比口中的言语更能表达人心。

当一个人看到令人兴奋的东西时，眼睛的瞳孔就会放大。当男性看到女性裸体时，瞳孔会放大一倍。一个共产国家的真信徒，看到一本《圣经》，瞳孔就扩大。

小偷很少能直视任何人的脸。如果他真的能掌控自己，胆敢直视人，他的眼神就会过度。他目光过于强烈，仿佛在说，‘看，我可以直视你呢！’

我曾经看到一个可能是渗透者的人走在街上。他自称是从共产国的海员，如今逃到加拿大。他说自己过去曾经折磨过基督徒，后来悔改信主。然而，他走路的姿态不像一个背负重担的人，倒像一个得志的年轻人。他就如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项了不得的任务。圣经说，亚哈王悔改后，媛媛而行（王上 21:27）。

我认识一个人，他深度参与圣经走私活动。可是当他与人握手时，他总会把对方的手推开，好像在警告对方要防备他。他用这个手势表达了他的真实情感：“当心我：警察可能监视。我无法逃脱我必需扮演的角色，但你该自己小心。”

当向一个假装的门徒宣讲福音真理时，可以观察他的眉毛。一个不信的人，眉毛会不时抬起。在听道时，一个告密者常会耸肩，意味他内心冷漠。但真信徒却在听道中深受感动，不会有那种动作。

人们高兴的时候嘴角会扬起，不满的时候嘴角会下垂。信徒和告密者对同一件事不会有相同的反应。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伪装基督徒的警方人员常会不敲门而入，或在刚敲门就马上进入，并不等待房里的人回应。这是他在职业中养成的习惯。

狗不会亲近一个叛徒。

不诚实的人无法忍受贝多芬的音乐，因为太激荡人心。当这种乐曲响起时，他就要走开。因为这音乐引起他们心灵的不安。

观察身语是人的必需常识。了解这门科学可以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一个男人说他爱一个女孩，同时左右摇头，便与他的说法矛盾，除非他是印度人。在印度人，摇头表示认可。

有些基督徒绝望地问：“共产国有这么多奸细，怎能工作？”答案是：“学习身体言语。”但要彻底理解身体的语言，需要大量的经验。面部的一点扭动便意味许多内情。

地下工作的另一个原则是，总是假定每个人都可能出卖者。地下教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可完全信任自己的弟兄。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叛徒。殉道者的子女和妻子也不例外，在监狱里度过多年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卡列夫 Karev 就是一例。如今教会已经与他断绝关系。虽然他过去一度为基督入狱。

我们学会了辨别地下教会的真假。

通过适当的预防措施，我们成功地将大量圣经、福音书和其他基督教读物走私到共产国家。

但这种工作，还是火急需要干练的工人。不是每个主的工人都是好员工，其中也有坏员工。教会每一种工作岗位都是如此，但在我们的领域更是关键。

共产国的地下宣教不适合业余爱好者，只适合高度奉献和训练有素的人。它的前提是能操外语、了解马克思主义、共产警察方法和保密的规则。像我们这样的宣道会，汽车和办事处都可能会被暗中加上窃听器；电话也是。我们必须对工作人员进行筛选，对办公室进行检查，把敏感文件锁起来。

在共产国工作的一些传道会常严重疏忽。共产党渗透者不会忽视任何反共组织。

科尔森 Colson 在他的书《重生, Born Again》中讲述了五角大楼和白宫的秘密文件如何大泄露。各国不称职的传道会到共产国家服侍，只会导致苏联的兄弟们被捕。

耶利米写道，“懒惰为耶和行事的，必受咒诅。”（48:10）我们必须像先知一样严厉。我们必须公开反对那些与我们工作相似、但却办事马虎的组织。

正如保罗无法避免与彼得、巴拿巴并马可发生公开冲突，我们也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意图是正确的。耶稣本人也不得不争吵。在争夺爱情中，有时情人之间也会爆发争吵。

一股基督教读物进入共产国家

《列宁格勒真理报》Leningradskaia Pravda 写道，“一股宗教书本和传单，正在大量流向我们的国家”。

正如他们所说，这是一条滚滚河流。

原来从信耶稣的人心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小溪。

俄罗斯人说这些书本是基督徒带来的。这些基督徒伪装成游客，承担所有风险。他们在官方教堂中传播，有时秘密地或公开地在街上传播。

《苏联白俄罗斯 Sovietskaia Bielorussia》报章描述了被监禁的格里金 Grikin 如何提醒基督徒们，留心“把与国外的通信藏起来，还有来自外国的读物”。

苏联杂志 Voprosi Filosofii 在列举宗教持续存在的原因时，列出了基督徒读物的分布情况，有些是印刷的，有些是手写的，部分来自国外。

在审判苏联作家们中，官方指控加兰 Galanskov 在特罗修道院 (Troitska Sergeivska) 遇到了一位自称是娜迪亚 Nadia 的外国人，一位非常忠实的基督徒。“纳迪亚从国外给加兰带来了宗教读物。”

谁能反驳这事实？这是苏联媒体自己承认的。

我们的地下方法有效。神的话语到达铁幕后面。

《共青团真理报 Komsomolskaia Pravda》提及一名共产党科罗 Korobkov 曾惊讶的写道，著名工程师兼诗人瓦伦丁 Valentin 秘密受洗，又让他的幼儿受洗。瓦伦丁去世时，年仅二十九岁。当科罗进入他基督徒好友的房间时，他发现一切都没有动

过。瓦伦丁的福音书摊开着，上面有一个书签：“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到安息。”这位基督徒工程师正是找到了安息。他获得一本走私的圣经，所以得救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走私圣经。

一位铁幕后的信徒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告诉你，昨天我们收到了你的包裹，里面有非常珍贵的礼物；就是一本我们语言的赞美诗集。我们的家人和教会向您们衷心感谢。这是我们切需的。因为，如你所知，我们这里没有新的歌集，旧的也都没了。目前我们正在抄写歌曲。我们只能抄歌词，不能抄乐符，于是各人的唱法都不同。非常多谢你们给的歌集。”

一位同工写道，“在我的衣物中藏有《圣经》、《新约》等书。在边境，我装着最多读物的手提箱被仔细搜查，但主耶稣肯定闭了警卫的眼睛，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手提箱的底部铺满了《圣经》，上面只盖了一张纸，但警卫却看不见。”

莫斯科杂志《鼓动者 Agitator》报道说：“他们使用反苏的读物轰炸我们的国家。有时他们把装有福音单张的瓶子扔进海里，让潮流带到共产国的海岸。有时这些西方人复制苏联报章的首页和第四页（末页），而第二页和第三页则是反苏的文章。

这种假冒的报章从资本国家送往苏联，说是‘退货’，理由是‘地址不明’。我们的敌人也用同样的手法，利用书本和杂志。社会主义的敌人精明又狡猾。”

为了给读者们了解这种反苏文学，《鼓动者》讲述了这些活动的结果。

“最后，我们看到各宗派的活动。这些教派是狂热的，不守苏联法律。福音派浸信会成员教导人拒绝参与社会生活，违反我国针对迷信的法律。他们努力向孩子们传授他们的宗教和道德，这些都不是苏联公民的本色。”

共产党对走私到他们国家的基督教读物感到愤怒。我们让苏联水手得到了它。虽然这些水手们可能对宗教毫无兴趣，他们也会接受。在苏联黑市，一本圣经可以卖到十五英镑。苏联人渴求神的话。

别洛夫 (A. Belov) 在他的著作《宗教与各种主义的斗争 Religion in the Modern Ideological Struggle》中，描述了莫斯科海关人员埋怨在游客身上发现的众多书本、小册子和传单，或者藏在邮寄的包裹中，我们为许多西方人提供苏联公民的地址。外交官（有时是共产外交官）、外国导游等人也会携带这些读物。

当我们仔细阅读别洛夫的每一个字后，我们高兴发现，莫斯科海关人员只发现了几十本这样的读物。我们其余的数十万份读物已经进入苏联。我们认为，这几十本小书小册，就算是我们该缴纳的关税。

共产党报《Svei Prace》刊登了捷克一位高级海关的抱怨。他说那么多的宗教读物进入他的国家，以至于海关人手不足。共产党对西方国家突然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宗教发生异常的兴趣感到惊讶。

“我们海关官员必须毫不妥协地打击这种宗教读物，就像打击走私金币或艺术品一样。”（一位英国的教会领袖把圣经走私与酒类走私相提并论。他正是与共产党同感一灵？）

文章报道，在从维也纳 Vienna 开往布拉格 Prague 和卡尔斯 Karlsbad 的巴士线路上，39 本宗教书籍被没收。在巴瓦利 Bavarian 边境，一组走私者没收了 36 本《圣经》和 437 本宗教书籍。共产党又从一支瑞典团队没收了 316 本《新约》和数十本其他的基督教书籍。

文章最后这样写道：“这些游客该知道，在捷克边境，偷运教会读物是非法的。”

我们并不局限于走私。我们还帮助共产国家建立自己的印刷机——有些是先进的，有些是原始的。但这依然不足。一些读物还是必需靠走私。

所有的方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苏联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小麦。一位基督徒在谷物升降机上可以看到这批货物包含两种食物：身体和灵魂的食物。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从西方购买机器。可是这些机器不总是工作顺畅。当然，因为机械里面塞满了圣经，如何能顺畅运作？苏联和东欧诸国每年有超过六百万游客。谁能检查每辆车的轮胎？或每扇车门没有双层？有时海关人员检查车地板后，发现没有双层，就道歉放行，可是福音书却藏在车的双层车顶上。还有，游客中多有孕妇。但她们怀的却不是胎儿，而是福音单行本。

我们研究了洋流，确保可以带福音本冲往中国海岸、或抵达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和古巴。我们用塑料袋把小册封密，加上一根吸管，让它漂浮，又加一块口香糖，吸引孩子们把它们捡起来。

但走私的圣经会不会被没收？通常不会。有些果然被官方逮获了，但没收的书本也会抵达众人的手中。共产党索科 Sokolov 在莫斯科被捕。他是海关人员之一，负责禁止的宗教书籍入境。他没收了大

量书本，通过一个秘密销售网络，卖给那些渴望神圣言的人。

走私圣经是否正当？

在事关我们得救的问题，神就不把自己约束在人类的粗浅道德上。正常的道德是：如果一个父亲让自己无辜的儿子死去，不值得赞扬。当这父亲有能力救自己的儿子时，却袖手旁观，看着他被陷害、受鞭打、又钉在十架上，就更糟。但我们的天父不仅允许自己的儿子死去：而且还“乐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赛 53:10）。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救世人的唯一方法！于是我们看为可恶的行为，可能是最大的爱之行动。

如果神让自己的儿子为救人而死，我们也就晓得为了救共产国里的失落灵魂，任何方法都是正当的。于是我们用独创的方式走私圣经。

灵魂的食物比身体的食物更重要。

我们真的可以进行走私和撒谎吗？

在自由国家，基督徒可以加入警察或情报部门，进入恐怖分子组织、匪帮或贩毒集团中担任卧底。

请问，当他在潜入这些组织时，他必须告诉匪类说，他就是警方派来的特工？

还有，基督徒可以从事心理学或社会科学恶研究吗？

研究人员试图了解，教师的期望会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为此，心理学家告诉十八位小学老师，他们班上的某些孩子会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而其他孩子则不太可能。他们说，他们根据心理测验，预测了孩子们的成就。其实，孩子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到了年底，研究人员发现，老师们期望能够成功的孩子比那些不期望成功的孩子得分更高。这实验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老师对孩子成功的期望有助于孩子进步。但心理学家起先并没有告诉老师真相。一个道德君子会称这些心理学家们为骗子。

类似的程序也用于双盲的实验。这对发现新药或新疗法的成效至关重要。

一位基督徒可以成为商人吗？他可以使用广告吗？他能声称他的香水或他的鞋子是最好的吗？他什么时候查遍了全世界所有的香水，才发现他的是最好的？但如果不赞扬他的产品，又与其他产品进行比较，如何作广告？

耶稣说，祂不仅是真理，也是生命。我们需要真理，也需要生活的必需品。你不能单单求真诚，因为这样会危及许多生命。有数亿人正在撒旦的共产政权俘虏中，他们需要真光。

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需说真话，那么偷窃也必然错了。

在莫斯科出现的《青年旗帜 Flag of Youth》讲述了西奇姐妹(sister Sitch)的故事。她的孩子斯拉瓦(Slava)被法庭判决从她身边带走，因为她教这孩子说，无神论者就是魔鬼之子，并吩咐他在学校反映嘲笑宗教的电影时，闭上眼睛。西奇从无神论寄宿学校“偷带”自己的孩子出来，把他送到维捷 Vitebsk 城的弟兄们的家，藏在那里。邻居们听说这是个孤儿。后来当局发现这孩子，就把他带回寄宿学校。但他的母亲有时依然成功秘密会见他。

她的第二个孩子也被当局带走，因为他撕毁了苏联的校服小徽章，并告诉老师说，他可怜她，因为她不信上帝，必下地狱。

西奇姐妹偷走自己的孩子有错吗？把被共产党绑架的孩子抢回来算不算是罪？也许共产党才是强盗。

我很想知道谁才是骗子。偷渡圣经的人算是骗子吗？还是共产党？共党用无神论欺骗人，禁止人阅读神的话。批评我们的人并不理解真相。

在哥林多前书 9:22 中，保罗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人。”既然是“无论如何”，谁能吩咐他只能通过“合法”的手段传播福音？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的圣经抵达目的地。

你们的贡献使圣经得以进入共产国。有时我们在古巴空投读物。共产的雷达无法探测到与天使一起飞行的飞机。

当我们听到投在大海的福音单张小包已经抵达目的地时，我非常高兴。第一个确认是来自苏联的德裔弟兄。后来他们获得允许移居西德。其中一位告诉我们，他们首先是从广播中听到这消息，引述《传道书》的一句话：“把你的粮扔到水面上，多日后就必有收成。”他们就开始沿着海岸观看。共产党警察在获得内奸的通报后，也在海岸等候。但后来这些警员们都疲倦了，就不再等候。我们的弟兄却坚持守望。到了第四天，福音书到来了。弟兄们从白令海岸 Bailie shore 一直到俄中边境，尽量收集。

后来迪拉那 Tirana 广播电台也开始咒骂我们，证明福音单张已经到达阿尔巴尼亚 Albania 海岸。最令我们欣喜的是，我们收到了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一封信，确认海浪传送的福音单张已经到达信徒手中。

我最大的欣慰是，这本教导如何对同胞有一颗慈悲心、对主有一颗热心的圣书，已经进入铁幕国家。

对我们的另一个指责是，有些人因将神的话语走私到共产国家而受苦。许多秘密输送的人被捕。还有，也有人因为读了我们的书本而信主，也有因此坐牢，或孩子们被当局带走。

在过去，主耶稣也有同样的问题。祂警告门徒说，如果他们跟随祂的道路，就会受到迫害。祂说：“我派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这意味着必死无疑。祂这样做对吗？如果使徒们没有成为祂的门徒，他们可能会活多三五十年，而且死得安详。但因着耶稣，这些使徒们几乎都殉道了。

圣保罗知道尼禄皇帝会把基督徒扔给野兽。于是他传道叫人信基督，是否应该？

我们的情况是如此。

我们以终极的爱来爱人，就是爱他们的灵魂。神的话语可以永远的拯救灵魂。少了神的话，灵魂就失去方向。所以这一切风险都是值得的。我们必须从地狱之火中抢救灵魂。

对基督徒殉道者家属的救援工作也风险很大。由于我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通常进展顺利。这里也可能发生事故。人们可能会因帮助殉道者家属而入狱。但我们可以因为它有风险，就放弃不干吗？

我们不能透露走私工作的更多细节。我在祈祷中祈求上帝，如果我做了任何好事，我的善行的阴影（或痕迹）应该永远落在我身后。不必看见。

走私出境

我们不仅走私圣经进入共产国家。我们也把一些文件从共产国走私出来。许多证实地下教会存在的资料已经抵达西方。

共产党自己也放弃否认这教会的存在。他们甚至承认它规模庞大。苏联作家特普利 Teplianov，在他的书《无神论教育问题 The Problems of Atheist Education》（沃罗 Voronej 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写道，仅在沃罗地区就有 48 间官方东正教教堂和 482 间地下东正教教堂，还有 23 间“

真东正教会，”就是东正教的一个分支。另外还有8间官方浸信会和97间地下浸信会，1间官方旧正教会和14间非官方旧正教会等。地下教会的数量是官方教会的十倍。

苏联报纸《哈萨克真理报 Kazakhstanskaia Pravda,》报道说，苏联的弟兄们自行印刷大量的教会书籍。来自阿拉木图 Alma-Ata 多名姐妹已经被捕，就是因为在国家印务局印制基督教赞美诗集。其中包括维希 Vershtshaghina、伊万 Ivan, 玛利亚 Maria Pavliutchenko、维林 Valentina Max, 伊莫娃 (imova) 和塔玛 (Tamara Sokova)。她们获得厂长和所有工人的合作、并司机的默许，没有一人举报她们。普通苏联公民非常同情基督徒，即使他们本身不是信徒。

阿拉木图的基督徒制作这些赞美诗集，共花费了10,000 卢布，相当于一名工人 100 个月的工资。在西方相当于 20,000 英镑。英国有哪一间豪华的教堂可以轻易筹集到这么一笔钱？苏联的基督徒很穷，但他们平均奉献 40% 的收入给教会。他们从不花钱购买豪华建筑、唱诗班长袍、礼拜后的饼干等等。一切都是为了传播福音。按比例来说，他们为传福音付出的代价远高于我们西方人。一旦被捕，他们就丧失自由，有时也丧命。

上述是苏联共党已经发现的基督徒活动，我们就报告这么多。除非‘罪犯’已经被抓获，否则我们绝不会道出任何地下教会的活动。但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国家内许多地方都有秘密的教会印刷。参与印刷的人有时必须生活在地下，免得被教会奸细的举报。他们不能离开地下室。在地下没有阳光，没有花朵，连他们自己家人也不晓得他们（或她们）的下落。但为了教会的需要，他（她）们就放弃自己的自由。

据说西方曾有一间教堂发生火灾。观众中有一位著名的无神论者。牧师问他说，“当教堂完好时，你不来。现在教堂被烧了，你却来了？”那无神论者回答说：“如果你的教堂一直都是火热的，我肯定会天天来。”你也可以藉着与英勇的地下教会联合，让你的教堂火热起来。

我们对官方教会领袖的态度

许多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的宣道会认为共产国家（除了波兰、南斯拉夫和东德，）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多是叛徒和共党的走狗（当然也有一些光荣的例外。）

我这样称呼他们正确吗？首先，各人的性格不同。彼得在使徒行传 1:16 中提到犹大时，并没有称他为叛徒；但约翰却称犹大为叛徒和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性格就像各人的口味，纯属个人的。其次是，任何人如果打算给铁幕后的教会提供帮助，都不会考虑官方的教会。

天主教组织“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教会援助）的负责人文伦 Father Werenfried Van Straaten 神父写道：“我们不能相信官访我们教区的苏联主教，因为他们都是莫斯科的代理。其中最危险的一位，就是现年四十一岁的尼科主教 Nikodeme。他原是共青团员，未曾上过神学，也未曾住过修道院，却突然在二十八岁成为主教。作为莫斯科教区的大人物，他十一年来一直有计划地摧毁东正教。根据安德烈 Andre Martin 无可辩驳的证据，尼科是恶魔，他正在无声无息的扼杀东正教，同时又向梵蒂冈报告说苏联享有宗教自由。在他任职期间，苏联当局关闭了 15,000 间东正教会。”

文伦神父关于已故的尼科的评语，也适用于许多牧职人员。

在《使徒教规》第三十条，和第二届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第三教规写明：“任何利用世俗权力获得教

会管辖权的主教，就必须被废黜，赶出教会。任何继续与他保持联络的教友，也必须一拼排除（excommunicate）。”

必需注意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也是基督徒。如果这些统治者使用自己的权力，任命主教，已经是大大冒犯了教会，何况是今日，统治者是撒旦差役的时候，教会更当如何看待撒旦任命的主教？

“爱。 。 。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前书 13:5）。”这话常被理解为基督徒不做没有礼貌的事。但圣保罗本人有时也非常不礼貌。主耶稣也是。改革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也是。当教会与世界的命运受到威胁时，顾及礼貌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在希腊原文，这句话中“不体面” aschemon 指的是“无系统，无计划”。于是这话的正确意思是“爱不做没有计划的事。”

基督就像一位动物学家，为人们分门别类。有些人是羊，另一些是狼，其他是狗，还有狐狸。他称一些人为愚昧的、属于伪君子类和毒蛇类。还有一些是亲爱的弟兄。他晓得一只大兽、一条红龙和一只特选的鸽子。爱不作无系统的事，就是说，不作无计划的事。

所有的人都必须获得爱，但我对待一只“狼”不能像对待一只羊一般；也不能对待一位仁爱的门徒，就如对待一个伪君子；或对待一个暴君，就像对待被他苦害的人们一般。一个不分羊和狼的牧人有祸了！一个看不出丈夫好坏的妻子有祸了！一个不能看出孩子孝顺与否的父母也是。爱的态度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如果一群歹徒袭击一个无辜者，虽然我爱双方，但我会先尽力保护无辜者，必要时也向歹徒开枪。否则我的行为就会变成“没有系统”，因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在世界格局中占的位置。我们对待那些对教会有益和对教会有害的人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的使命就是猛烈攻击任何要摧毁教会的狼，包括教会领袖。

传播福音

回答了针对我们的指责后，我就可以说我们工作的其他方面。

我们的宣道会以十二种语言向共产国家或受共产威胁的国家传福音。我们得到许多奇特的反应。

一位来自上海的听众问道：“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知道，国外有一门“神学”或“灵魂研究”

。它是说什么？可以解释吗？...人死了，灵魂也随之消失。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灵魂。我不明白耶稣是神，而这神又会留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另一位听众，叶辰，写道：“岁月如流水，我不知道人的生命是否有尽头。”

又有一位问：“对基督徒来说，容忍他人的不良行为，是一种好事吗？”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

最感人的一封信，是来自广州一位年轻人写的：“当我听你们广播的节目时，我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我是一位信徒。但是，当人与神完全分离、没有教会时，作为信徒意味着什么呢？（当时红色中国的所有教堂都关闭了。）说真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祈祷。或许这就是我们在说完所有的话后，可以加上‘阿门’？”

这是我听过的对祈祷的最好定义。让我且举一个例子：

你下班回家，又累又烦。你的妻子为你做了晚饭，但味道并不好，没有加盐。还有，这菜汤里有一根头发正在汤面。你可以讥刺你妻子说，“这是什么汤？你看，有一根头发在里面。你做饭的时候还在梳头吗？我希望你不要再这样做了。”你可以用“阿门”结束吗？很难吧？

但如果你对妻子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依然就如我们初恋时一般，想着我，以致忘了在汤里加盐。但你却给我一个惊喜。你知道我多么喜欢你美丽头发。于是你就在汤里放一根！明天我会买一个小项链盒子，把头发套进去。然后我可以挂在我的脖子上。现在就给我一个拥抱。”如果你这样对妻子说，就可以加上“阿门”了！

这种祈祷方式是我从一位中国青年学到的！如此说话，我们就能“不住的祷告，说阿门”了！

在1944年，当我开始向涌入罗马尼亚的苏联士兵秘密传教时，我发现，虽然我也能说俄语，但我其实不了解他们。当我告诉他们有关《失羊的比喻》时，他们就反对说：“没有人能拥有一百只羊。羊群理当属于集体农场。”当我告诉他们说，耶稣比喻中葡萄园的租户们拒绝给主人果子，并杀了主人派来收租的仆人和主人的亲生子时，他们的回答是：“这些农夫做的对，人们都该反对资本家。葡萄园的主人是个地主，所以他的财产该被没收。”他们嘲笑圣母玛利亚，说：“为什么一个女孩必须守童身？”还有“耶稣是王？！”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国王。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人、圣殿、祭坛、什一税、诗篇、圣灵，甚至天使。他们不可能理解福音。给他们一本俄语的福音书，对他们毫无益处。

为此，我写了一本《马克思语言的福音》。正如圣马太为犹太人写了马太福音；圣路加为希腊人写了路加福音，我也用共党所能了解的，为共产党人写一本福音。

这些特别的广播惹怒了共党媒体。我们有幸成为最受苏联攻击的宗教广播。

一位俄罗斯的五旬节牧师获得移居美国。他告诉我们说，苏联当局把基督徒叫去见秘密警察，命令他们写信给远东广播公司（福音广播台）。当局吩咐信徒们称赞广播台的基督事工，要求继续这种广播。又告诉广播台说，当地的人都渴望神的道。信中只抱怨一件事：就是信徒们都很讨厌听到马克思语言的福音！

正是踩到对手的痛脚。

《马克思语言的福音》的西班牙语译本在自由世界也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我们用西班牙语广播，就收到一名秘鲁游击队的信。这人在灌木丛中听到它。他惊讶耶稣爱敌人的教导，眨眼间他的心就改变了。他立刻意识到使用枪械杀人是多么愚蠢。他离开丛林，来到城市，加入教会，成为一名主日学老师。即便如此，他的内心却还不平息。两年后，他又回到丛林，要把基督传给他以前的战友。我们就不再听到他的消息。可能他被同僚们杀了。

一位姊妹在听到我们罗马尼亚语广播后，写信给我们说：“我为你们感谢天父和主耶稣，因为得以听见神的话。我在夜间醒来，跪下求神赐您健康和力量，好让我们能继续听到您的声音。”

世界之子常比光明之子聪明。两千多年前，祭司长就知道大众的影响力。他们知道彼拉多也像许多人一样，会受群众影响。如果有一大群人，就能令他做一些他原来不想做的事。如果他独自静思，就不会那样做。群众的意见是巨大的。于是大祭司就利用群众，操纵彼拉多。但大众的意欲也可以用来做好事。

如果我们要救恩临到共产世界，帮助基督徒殉道者；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国家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相，并如何胜过它，我们就必须大声呼喊。这就是我们广播台做的。

苏联听众提出的问题令人心碎：“人为什么会死？死亡从何而来？死亡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与神相交？我们怎样才能认识神？请你慢慢地说，并且重复，因为我要抄下来。”

共产当局对我们的广播感到震惊，这表明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但福音广播台不仅设立在国外。诺沃（Novoe R. Slovo）写及苏联境内的秘密广播台。苏联对这行为的惩罚是死刑。

这部作品给所有质疑地下教会存在的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欧洲教会会议秘书加菲 (Garfield Williams) 神父在瑞士报纸《洛桑羚羊报 Gazelle De Lausanne》上写道，地下教会是“定义错误、而且夸大了”。我在书中表明，俄罗斯地下教会拥有秘密的学院、秘密祈祷会和洗礼、秘密任命的牧师和主教、还有共党中的秘密信徒（共产党视这种人为叛徒）、秘密杂志、秘密印刷机、秘密修道院。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有地下教会，那么还有一个证据：秘密无线电发射台。在这一切都证实后，如果加菲弟兄依然不信有地下教会，我就无能为力了。

莫斯科杂志《鼓动者 Agitator》猛烈攻击基督教广播，说这种广播台“把天空充斥着广播节目，目的是增加人们对宗教的兴趣，煽动宗教狂热，并改变人们宗教的观点和信仰。它们联合众人反对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又说，这些广播的教导，就成了信徒们的生活准则。俄罗斯弟兄告诉我们：“你的讲道是我们灵魂的安慰，是这干旱世界的一杯凉水。”

《乌克兰真理报 Pravda Ukraini》正确地抱怨说，我们广播的目的是温和地引导信徒们，逐渐放弃唯物主义，渐渐反对苏维埃政权(苏联政权)

苏联不接受耶稣的话“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他们要求全人归顺共产。面对这么猖狂的“凯撒”，基督徒就没有欠他什么了。

最近来自苏联信徒的通讯，也是给你们的，因为你们是我们坚定支持者：“我们特别想到那些照顾圣徒需要的人。‘当我赤身露体时，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医治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探望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服侍我最小的弟兄，就是服侍我了。’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包裹、印刷品以及其他帮助，我们感谢上帝，也感谢你们。你们的奖赏在上帝那里。”

我们向您保证，您为我们铁幕背后的兄弟所做的没有白费。来自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报道称，当福音广播时，村里的人都会放下手中的事情，聚集到有收音机的人家中。非信徒和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跪下听布道。连共党高层也是因为听到国外的基督教广播而信主的。

帮助殉道者家属

您的捐款将用于向基督教殉道者寄送包裹。一个收到包裹的家庭写道：“我们感谢而欢呼，你在美国也应该能听到！”

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妻子在她的丈夫被判刑时，必需喂养八个孩子，她写道：‘我收到了您们的包裹。我感谢上帝让我有幸背负基督十字架的碎片。孩子们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但他们的父亲却因这一度传达给圣徒的信仰，不能陪伴他们了。’

另一封信是由浸信会会长克留奇（Kriutchkov）署名的。他已经躲藏起来，因为当局已经对他下了逮捕令：‘感谢你们寄来的基督教书籍和福音广播。我们依然灵里干渴，但通过你们的努力，我们至少不至于死亡。’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信件。

我们分裂了共产党

我们也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成功，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揭露共党罪行时，我们分裂了共产党。

1976年12月12日，巴黎《费加罗报 Figaro》报道说，我们德国支部的同事克莱文（Paul Klavins）从苏联走私出一部电影，有关里加城（拉脱维亚）克罗斯 Krosvstpilz- Ella 监狱的情况，给美国（CBS）、英国、法国等电视台放

映。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对囚犯遭受的恶劣待遇，向苏联提出抗议。尽管苏联的《真理报》愤怒地否认了该影片的真实性，但12月24日另一家苏联杂志《Liieratumaia Gazeta》却证实了它。

1976年11月3日《洛杉矶时报》披露，苏联共产党给西方世界的同志们发了一封长信，主要就是讨论我们宣道会偷运到西方的这部影片。

在这份文件中，苏联人试图为这部电影辩解，声称苏联的研究显示15%的囚犯精神错乱。当然，他们没有解释这种精神错乱是在入狱前还是入狱后。这封信证明我们的宣道工作有效。在参加了我们法国宣道主任克莱文和格罗姐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法国媒体一致谴责了红色恐怖。英国共产党也与苏共划清界限。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尔凯 Marchais 甚至因此不出席国际共产会议。

意大利共产党也公开谴责他们苏联同志的残酷行径。我们的消息叫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大失人心，更不容易当选为国家领袖。

第六章

里程碑

阿尔安国际会议

我们宣道会的一个亮点是在瑞士 Chateau d'Oex 岱堡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各大洲的代表都来出席这会议。由于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所以我不能透露太多我们讨论的内容，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同工之间的爱和理解。

这会议给我的书的出版商霍德和斯托顿（Hodder and Stoughton）发了一封电报，感谢他们的贡献。他们是史上第一家世俗出版社，却成为全球基督教宣教的有力支柱。

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另外两个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挪威路德教会主教农德瓦 Nonderval 按立我儿子为牧师，有九国的牧师赞同，包括我。如今米海是我们美国支部的总干事。在监狱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祈祷这儿子归主。主果然垂听了。

第二个印象来自我们一起领受的圣餐。由于在共党权下我没有教会，于是多年未曾分发圣餐。这次

我必须讲道。当我跪下祈祷时，我前所未有地理解了圣餐的意义。

我们在圣餐纪念圣子的死，但我们也暗地里记住了为此目的派遣圣子到世上来的圣父。圣经说：“耶和华乐意伤他”（赛 53:3）。我们纪念圣子的痛苦和圣父从中获得的快乐。

三一神创造了世界。当人们开始用铁器时，圣父对圣子说：“人们将用这样的铁，把钉子打穿你的手和脚。”当树开始在地上生长时，圣父说：“从这样树，人们将打造圣殿的栋梁，也打造钉你的十字架。”当动物生长时，就得到坚韧的皮，可以用来制作鞋子，也可以制成皮鞭，用以鞭挞圣子。后来人也被造了。他们拥有千万计的神经线，可以感受欢乐，但也让耶稣得以承受极度的痛苦。

我记得一位共产酷刑者的话：‘如果有上帝，我们就借着折磨你，实现他的旨意。如果上帝创造了人体，那么祂创造它主要就是为了让别人挨痛。身体中有几个区域可以通过触摸而产生愉悦感？五个或六个。但至于酷刑，我可以借着掀起女孩们的头发，把她们吊在半空，也可以殴打她们的脚底。人体没有一英寸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圣父造了泪腺，告诉基督说，“这是给你母亲的，这样她可以在骷髅山哭泣。这是多么好的一句话

：‘神乐意将他压伤。’祂创造人的鲜血，主要就是为正义而流淌。它的所有其他用途都属次要。

在这次圣餐中，我第一次认识到神赐下救主的意义。

如果在神只是单纯的一个，那么就无需强调祂的独一了。正是因为在这独一之中，也有内里的紧张关系。

我想起主在约翰福音 16 章 7 节所说的奇怪的话：“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会临到你们那里。”似乎圣子与圣灵避免同时遇见同一个人？

我可以感觉到在神圣的三位一体内部，存有紧张关系，因为我也属于神的家，而神和爱祂的我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如果神与人真的完美和谐，为什么多数人都向神要求如此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是神自愿给我们的？信徒们的真祷告，常是：“不要成就你的旨意，要成就我的旨意。”即使他们的嘴巴不是这样说。

我的印象是，在我们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正在与神命定的安排斗争。

希特勒统治德国直到把全国搞垮了。希特勒告诉施佩尔（Speer）说，“神的供应帮助了我，”这

也是事实。于是他就得得以彻底摧毁德国。因为一切谋杀他的企图都失败了。

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神赐能力给一条龙，让它能与圣徒争战，并且战胜。“有能力赐给他，[如果不是神赐，还有谁?] 超越所有种族、语言和国家。”

我无法忍受共产党占领几乎半个世界。可是神却给我更糟的事。教会将暂时被击败，就像耶稣在骷髅山被撒旦击败一样。

我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求天父把这苦杯取去。但它不会。凡恨锡安的，到最后必被神羞辱。他们将像草一样被火烧毁。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圣诗。

我完全不明白。理性告诉我，整件事都是荒谬的。我已经放弃了路德所说的“理性之兽”；我相信并崇拜。

我们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二次国际会议。这次我们有来自远方国家的代表，例如日本、越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我们的越南主理。当南越落入共产党手中时，他选择留下来。如今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秘鲁、哥伦比亚、巴西、澳大利亚和芬兰也有代表上来。

我们绝对有必要聚在一起讨论。但如何不花费大量资金就能举办这样的国际会议呢？我们决定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因此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会议与圣地国际之旅结合起来，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约 250 名参与者。对于售出一定数量的门票，我们免费获得一张。这样我们各地的主任们就不须花费我们任何费用。

拜访耶稣曾经居住的地方，对我们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难忘的经历。但有一件事甚至超越了这一点。我们中间有克拉森 (Klassen) 弟兄，他在共产主义监狱里活了十年；哈姆 (Hamm) 弟兄，他被驱逐到北极圈二十年；还有罗斯 (Rose) 弟兄，他有自己的迫害经历。看着这些人拜访以色列，自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事。

由于我以前来过以色列，所以我遇到了无数来自罗马尼亚的希伯来教会的旧友，他们在我下狱后移居以色列。我还见到了一位前共产党秘密警官，他为我出狱提供了帮助。他因尽力解救我而入狱。在他出狱的那天，他拿着一朵花来找我，“这是多谢你给我机会，为如此光荣的事业受苦。”

我们还在以色列开展了传教工作。我的书有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版本。后一版本已发送到阿拉伯国家。随后我们也召开了另一些国际会议。

迷惑人心的新策略

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不断变化。当我刚到西方时，新闻媒体甚至教会中的许多左派人士断然否认共产党的迫害。这条路线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于是如今他们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一些组织极力淡化共产党的迫害，并将其淹没在有关自由世界不公正现象的混乱新闻中：韩国的独裁统治、拉丁美洲的军政府和南非的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威胁被世界各地存在的大量不公正监禁所掩盖。共产国家事件研究机构成立，教会通过支持研究项目来安抚自己的良心。英国圣公会、德国和挪威的信义会、美国圣公会和信义会（密苏里州主教会议）都达成有利于受压迫基督徒的决议。

但仅靠研究——尽管很有价值——并不能帮助受害者。犹太人不进行研究：他们为受难的同胞而战，并支持他们。我们了解俄罗斯有多少囚犯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食物，无论他们是300人还是30,000人。当一位犹太人德莱弗

（Dreyfuss）不公正的被关押后，全球的知识分子都群起抗议。他们也不等待观看是否有第二位受害者，也不理会是否正确拼写了他的名字。

殉道者的子女们不能吃对他们有利的决议。他们需要面包。

共产党的暴行是无法比拟的

世界各地都有欺压。但有没有可以比拟古拉格群岛的状况？哪一个非共产政权用可怕的酷刑杀了数千万人民。南非有杀害一百万黑人吗？在韩国，葛培理向一百万人自由传教——这是史上最大的基督教集会。

不公正和虐待无处不在，这是事实。但共产主义却是本质便是邪恶。这是出乎撒旦的。我在我的书《马克思是撒旦教徒吗？》里已经证实这位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与撒旦教派的直接联系。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依然流传着教会借着宗教仪式杀人的国家。

在《儿童与宗教》一书中，共产党人重提基督徒教导谋杀的古老谎言。他们说，基督徒为了赎罪，就杀自己的孩子。罗马人在十九世纪前曾这样诬告，现在共产党也向孩子们这样宣传，吓唬他们不要成为基督徒。

1969 年著名的欧德沙城（Odessa）浸信会审判，指控浸信会员割断一个孩子的静脉并喝他的血

。自从罗马皇尼禄之后，未曾有人对基督徒编造这种疯狂的谎言。

在《五旬节派是什么？》（莫斯科，安娜妮出版社）一书说，在利特基村 Litkino 有一位名叫斯米尔 Smirnova 的基督教妇女杀了自己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并打残了另一个，作为对上帝的祭品；一位名叫拉兹 Lazko 的基督徒被指控用斧头杀死了他七岁的女儿以荣耀上帝。

戴维琴科 (David-chenko) 的著作《What Believers are Taught》(Bielorus 出版社) 中提出了另一项仪式谋杀指控。据称，一位名叫穆德 Mudrii 的浸信会员按照浸信会的教导，杀了自己的兄弟。

在《我们不能忘记 We Must Not Forget about》一书中，作者多尔吉与库兰 Dolgich & Kurantov 说：“卡拉干 Karaganda 教会的妇女安娜 (Anna Nevelinaia) 将她六岁的儿子作为祭品献给上帝。她带孩子一起在火车前跳轨自杀。”这故事背后的真相可能是法庭决定夺去安娜的儿子，因为她教导孩子有关于基督。她担心共产党会使孩子离弃神，所以出此下策。没有人能论断她。

该书还报道说，在涅夫特村，克里牧师决定“向上帝献上一只无瑕疵的羔羊，于是就把女会友奥西

的三岁儿子杀了”。没有人试图阻止这一可怕的罪行，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圣灵的旨意。随后，孩子于夜间被埋葬在黑暗的森林中。他年轻的母亲因悲伤而去世。他的父亲早已过世，原因是长期禁食。

这本书解释说，克里牧师正在遵行基督的命令，就是一个人必需放弃自己的家人，才能成为基督的门徒。

莫斯科报纸 Znamia Tunosti 指责浸信会教徒藉着洗礼，杀了女孩瓦尼亚 (Vania Voinelovich)。共产党人说，那位女孩因为洗礼导致肺炎，后来就因肺炎而死。故此她的牧师犯了谋杀。

这些只是一些从铁幕中泄露出来的些少消息。我们俄罗斯弟兄们面对多少这种疯狂的指控！

红色中国的暴行

香港《远方报》报道一名从上海归来的商人，亲眼目睹一名中国罗马天主教徒遭受致命的酷刑。他说：“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郊区的一所学校，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个由二十名高中生组成的法庭。他被指控并被判犯有玩忽职守、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又执迷宗教。。。受害者戴着十字架。”这位商人说，青少年们想把这位中国信徒钉在十字架上

。红卫兵向他扔鸡蛋、石头，然后用热火棍折磨他。路人听到了他的尖叫声。

又一名中国基督徒被发现藏有一本圣经

在枕头里。为此，他被脱光衣服，涂上蜂蜜，并被迫在烈日下站了好几个小时。

挪威的《Vari Land》报指出，在汕头，一名牧师戴着一顶高帽，写着可恶的评语，被拖过街道。在红色中国，神职人员如果拒绝在信徒面前宣读毛语录，就可能被处决。

中国教会的苦难超乎想象。天主教徒宣布他们的成员有超过一百万人被杀害《中国教会安魂曲》，达里亚 Dauriac。我们没有新教徒的数字，但也肯定相当于此。

前驻华传教士里斯博士 (Dr Rees) 在考察归来后写信给我们：“我所有的中国朋友们都被杀害或监禁。一人被弄瞎了，一个被扔进井里，两个人死于肺结核，另一个人被洗脑后失去了理智，签署了一份放弃宗教信仰的书。当他的理智恢复时，他撕毁了叛教书。但中国基督教会却在不断壮大。它被称为《闭口无言的教会》。没有人互相交谈，但邻居们却通过圣灵的运作而悔改。我所有主内弟兄（倪柝声教派）都被各种手段处死，共有数千人。

一位名叫库曼 (Kuman Chandah) 的印度医生在红色中国的一所监狱中被砍断双腿，挖出眼睛。

一位俄罗斯人瓦尔基米 (Valdimir Tatishtshev) 在上海被捕。中国酷刑者用螺丝栓将铁管绑在他的腿上，用锤子敲打，直到他的骨头被打断，迫使他认罪。当他依然拒绝，共产警察就来到他家。一名警官抱起他的孩子，对他太太说：“如果你不签署针对你丈夫的指控，我们就会敲碎你孩子的头。”这位母亲惊呆了，难以置信，就拒绝了。该名女警官就将婴儿的头撞到墙上。母亲就用刀捅这警官，其他共产党员则开枪射杀这母亲。

1970年4月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在这十年间，中国有超二千五百万人被杀。另外还有百万计的不满者被扔进巨大的集中营。”

1969年5月7日，莫斯科报纸《红星报 Krasnaia Zvezda》写道：“中国共产党……用沸水和硫酸烧灼人们的眼睛，用小刀砍下人们的四肢，用石头和古代的大关刀劈开人的头。”我们许多中国弟兄如今正在盲目的摸索，或者因为四肢被砍了，就趴在地上，像毛虫一样蠕动。希伯来书 13:3 中吩咐我们纪念受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希望共产政权会变得更人性，是一种幻想。最近党方给的一些“自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开发少数的教堂，给与共产妥协的牧师神父。但神的地下教会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最好对中国紧张的传教工作保持沉默。

我这书的目的是写及我成立的这宣道会、并有关我自己，和我在自由世界的岁月。但这个“我”到底在哪里？人们该记得，心理学还不能肯定“人格”一词的明确意义。一个人如果脱离了他生命所属的事物，它还是什么？难道一个人格就不能如此扩展，以至包含中国所有的苦难，甚至更多？

这书本来想写及我自己，但我却写了中国和整个共产阵营。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矛盾。

如果我看起来有偏差，便让我描述中国基督徒对这些暴行的反应，成全这个吧。

那些怕暴君和暴政，怕自身被杀的人，是愚笨人。我们该怕的，是那能把我们身体和灵魂都抛进地狱的神。有士兵用剑针对一个基督徒的胸口，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回答说，“是的。”可是一名军官却说，“放了他，他是个白痴！”后来有人问这基督徒：“你怎么有这样的勇气承认基

督？”他回答：“我读了彼得否认基督的故事，我不想像彼得那样懊悔痛哭。”

关于我们中国同胞的殉道，有人看到一名女基督徒在共产劳改营中被乱石砸死。那女孩的手脚被绑起来，跪在一群人的中央。党方命令众人用石头砸死她。拒绝的人就被枪杀。她去世时，她的脸就如像圣司提反一样发光。至少有一位在场的人因此相信了耶稣。另一名年轻人在死前被挂在十字架上六天，并为迫害他的人祈祷。又有五名学生被命令挖坑，然后他们自己被扔进去活埋。他们临终还唱基督徒的赞美诗。

解决办法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同意我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他们同情受苦的人。但他们问：“解决办法是什么？”

人类最大的伤害，是由那些自信有解方的人造成的。马克思、希特勒和斯大林都相信他们拥有一切问题的解方。就是这些人把世界卷入大战，革命和独立斗争中。这些争斗只导致更多的奴役。我相信神把未来隐藏了。人不该以为自己能预视。除了些少神赐人对未来的快速一瞥之外，人类都沿着一条未知的道路前进。

我知道许多人不会同意，但我只能推荐耶稣的药方：就是爱每个人，包括爱共产党，并努力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据说有一次，太阳与风作了一次较量。当时有一位穿着大衣的旅行者正在长途步行。谁才能使这人脱掉外套呢？风先尝试。它猛刮这旅行者，企图把那人的外衣刮走。可是那人却把自己越发裹得密实。然后轮到太阳。它不用任何暴力，只温和地照耀，温暖再温暖。那行人走热了，就把大衣脱下。温暖的爱能够成功，反共的猛烈攻击却难以奏效。

我们的第一武器是爱。我们不仅扶助受害的人，也向迫害他们的共产党显出关怀。

我们的第二种武器是自我牺牲。

“获得神的爱的方法有数百种，但只有一种是肯定有效的。”一位传道人说。“那是什么？”他的同事问。“啊哈，”那传道回答：“我就猜你不晓得！”

获得上帝之爱的道途，最是简单：遵守祂的诫命。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必爱他”（约翰福音 14:21）。祂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必遵守诫命”（太 19:17）。每天早上唱一首赞

美诗，读一段圣经，祈祷，安静的聆听神给你当天的话，然后就履行祂的命令。

祂的许多诫命可以归结为一条：效法祂，即使这可能涉及痛苦，甚至死亡。

耶稣为父的荣耀而死，并命令祂的所有门徒向罪死了（罗马书 6:2），也在必要准备为道舍命。如果你准备好为道而死，你的信仰便是真的。如果你不准备为它舍命，你的信仰只是一种信念，并不是你的宗教。基督徒生活可能导致痛苦的损失。如果这对你是太大了，就不要称自己是基督徒。耶稣乐意在三十四岁时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该把自己奉献给神与人。凡守祂诫命的，就是祂所爱的。

教会要求基督徒英勇。耶稣的名字之一是“英雄之神”（赛 9:6，按照原文）。

从事铁幕后工作的宣道会中，唯有我们这机构有成员殉难的。我们的乌干达主任基瓦弟兄被杀；王秀美弟兄在试图私运圣经到中国时被殴打致死。我们的同事 Jon Clipa 和 Sabin Teodasiu 在罗马尼亚被杀。

殉道者的鲜血依然有效。它给铁幕后的教会提供养分，也给自自由世界的支持者提供属灵的粮食。

自由世界的捐助人给我们不流血的支持，对地下教会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徒囚犯的亲友，每年可以探监两次。但从明斯克到西伯利亚的路途漫长，费用高昂。政府不给囚犯家属工作的岗位，于是没钱。共产党希望信徒们放弃信仰，即使不是因为自爱，也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庭。您的金钱支援可以坚固那里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遵守主的命令，继续战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祂可以信赖使徒约翰会照顾祂的母亲。当共产监狱里的基督徒知道你不会抛弃他们的家人时，他们就能安静受苦和死去。

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世界给她自己百姓的成功之印记，是众人的瞩目与喝彩。但这些都对神的儿女却没有多大价值。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是共产党领导人贝林格 Berlinguer，他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为了废除宗教和道德，不惜使用血腥的暴力的人（参阅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贝林格目前伪装成社会民主党 social-democrat。列宁在上台之前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在他当选后，就开始屠杀数百万无辜。

在人类走过的漫漫长夜里，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大受欢迎。还有很多假冒的宗教领袖，他们鄙视基督的教会，利用人们的情绪、感官的刺激，吸引信徒。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会感到兴奋；但只有喜悦真理，才是真有价值的。

我们的宣道会已经成立了十五年。我们从宣传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事件开始。但是在不受欢迎的时候依然坚持真理，便是上帝的印记。

我们知道，总的来说，人们不会太过关心远方为基督殉道的人。有谁会关顾共产治下十亿被迫远离基督的灵魂？谁会因为这些灵魂的永远丧失而哭泣？世界另一端的悲剧常与我们无关。

我们的工作，就是向冷漠世界传达这信息：必须给共产国家传福音。我们并不幻想马上就成功。

每周约有一百万人在未听闻基督之前就过世。世界人口每年增长 4700 万人。在这情况下，普世教会的传教努力却日益减少，尽管我们都知道主的命令：“到普天下去，教导万民”（太 28:19）。

爱就如光，总是飞速发射；我们必须立时使用它，绝不能收藏。不全速前进的光，就不是光。不全力救人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一种自私的信

仰，保证我一己能上天堂，却不能激励我为他人着想的宗教，有何意义？

我们告诉世界，福音必须在共产国传播，我们立即就行。我们也提及被共产迫害的圣徒，也帮助囚犯的家属。我们对自己的成果也感到惊讶。

从一开始，我们就警告说，共产主义将扩展到新的国家。它就是启示录的“红龙”（12章三节），正准备吞噬教会。它若不吞下世界，就不会满足。果然不过十多年，共产党就占领了越南、柬埔寨、老挝、南也门、埃塞俄比亚、贝宁、刚果-布拉柴维尔、莫桑比克、安哥拉、阿富汗等。

我们观察并记录了共党的每一场胜利。也同时看到共党正在利用一些次要的事件，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当苏共占领了非洲一些国家时，苏共就同时报道苏联本土的异议人士 Sakharov 被逮捕的细节，叫人不会留意到他们正在非洲屠杀数十万人。在美国，当共党占领东南亚时，他们就操纵舆论，叫公众注意水门丑闻。意大利和法国的共党也正在抬头。

马列派的间谍也渗透自由世界，准备进行军事攻击。比利时将军格洛泽宣称苏军有能力在四十八小

时内占领西德。谁能阻碍它抵达大西洋？法国境内已经有多数人投票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线。

社会民主党，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她不提暴力，但她最终的目标与马克思所宣称的一致：废除一切宗教和道德。在 1953 年，西欧所有内阁成员中有 33% 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达到了 70%（1970 年）。

在我们的宣道会出现之前，反共分子说：“唯一的好的共产党，就是死去的共产党。”我们却说，“每个归向基督的共产党，都成为圣徒。”

我们的使命反对亲共派，也反对反共派。从逻辑上看，这样的宣道会肯定失败，但她却迅速发展。这是上帝的奇迹。

当你考虑到有多少热心的基督徒反对我们时，这个奇迹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热心基督徒的观点是，由于运送圣经进入共产国，免不了撒谎，所以最妥当的做法，就是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不必听闻福音。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我们的回应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天使，这天使给的命令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哥林多前书 9:22。）“无论如何”意即藉着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渠道。

在上个世纪初，一位名叫巴里（Barry）的异常聪明的女孩得到一种呼召，要成为一名医生。由于当时的大学不接受女生，于是她扮成男生。十岁时，她就通过了考试。十四岁时就成为了一名军医，后来晋升到高级军衔，没有人怀疑她的性别。她将一生奉献给罪犯、乞丐、疯子和麻风病人，以及南非和牙买加的军队。直到她死后，人们才发现她是女性（June Rose, *The Perfect Gentleman*, Hutchinson, 1977）。如果有人因为她假装男人而罪责她，那么谁该受罚？是敬业的医生，还是那些制定不良法律的人？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我们的同工为了运送圣经，就伪装成游客、外交官、运动员、记者等。如果这也算是罪孽，那么共党便需要负起责任。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一对婚姻的伴侣或好朋友即使在心情低落时，也会为了对方的好处，刻意表现得快乐。他们在心情低落，感到伤心时，也会露出微笑；在心中愤怒时，也会约束自己，表现出温柔。因为知道当时的愤怒不宜发泄。原来地上果然有圣洁的诚实；但也有圣洁的不诚实！

我们传福音时，也知道我们会被误解。例如，很难告诉黑人说：最糟糕的白人统治，也比红龙带来

的“独立”更好。因为共党是更加残暴的政权。他们不许灵魂得救。红军伪装成自由战士，未曾尝试过他们鞭子的，就会上当。

我们也不容易让新教徒明白，我们必须捍卫和援助被监禁的天主教徒。反之亦然。

这便是上神印记，就是无论人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都继续神命定的工。在这十五周年，我们感谢一切同事、各国主任、同工、祈祷伙伴，捐助者、所有捍卫我们的，以及所有攻击我们，杀害我们的人。后者使我们可以重新检讨我们的漏洞。

这担子不容易承受。我们也有忧郁的时刻（当我们的同工失手被抓，开始漫长的折磨时，我们就忧愁），但当我们收到一封来自苏联的信时，就马上得到了安慰：“这里的几位东正教会的神父几乎赤身裸体。在礼拜时没有适当的衣服可以穿。他们的工作是瓦匠。他们急需衣服，以便在警察追踪时可以更换。这些牧师负责管理从中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秘密教会。我们已经分发了 50,000 卢布。”

这便是我们宣道会的目的之一。然而，如果没有人捐助，这工就不可能。一位朋友写道：“我已将你纳入我的遗嘱中。”路德教会的弟兄们写道：“我们会尽力寄给你一英里便士，即 750 英镑。我们已经筹集了 170 英镑的便士。”另一个路德

教会团体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幸邀请您在我们的教堂讲道时，我们从未受到福音的真义震撼。这里是 250 英镑。我们会持续这种支持。”

有一封信写道：“我八岁了。我得到了喂驴的钱，并寄给你一部分，40 便士。”（英国）

“我们门诺派（Mennonites）和归正会（Reformed）举行了一场自由盛宴。我们纪念那些受迫害的人，并为他们安排了援助。”（法国）

“读完魏恩波的《为主受苦》后，我想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你。今天，我关闭了我的银行账户，并将余额寄给了您，对我受苦受难的弟兄们充满了爱。”

我们在周年纪念中，看到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有许多任务，其中包括对许多神职人员。

向神职人员的呼吁

我有机会参加许多基督教大会。当一些牧师听说我来自罗马尼亚时，就祝贺我说，‘你们的运动员纳迪亚（Nadia Comanici）真的了不得！罗马尼亚拥有世界第一流的选手。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她——才

十五岁！”我便问他们是否也晓得罗马尼亚殉道者的名字？没有一人。

让我便提几位：独一派的 Suciu 主教、Frentziu 主教、Rusu 主教、Hossu 主教、Aftenie 主教（因酷刑而精神失常），Macavei 神父、Pop 神父、Moldovan 神父、Stanescu 神父等。

托马斯 Thomas Aquinos 教导说，当上帝的荣誉到威胁时，愤怒便是一种神圣的反应。我们对一些牧师们对殉道者的冷漠感到愤怒。我们相信所有神职人员应该少看电视体育节目，多些阅读殉道者的消息。这将改变他们的布道和生活。

牧师该告诉自由世界的基督徒，苏联依靠自由世界的贷款、技术援助和小麦建立了独裁政权。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乌克兰）的会议中，把东欧诸国交给了共产党。在东南亚，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帮助越南争取自由。最终美国也放弃了越南，任由共产党宰杀。

1976 年 2 月 3 日，基辛格演讲警告：“苏联以军事装备、顾问以及运送一万一千名古巴军队到非洲，进行史无前例的干预，这是一种急需关注的事。。如果纵容，我们就将面临更艰难的选择和更高的代价。”无人理会他的警告。相反的，美

国参议院更中止援助安哥拉人为争取脱离共党魔手的争斗。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逃避自己的任务，让半个世界的老百姓血流成河。主啊，怜悯我们！

我们必需协助受共党迫害的基督徒，弥补我们与我们父母一代的过失。

第七章

未来的路

缓和的替代方案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5）。基督降卑自己，成为襁褓的婴儿，躺在马槽里。祂完全与我们相反。我们只会企图抬高自己，增加一己的财富，好呈现自己的威风。基督却乐意成为众人的奴仆。

在受难日，基督更进一步，把自己变成了一具受摧残的尸体。祂为我们的罪作出赔偿。也教我们如何向世界死去。抵制罪恶比屈服于诱惑更好，但完全无反应是最佳选择。尸体对任何事物，都不会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耶稣于周五去世，周日早上复活。虽然坟墓黑暗，祂却知道在神没有黑暗。那些爱神的人也不能留在黑暗中；于是祂走出坟墓。

那些相信基督并追随祂的人，也必复活与祂同在。

无神论就是黑暗。这是一个人缺少神的光。无论是一位无神论者，或是一位“拥有敬虔外貌”却没有内里的神的能力，都是一样黑暗。让我们走出这种坟墓，就如主耶稣走出黑暗一般。

共产国家强加无神思想给民众。即使在自由世界，共产党人也努力传播他们的不信。例如，法国就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无神联盟。他们写道：“我们反对一切宗教，但首先我们要剑指基督教。宗教信徒都是精神病者。带领他们的，就是那些中毒更深的人。”因此，根据他们的说法，信奉基督教就是一种精神病。

列宁认为，“有关不占空间也不占时间的存在物（神与灵魂），都是神职人员发明的（可参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Materialism and Empiro-criticism）。难怪共产政府常将基督徒送进精神病院。

在莫斯科，一些年轻的东正教徒组织了一个秘密神学院。当局马上逮捕该组织的负责人亚历山大（Alexander Arghentov，）把他关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医生诊断他的疾病为“宗教信仰”，

于是给他开了一种强效药物阿米嗪 aminazine。现在他在监狱。

如果共党都把基督徒当作是疯子，也无妨，惟愿他们的国家充满这种疯子。

列宁格勒出版的《舆论与无神论宣传》一书，提到 3300 万苏联公民宣称自己是宗教信徒。肯定还有更多人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或自由而隐藏自己的信仰。仅在列宁格勒，就有 41% 的受访者承认在家中举行宗教仪式。这些接受调查的灵魂很天真。聪明人不会回答苏联的民意调查。

在苏联管辖的亚美尼亚，70% 的儿童接受了洗礼。在铁幕后，凡是为自己婴儿进行洗礼的，都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是深刻信仰的表达。

我们宣道活动没有白费。我们向共产国家提供圣经、基督教书籍和宗教广播，结果他们的无神宣传大受冷落。但我们是一个宗教组织，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传播神的话，凭爱心救人。然而神也同时授命各国政府用剑来惩罚恶人。如果一个杀害一二人的凶手，也必需受到严厉的对付，那么屠杀千万人的共产集团，该如何处理？

因此，民主政权不可能与共匪谈和。

谢尔盖 (Serghei Uralov) 是枪杀俄罗斯皇帝及其家人的共产刺客之一。他讲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 (Szar Nicholas II)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对他的要求。沙皇说，‘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列宁，提醒他说，在 1912 年，当列宁的母亲要求我减轻他的妹妹的刑罚时，我就下令释放她，让她得以逃出国。当时她因为传播共产读物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现在，我请求列宁帮个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生病的儿子，让他可以到南方去，让亲戚照料。’ 谢尔盖答应转发请愿书，但当晚却枪杀了沙皇全家。皇后抱着太子，在受伤后仍然向神祈祷。她用自己的身体覆盖儿子。公主们试图用枕头抵抗子弹。沙皇静静地、沉默地接受死亡。

对共产党仁慈，只会得到子弹回报。一位天主教主教因为庇护一些游击队，就被当时的民主政权关进罗德西亚监狱。在共产得胜后，他们给这主教的回报，就是杀死十名天主教传教士。

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可以引导共党，甚至是共党领袖归主。我也相信黑帮匪徒的转变，但我不建议任何政府将解决罪犯的方案完全交给牧师。警方的行动也是必要的。单靠传教无法将世界从共产手中救出来。我们还需要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措施。共产党人已经成为心理战与

传媒战专家，为了打击他们，我们也必须了解心理战术。

基辛格说除了与共党协和，别无选择。和谈的崩溃将意味着核战争。这是一种大错。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没有发动核战争。但他们也没有谈和（虽然表面谈和，其实完全没有真意）。他们已经渗透到自由世界的高位。他们比光明之子更聪明。让我们也用福音渗透共产阵营。

我们在铁幕后面，引领归主的每个人，都自动成为反苏派，亲西方的人士。因为他知道，西方人可以自由崇拜，他们本国却压迫宗教信仰。

我们将自己限制在我们自己的使命上：传播福音。国家的统治者也有他们的责任。

以难民的名义发言

我常有特权。我能为受迫害的人发声，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在这书，我代表数以百万计受奴役的人发言，但我也必须为处身在自由世界的难民发言。

越南政治家阮功焕（Nguyen Cong Hoan）和另两名支持和平的反对派人士（反对当时的南越阮文绍

政府，) 乘渔船逃离越南，并在日本找到了临时庇护所。

当功焕先生和他的同事抵达几周后，他们邀请新闻界参加他们的新闻发布会。警方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警告他们，这违背了日本政府对他们的期望。警方甚至警告说，这样的会议可能会激怒河内政府，以致会要求遣送他们回国。日本当局就很难拒绝这样的要求。

这些越南难民抛下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希望能传达本国的迫切需要。但到了日本，却被当局流放到一个小镇，不能发言。只有等待美国或法国大使馆向他们发放移居签证。“我很失望，” 邢先生说，“我以为长期对我国提供援助的美国人应该更能聆听我。”

令邢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难过的，不是物质的困难或对自己生活的担忧。他们逃离祖国，希望向世界本国的真情，却没有门路，而且自由世界反应也冷淡。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日本）时，我去拜望一些其他刚到的难民。” 邢先生说。“其中一个是一位非常老的女士。当我问她为什么来时，她跪下来哭着说：“我祈求你，做点什么，与政府交谈，求他们帮助我们，求他们帮助越南。”

我也是。我希望外国的人能听到我的人民的声音。但人们却无动于衷，不仅是日本人，就连从越南逃出来的越人，在这里待一些时间后，就忘了本国。

当我离开祖国时，我以为外面的世界会反应热烈。如今大失所望。但我不能让自己灰心，虽然似乎手脚被束缚，做不了，也说不了什么。

祁先生只是共产国的数百万难民之一。

学习主的母亲玛丽亚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助共产国家的殉道教会。更好的是，我们可以领受殉道弟兄给的基督榜样。

在红色中国，一名牧师和两名基督徒女孩被判处死刑。正如教会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迫害者作弄他们。他们应许那位牧师说，只要他开枪射杀这两位少女，他们就会把他放了。他接受了。

当宣布执行死刑时，这两位少女在监狱院子里等候。一名狱友在牢房里目睹了这一幕，形容她们脸色苍白，但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无限悲伤却又甜蜜。她们很害怕，但准备好接受死亡，不放弃信仰。然后，刽子手在卫兵的簇拥下走了过来，手里拿

着一把左轮手枪。她们看见这位持枪的侏子手正是她们的牧师。

这两个少女彼此低声私语，然后向牧师深深鞠了一躬。其中一位说：

“在你射杀我们之前，我们衷心感谢你给我们的帮助。您为我们施洗，又教导我们永生之道，您又给我们圣餐。愿上帝报答您对我们的一切善行。您还教导我们，基督徒有时会犯下可怕的罪，但他们是可以被宽恕的。当你后悔自己的行为时，不要像犹大一样绝望，而要像彼得一样悔改。上帝保佑你，请记住，我们没有愤慨。每个人都会有时跌倒。我们满心感谢的死去。”

她们再次鞠躬，知道主耶稣特意安排，让她们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死在自己牧者的手中。

那牧师硬了心，射杀这对少女。过后他自己也被共产党枪杀了。

这两个女孩的名字叫邱清秀和何秀珠。我们不透露牧师的名字。这件事发生在江西。

人与人之间总会发生冲突，虽然不一定像上述所说的那么令人惊讶。让我们向这两名殉难的少女学

习如何面对朋友的背叛，或我们所信任之人的不忠。

在共产中国，共产党残酷地折磨一名少女，试图迫使她吐露地下教会的秘密。过后她同伴们问她如何承受那些痛苦时，她回答说：“这并不难。我的牧师告诉我说，真正折磨的时间，其实不长。每受一分钟的酷刑，就有十分钟的时间看着愤怒的面孔。于是我闭着眼睛（何必看魔鬼的使者？无什好看。）于是在棍子击中我之前，我什么也不看，所以痛苦就减少许多了。我也信基督的应许：“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我早已经从心中清除对人的恐惧（这种恐惧原来是一大污秽），于是就看见神。过去很多人就是这样看见神。当共产党发现我的妙法之后，他们用胶带把我的眼皮拉开，但为时已晚。我已经看见了神。

我们可以向这位基督徒学习，不必过度担心苦难，只要闭起眼睛。死人不会害怕。我们向世界已经死了。如今我们只向神是活的。

一本由真正的苏联东正教会秘密编撰的书《让他们与圣徒和平相处》已经抵达西方。这里是它的部分内容：

第一位被共产党杀害的东正教神父是特楚罗夫（John Kotchurov）。在叶森城（Essentuki），里

亚神父（John Riabuhin）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砍下四肢，并在还有气息时就被埋葬。克拉神父（John Krasnov）被活活烧死。科纽神父（Nikolai Koniuhov）却被冻死。波多神父（Alexander Podolskii）被打死，后来共党也枪杀试图埋葬他的人。执事吉洪（Tikhon）为自己唱了葬礼文，红军强逼他十岁的儿子挖坑埋葬父亲。德米神父

（Grigorii Dmitrevskii）首先被割掉了鼻子和耳朵，然后割头。尼科神父（Grigorii Nikolski）在做完礼拜仪式后，共党向他的嘴巴里开枪，告诉他说：“现在我们就给你圣餐。”

苏联对基督教的镇压已经持续了六十年。但真东正教会仍然秘密进行聚会，敬拜神。我曾见他们的大主教；这有点像遇见基督。当那位大主教开始晚间礼拜，呼喊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时，全会众就哭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这句话的深度。我发现自己就如一个远离神的浪子。我只晓得神的名字。但这位大主教却拥有神名的真意，他第一句崇拜仪式，就完成了改变人心的工，无需我的长篇讲道。

让我们从这些基督徒学到如何面对生活难题，无视敌人的威胁，只忠诚跟从主。

我们日本、印度、瑞士、丹麦和巴西的主任们都受到共产恐怖分子的威胁。我和儿子一直冒着生命的危险。基督徒生活和工作，并不容易。主说：‘人子必须受苦，’我们都是人子。

在苏联的立陶宛(Lithuania,)一名基督徒女学生西莱(Leonas Sileikis)被带到由七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接受审查。当老师们问她对无神论书籍的看法时，她回答说：“它们包含谎言和诽谤。”一名共产党员就向她解释宗教的可恶之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信仰。她的回答是：“我信神，不会放弃。”学校校长向她父亲解释了宗教的危险。但这父亲说：“宗教并不危险。践踏宗教的后果就是学生不再尊重老师；他们喝酒、抽烟、嫖娼。”一位老师争辩道：“现在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跟从多数才是明智。”那父亲反驳道：“只有尸体才会顺流而下。活人则逆流而上。”主任警告他，“你这种态度，可能害你的女儿无法完成学校的教育。”这父亲回答说：“使她不能升学的不是我，而是你们。如果必须放弃道德的原则，上学还有什么好处？”我们还不知道这次审查后，西莱一家怎样了。但我知道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如今都在坐牢。

西莱和她的父亲履行神的命令：“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 12:1）。

各人的恩赐不同

我并不是叫每个人都成为殉道者。耶稣的话是：“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太 19:11）

主耶稣这话，大大安慰了我的心。叫我不再受良心责备。这话也能释放你。

显然，圣经中的诫命，并不是给每个人的。人们无需实现所有的命令。我们也不必因为无法实现这些命令感到难过。有些诫命只给犹太祭司，有些只给丈夫或妻子，还有一些则给孩子们。给主人的诫命和给仆人的诫命不同。许多经文是专门给征服迦南的一代人。有些仅适用于农民。上帝并不期望每个人都作同样的事。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呼召和自己的恩赐事奉上帝，不必因为做不到某些事而折磨自己的良心。

在马太十九章九节，主耶稣禁止离婚。他说人最好和伴侣在一起到命终，即使伴侣多次背叛你，把

你的生活变成地狱。这种持续的苦难可以帮助你培养像基督一样的品格。然而主马上补充说，这话不是每个人能领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极端的虐待。

在红色中国，当基督徒正在聚会时，警察闯入，公布他们要逮捕的一名基督徒。为了保护这位弟兄，信徒们说他们中间没有那人。但那位弟兄却站出来说，“我就是那人。”他不能承受谎言，即使众人是为爱他的缘故。他就因此丧命。

这种绝对坦诚是值得钦佩的。但我们只能钦佩，不能模仿。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对真理有同样的热爱。热爱真理是神给某些人的特别礼物。

不使用诡计，就不可能将《圣经》偷运到共产国，也不能在共产国从事地下教会的工作。谁能在不瞒骗当局的情况下进行地下工作？我们不会责备任何无法接受我们使命的人。他们没有得到这种理解。也许他们领受的使命不同。

一位带着几个孩子的贫穷的亚洲基督徒读了我的书《为主受苦》，就立即卖掉了他所有的一切，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并用它来开始我们宣道会的一个支会。他现在正在领导着红色中国一个重要的圣经走私项目。耶稣对一位富有的长官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句话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

然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榜样中得到鼓励，并快乐地奉献我们所能奉献的一切。神知道祂把我们造的与他人不同。祂并不期望人人都有同样的恩赐。

在黎巴嫩，基督徒与受共产党训练和武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作战。在马伊达 Majdalona，游击队将汽油倒在一名基督徒军官家里，点燃导火索，引向爆炸物，然后逃跑，他们相信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几秒钟之内，军官的姐妹们就会被杀，但奇迹般的是，点燃导火线却熄灭了。有天使阻挠。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在无数其他的案例，基督徒都手中拿着武器，试图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死。古代圣徒“打退外邦全军”（希伯来书 11:34）的榜样并不是给每个人的。

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照顾全教会（哥林多后书 11:28）。能看见世界是一份与众不同的礼物。面对已经有基督徒被折磨致死的国家，和其他即将被斩杀的国家，那种悲痛将会破碎大多数人的心，叫人发疯。自由世界的教会对此不闻不问，更令人痛心。

我们知道，背信弃义是每个未重生灵魂的主要特征。如今的自由世界，正是如此。

正如许多犹太人被所谓的基督徒残害后，就不要再听耶稣。柬埔寨人和其他被欧美抛弃的民族，也会心中铭刻：“基督徒虽然强大，但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抛弃了我们。他们让屠夫成为我们的国家领袖。基督徒不可信赖。”

我们并不期望所有的基督徒都分担我们的担子，但请为上帝托付我们的事工祈祷。

你会对耶稣说“离开我吗？”

格拉尼人祈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马可福音 5:17）。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耶稣命令一群污鬼进入一群猪，猪群就都投海淹死。格拉尼人因此失去了经济来源，并孩子的生计。如果耶稣进入你的生活意味着你失去房子、汽车、银行账户或工作，你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你依然会继续使用神圣的术语，但不再真心。格拉尼人的祷告至少是真诚的：“耶稣，离开我们吧。”

耶稣已经习惯了被赶出去。在霍尔曼 Holman Hunt 的著名画作《世界之光》中，主耶稣在一座屋子前敲门。可是祂的脚不是向着门，而是转向外边。祂已经习惯被人拒绝。因为接受祂的代价太高了。

使徒保罗写道：“我为我主基督耶稣，已经丢弃万有，视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 3:8）。我们是否也把我们漂亮的家具、新车、好职业、银行存款视为可厌的粪便？而且希望摆脱这些——越快越好？凡想赢得基督的，就须丢弃这一切。与耶稣的友谊须出代价。唯有信心能拯救，但空谈不是信心，行动才是。

上帝的最先启示是用希伯来文，这种语言没有动词“拥有”一字。不能用希伯来语说，“我有一所房子”，或“我有一辆车。”因为希伯来语没有“拥有”一词。希伯来人甚至没有‘拥有’的概念。所有财产的唯一拥有者是上帝，你可以拥有祂。至于其他事物，你只能是它们的管家。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祈求天父赐给他们每日的饮食。看起来，他们在冰箱已经有备用的食物，无需向神祈求。但这食物依然是神的，祂可以命令你今天不要吃，而是禁食。

那些对你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必有钱有健康有快乐的牧师，只是误导师。因为事实是，你信了耶稣，就可能失去“一群猪”，就是你的全副身家。主说：“凡不舍弃一切所有的，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 14:33）。所以多数人心中的祷告，与口上的不同。口上赞美神，心中却在低语：‘耶稣阿，离开我吧！’幸好不是人人都如此。

共产党在黎巴嫩培植巴勒斯坦人反犹，又提供武器，杀害基督徒。但上帝真孩子不会死于子弹。他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已经死了。他们如今活着，不再是他们自己活着。他们如今是耶稣。

一名二十二岁的黎巴嫩基督徒学生，在平静地前往纳卜哈与家人共度圣诞节时，途中被枪杀。他的尸体上发现一封自己早先写好的信：

‘如果我的预感是真的，我会死在这条路上，我告诉我的母亲和家人：不要悲伤，不要哭得太悲伤。你们只是看不见我一忽儿，我们会在天堂再见面。那里充满欢乐。无需担心，神的怜悯将使我们重新团聚。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从心里宽恕那些杀我的人。请与我一起祈祷，尽管我的血是罪人的血，但愿它可以与无故被殺的各宗教信仰徒的血，一起代赎黎巴嫩脱离她的罪。愿我的死给人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为敌人祈祷。如果阿布 Abou-Khalil 可以给我一些木板，就可以作为我的棺木，我会在里面躺得很舒服。请不要为丧礼作任何花费。愿人都饶恕我。我是尘埃。我，一个罪人，在耶稣基督里，加西贝 Ghasibe Kayrouz。’

我是犹太人，我很喜欢拥有一位这样爱主的阿拉伯弟兄。当他接受耶稣后，就失去一切，甚至失去

了在地上多活一天的希望。他丝毫没有困难宽恕他的凶手。这就如呼吸一样容易。

没有人能够描述共产主义的所有罪行。索尔仁 Solzhenitsyn 描述了一些，但不是全部。爱德华 (Edward Buca) 是前苏联集中营囚犯。他在《沃库塔 Vorkuta》一书中讲述了一名共产警察如何将一根大蜡烛插入一名妇女的阴道，然后点燃。他对她说，‘你有一点时间可以考虑。很快火焰就会到达你的身体。当你准备好在认罪书上签字时，便眨眼三下。’火焰烧到她的身上，警官平静地看着。他一度取下蜡烛，用它点燃一根香烟，然后又把它放回去。

试图逃跑的囚犯遭到野蛮殴打，然后被绑在飞跑的驯鹿后面拖死。党方又迫一名囚犯吹口琴，正当基督徒的尸体暴露在公众面前时。

苏联基督徒没有自己的生命可失去。就像古希伯来人一样，他们甚至没有“拥有”这概念。一位信徒从地狱般的苏联监狱中偷偷带出了一封信，是充满和平和崇拜，写信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周围的恐怖。

“你的作为奇妙”（诗 139:14）。亲爱的母亲和女儿，在你们生日之际，我用这些话向你们致以问候和祝贺。这是 1845 年，世界上第一封电报的

文本——圣经中的一节经文。电报的发明者是撒母耳·莫斯 Samuel Morse。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亲乔治·莫斯 George Morse 是一位著名的福音传教士。这段诗篇是在 3,000 年前写成的。以后的 2,500 年，这诗篇都是手抄的。直到 1455 年，印刷术发明后，第一本印成的书，就是《圣经》。

‘天主的作品在一切事物上，在自然和技术上，在所有人的生活，在人民和人类的命运上，特别是在他的教会上，都是真正奇妙的。思考他的双手和他的创造性思维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圣经》也是人类绕月飞行时阅读的第一本书……’

‘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因为我而感到非常困扰。亲爱的，不该是这样。你必须保持健康，不要让心灵受困扰。一切都按照祂的美意发生的！’

这样的基督徒看到神的旨意，晓得神的美意。

即使在被共产施暴时，不信的人或那些信心肤浅的人也会对耶稣说：“离开我们吧！你害我们丢失一切生计，我们的猪群！”

感恩受苦

我们对力量的观念，常有错误。我们以为《力量》就是粉碎他人、征服他人、镇压或惩罚他人的能力。但还有另一种力量，是“爱的力量。”这是内里的耐心和安静，乐意无辜地受苦，以善待恶。因为除了喧哗，推动宇宙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安静的潜力。就是神无限之爱。

一名共产党军官殴打一名基督徒，说：‘我是全能的，我可以宰了你。’基督徒回答说：‘真正的力量在我这边，因为当你把我折磨死了，我仍然可以爱你。’这就是上帝的全能——它反映在圣徒灵魂的深沉宁静中。他们不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悲伤？’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爱耶稣的十字架，也学会安然被人拒绝，不得人的安慰。一旦你晓得这种上头的心，就不再会困惑。有哪个孩子会因为收到一份极好的礼物而困扰？

圣洁的顶峰就是永远不为自己祈求任何东西，也永远不拒绝神荣耀你的十字架，并且谦卑地接受生活，心中也毫无疑问。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明白所有问题的答案。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就像神知道我们一样（哥林多前书 13:12）。圣人并不是拥有神巨量亮光的人，倒是一个空无一物，无足轻重的人。透过他，神的亮光就散布给众人，以致人人都可以爱邻舍，包括最糟的邻舍。谁知道今天的凶手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使徒？今天的放荡女会不会成为另一

位末大拉？全能的上帝不能在永恒中补偿我们暂时受到的伤害与误会吗？也包括我们对他人的伤害！

我们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对主说：‘生你的胎是有福的*。’（玛利亚因此蒙受苦难，她的心在耶稣受订时，就如被刀剑刺透。）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最乐意分担耶稣的苦难。

*（路加福音 11:27）

与其向神发出许多问题，不如欢迎这许多我们不了解的事。因为通过种种的折磨，我们更能荣耀基督。

苏联唯一忠实的浸信会联盟秘书长乔治·文斯（George Vins）不久前入狱。他的母亲写信给他：

‘后天就是你入狱的周年纪念日。这真是一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但要坚强，我的孩子。你做的很好，就如你父亲一样（乔治的父亲也因为见证基督，死在狱中。）愿主光照你，解除你心中的重担。愿上帝保守你。愿他保护你的灵魂免受邪恶的侵害，避免你在面对的悲伤中变得苦毒。我不断地祈祷主怜悯你。让我们把自己交给主，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祂手中。祂知道我们有多么疲惫，也知道我们在背负十字架时没有喘息的

机会。当祂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从重担中解放出来。受福的时刻临近了。主来了。在以前，你父亲也和我唱过这首歌。现在我们同唱，在永恒中我们就三人同唱。我拥抱你们。

母亲莉迪亚上’

浸信会牧师帕维尔 (Pavel Vasilievitch) 死于集中营。他的妻子被判十年徒刑，在他去世五年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以为丈夫还活着：

‘我知道我们死后会见面，那里没有悲伤，没有分离，幸福与平安在等着我们。我知道我们在地球上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主的亲自安排。祂又为我们预备一条艰难的道路，与祂给我们的内里力量相合。我感谢上帝让我们共度一生，感谢祂给的所有的苦难，并祂的爱和恩典。当你走在祂面前时，愿上帝祝福你。

苦难折磨着一些灵魂，迫使他们绝望，甚至自杀。但对另一些人，苦难却是良药。我曾见过忠实的基督徒囚犯在狱中欢呼雀跃。他们承认上帝是全能

的，并耐心地对待那些折磨他们的恶人。他们知道神的爱是不可抗拒的。它将会征服人心。

当你受到委屈时，也这样说话和行事。与天父同心，你就更能明白祂的道路，你的疑虑就消失。

尝试做一些实际的好事，而不是批评上帝没有做你认为最好的事。向殉道者学习。

我们收到了浸信会囚犯瓦尔克里 (Valerii Nasaruk) 母亲的信。她写道：

“我的儿子希望来到西方并学习成为一名传教士。但神却对他说：“不。我带你去另一所学校，就是监狱。”我参加了他的审判。这对我来说很难。我更愿意代替他。但神赐我一种力量来承担一切。最难的是当他们在法庭上要求我劝说瓦莱里回转。我做不到。我倒安慰他继续行主耶稣的道路。世界指责我们没有尽父母的责任，说是因为我们的错误教导，以致孩子被当局逮捕。甚至有些信徒也不能理解我们。但我们的救主也是如此。众人都不能理解祂。以为祂被当局处罚，是祂自己的狂妄大言。连彼得也警告主耶稣必须自保。感谢神，给我们获得允许探望瓦莱里。他还很勇敢。他向你们众人问安。”

瓦莱里在监狱里依然勇敢。他母亲被剥夺了儿子，又受多人谴责，但她却靠着基督，并不沮丧。如果正在自由的你依然忧愁，那是多么的错误呀？让我们向基督徒英雄们学习。

在俄罗斯，一位僧侣经过一些正在学习射击的士兵。他们的射击靶子是一个十字架。这僧侣对他们喊道：“我不许你们向十架开枪。”他们笑道：“你怎能阻止我们？”这修道士就站在十字架前说：“那你们就开枪吧！”一名士兵就开枪，可是没有命中。其余人都放下了枪。

瓦拉(Varvara)是监狱里的一名护士。她太好了，以至于一个曾经谋杀七人的凶手在监狱的病房里垂死时问她说，“你是人还是天使？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好？”她回答说，“因为你正在受苦。”“我是罪有应得的，”他承认说，“我杀了多人。”她却安慰他说，“上帝是仁慈的。那些罪孽不大的人不需要很大的怜悯。对于大罪人，神有很多恩典。至于你，神是恩上加恩。你在他眼里比所有其他人更有价值。”那杀人犯深受感动。“上帝怎么能让你和我去同一个天堂？”他问。“上帝是瞎了吗？祂看不出我们的区别吗？”瓦拉开始哭泣。这男人惊讶问：“你是为我哭泣？除了我幼年时的妈妈，没有人为我哭泣。”然后他求她为他祈祷。这犯人有东正教背景，于是这位福音派的瓦拉就以东正教

的方式为他祈祷，因为知道唯有如此，才能触动他的心。他死时已经悔改了。

向殉道的弟兄们学习一种全新的基督教：基督本意的基督教。

成为共同烈士

不是每个人都蒙召成为殉道者，但分担殉道者一点细事，我们就与烈士有分。今天也有一些圣徒追随古代殉道者的榜样，比如二世纪安提阿的圣伊格纳（St Ignace）。当伊格纳被判送去喂野兽时，他写道：‘我很高兴，因为野兽为我准备好了。我祈祷它们对我凶狠。我会激怒它们立即吞掉我，不要害羞，就像有时会发生的情况。。。我知道这对我有好处。现在我才开始成为一位门徒。。。我面临着死亡。请原谅我，弟兄们，不要阻止我获得生命。’

在德国纳粹统治下殉难的朋霍费尔（Bonhoeffer）曾写道：‘饥饿的人需要面包。让饥饿的人继续挨饿，就是对上帝和邻居的亵渎。如果饥饿的人没有获得信仰，那么过错就在于那些拒绝给与面包的人。给饥饿的人面包就是为恩典的到来预备道路。’

人们不仅渴望食物，也渴望神的话语。每天有25万人出生，其中大多数是在福音不为人知或不免费的国家。

基督教殉道者的家庭正在缺少一块面包。你会因为不关心而成为亵渎神的人吗？

一封圣诞信件从苏联偷运出境，经过长时间的延误才抵达西方。它的作者是基督教作家阿加托夫 (Alexander Petrov-Agatov)，他为了信仰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总共三十年的时光。这封信是爱情的瑰宝：

“在圣诞节前夕，我记住了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的信仰和肤色，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或教育水平。我记得那些当权者和那些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受苦的人，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和那些跌入深渊的人，那些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那些受迫害的人和那些被迫害的人。迫害者。最重要的是，我想到了那些我最近才离开的人，他们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待了近三十年... 我们的节日餐桌上有一棵小圣诞树、苹果、葡萄和其他美味佳肴。我心里有一句话像钟声一样响起：你能在至少一个人饿的时候吃掉所有

这些东西吗？当某个地方甚至不允许囚犯躺在冰冷的混凝土上时，您还能睡在温暖的床上吗？

“花环装饰着我的圣诞树，而沉重的奴隶锁链和铁丝网环绕着营地。我不仅仅写苏联集中营和监狱；我还写苏联的集中营和监狱。我还想到所有那些今晚不吃不喝的人，他们无法看到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这颗星星让智者认识了基督，因为监狱的窗户被木板覆盖了。

“在圣诞节那天，我向我们的鹰和鸽子致意——母亲和妻子、新娘和那些无法成为新娘的人——我的姐妹们，为了神的话语、为了真理、为了公义、为了对神的忠诚和对神的爱而背负着十字架。

“我向所有受迫害、受苦的人以及所有寻求光明的人致以圣诞问候。向所有迫害者和压迫者、所有咒骂和没收的人致以圣诞问候。

“我向七年前背叛我的人致以圣诞祝福。我参观了你所在的教堂领导者。我本想见见你，却被告知你不再工作了。但你有祈祷过吗？祈祷吧，祈祷吧。

“所有的人，囚犯和看守，秘密警察和巡逻人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总统——趁还为时不晚的时候祈祷。基督不会再出生。还会有第二次到来。主说：‘看哪，我必快来。’主啊，我愿你来！”

或者你可以学习尼乔尔姐妹（Nijole Sadunaite）为信仰导师，她曾在苏维埃立陶宛尝试从事基督教活动，她在法庭上说：

“真理不需要辩护，因为它是强大且不可征服的。只有欺骗和谎言在真理面前无能为力，才需要武器、士兵和监狱来延长他们臭名昭著的统治。部分政府自掘坟墓。我站在正确的一边，并准备好为了真理而失去自由。我甚至愿意献出我的生命。只有相爱的人才有权责备和批评所爱的对象。因此我对你说话。你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战胜什么？超越道德？。 。 。面对卑鄙卑鄙的男人，被恐惧所感染？。 。 。感谢上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妥协了。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人数不多，但质量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必担心入狱，但必须谴责一切导致不公正和羞辱的行为。我们必须区分人所写的和神所吩咐的。我们欠凯撒的只是在将他应得的东西奉献给上

帝之后剩下的东西。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心灵和思想摆脱恐惧，因为屈服于邪恶是最大的罪恶。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为了真理和对人类的爱而受到考验。什么原因可能更重要？我有令人羡慕的命运，光荣的命运。我的谴责将是我的胜利。我很遗憾为男人做的事情太少。今天，站在耶稣基督永恒真理的一边，我记得他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太 5：6）。在德国纳粹统治下殉难的朋霍费尔曾写道：‘饥饿的人需要面包。’让饥饿的人继续挨饿，就是对上帝和邻居的亵渎。如果饥饿的人没有获得信仰，那么过错就在于那些拒绝面包的人。给饥饿的人提供面包就是为恩典的到来预备道路。

“人们不仅渴望食物，也渴望神的话语。每天有 25 万人出生，其中大多数是在福音不为人知或不免费的国家。”

基督教殉道者的家庭缺少一块面包。你会因为不关心而成为亵渎神的人吗？或者你想帮忙吗？

萨杜奈修女被判三年监禁。她也因此成为普世教会的榜样。

我们的使命不仅是向异国的基督徒传递援助，也给西方世界基督徒得到殉道者的祝福与启示。

戴锁链的手可以给人最好的祝福。您可以接受这种祝福。（全篇完）

如要与作者联系，或帮助地下教会，请联络：

Help for Refugees, INC

P0 Box5161, Torrance, Ca. 90510, USA.

Email: hfr@helpforrefugees.com;

Website: <http://helpforrefugees.com>

本文若有错误，请用Whatsapp联络译者：
+6016-560 8439